



自 傳

郭沫若 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自 传

郭沫若 著

目 录

反正前后	1
北伐途次	127
郭沫若小传	249
郭沫若主要著译书目	252

反 正 前 后

发 端

一年以来从未接到过未知的朋友来信了，重要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天上的太阳失掉了它照耀我的自由。不过今天却是意外地接到了一封：

近来直译式的文章太多了，你的《童年》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作品。在我，不知道你以为怎样，我总觉得这种现身说法的文字是必要的。第一，作者写的时候当然更会贴切一些；第二，读者读的时候，他可以单刀直入的便认定了一个社会，而知道这不是“小说”。有的人过于偏僻，好像以为文笔一叙到自己身边上来，便不是我们阵营里的文字，其实这是错误。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主要的是要以我们的观点来作一切的批判！关于这一层我觉得你是多少做到了。我接受了你这部新作，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故。

你的目的是在记述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转换，但这个转换在你的童年时代其实并未完成。这个转换在反正前后才得到它的划时期的表现，在欧战前后又得到它的第二步的进展，余波一直到现在。然而，它的转换终久没有完成，而且注定它是永远不能完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肯允许。这是资本主义本身中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的大好地盘是不能让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起来占领的。所以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便只能做帝国主义的买办，而中国便永远肩荷着一个半殖民地的命运。这个命运果真是永远的吗？不！解决这个永远的诅咒的威力无须乎细说。中国总是在飞跃，总是不能不飞跃。自五卅以来，年年的事变，不已经铁石一样地证明了这件事？所以我认为，你想继续写下去的反正前后或欧战前后，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无非也就是想叙述这些铁石的事实。同志，你假如是这样，我希望你迅速地写下去罢！听说你的《反正前后》将由某书局出版，我想这一定是《童年》的续篇，我正伸长着颈子在等。我还希望你把《反正前后》以后的东西越快越好地发表出来。

这样一封很简单的信，这里面包含有多么鼓舞的力量呀！我的这部自叙传的工作自从去年四五月间把幼年时代写完之后便把它丢下了，丢了已经一年。我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究竟有无效用。个人的吃饭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动都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换句话说，便是对于理想社会实现上的政治价值要占一切价值的首位。假使白费地写作一些无意识的文字，这写作本身就是一项罪恶。这是使我踌躇的一个重大原因。然我何幸，在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未知同志的这封来信！

“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在写者自身可能是苦心思索得来的结果，然而在认识明了的人，这个真理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于他的言语之间，没有半点矜持，没有半句“直译式”的文句。我也读了不少直译式的文章，但没有得到过这样一句话的力量。好的，未知的朋友，我感谢你的鼓舞，我就接受你的劝告。我现在又提起我全部的勇气来继续这项工作了。总之，我要尽我的力量写。当然我同时也不能不照顾到：

“葡萄酒，你不要太浓，也不要成为一杯苋菜水！”

这样是我现在所受的条件，也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言论所受的条件。我们的一句话要透过一道迷宫，然后才可以发出声来。我们的一个字要加上一层方解石，然后才能反射出光线。你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多么可以讴歌的自由时代哟！

我现在不知道寄信人住址，但我也无须乎知道寄信人的住址。我就把这部书来做为我的回信。

好了，不再多说闲话了，下面便转入《反正前后》的正文。

第 一 篇

一

从前的人说：吴牛喘月，蜀犬吠日。这是说江南的平地多山少，因而太阳的光威没有遮拦，所以江南的牛见着月光都要喘气。四川的平地少山太多，因而见太阳的时候少，所以四川的狗看见太阳也要少见多怪地狂吠起来。其实这两句话不过是文人的夸张罢了。

江南诚然少山。在春夏之交，你假如在沪宁路或沪杭路上，你从火车窗中望出，那眼前展放着的一片青翠的田亩，就如像在海舟中瞻望大海一样，一直展开到远远的地平线而隐没下去。在这时，太阳光是和暖的，明朗的，眼前的大好平原真真是一片锦绣。在这时，你会暂时忘机，觉得中国的前途有无穷的希望葱翠着。田畴中工作着的农人、圆草亭中拖着水龙的悠然拓大的水牛，真像是世界的主人。

四川的中央部其实也和这样的光景差不离。

四川是一个高原的盆地。北部西部我虽然不曾去过，但从地图上看来，从各道的水脉看来，四川是四面都是山，在中央包含着一个坦平的地面。这个平

原究竟有多么宽广，在不曾去过四川的人，是谁也想象不到的。

我自己生长在峨眉山下，是在四川的南部。从我的家乡走到嘉定城有一日的路程，已经是比较平坦的，并不是怎么崎岖。嘉定城内外虽然有些丘陵，但离山岳的气味便已经很远了。由嘉定城再要到成都足足有三天半的路途，峨眉山的山影在我们的背后渐渐低远下去，渐渐浅淡下去，走到了半途的眉山县治，便全部消灭在天空里去了。由此以后的两天路程一直走到成都，你向周围四际远望，无论在那一方面，你都看不出有一些儿山影！我们在这儿可以想象一下罢。请以成都为中心，以三四百里路的距离为半径，向周围画出一个圆形来。四川的盆地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广阔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从古以来四川号称为“天府雄区”。事实上中国的富源——专以农业来说——除江浙以外，便要数到四川。自从黄色大龙旗改变成五条颜色以来已经十七八年，四川拥抱着二十多个大小军阀，人人都有百几十万大兵，年年都要闹一两次内乱，然而四川的七千万人民，至少是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公然还能勉勉强强地活下去。那四川的富厚就可想而知了。

我对于四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是庚戌年的正月我初次上成都的时候，用阳历来说自然是一九一〇年的二月了。我之所以能够到成都去，是要多谢嘉定府中学堂的斥退。在嘉定读书的时候，由于学校的腐败、教职员的腐败，自己的知识欲没有方法可以满足，有时是自暴自弃地朝堕落的路径上走，有时又只好耽读一些古代文学和小说传奇一类的东西。但我想走的心事是怎样迫切哟！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能够的时候是跑欧美，其次是日本，其次是京沪，更其次——这是最低的限度——便是跑成都了。这些地方发散着强有力的磁性，把我全身血液里面的铁质都吸引了去。这只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到这些地方去应该学甚么，究竟有甚么好学，在当时不用说毫无明确的认识。

景仰欧美，景仰日本，景仰京沪，景仰成都，就跟五牛崩尸一样，少年的心受着四方的牵引，他是没有一刻宁静过的。然而我的父母却坚决不允许我走。我受着那样的磔刑，荏苒荏苒地在嘉定住了四年，突然遭了意外的斥退。这是多么可以欢迎的事！这回，我家里人无论怎样不能阻止我了，我至少可以到成都去了！

学堂的斥退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十月。

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闹事，学校当局采取了

高压手段，镇压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一次就开除了八名学生，记了几十名大过。我和张伯安都在被斥退之列。

事情像那样凑巧的，我相信是不会有。上半天差不多快要吃中饭的时候，学校挂了我们的斥退牌。我们正把自己的行李搬出学堂门，有一乘四轿抬进了中学堂的辕门。前面一个跟班捧着一个很长很大的朱红纸的名片。我们起初以为怕是甚么省视学或者委员来了。但看那四轿后面挂着一对灯笼，用红色的匾体字，一边写着“四川提学使委任”，一边写着“嘉定中学监督严”。

——“这才奇怪啦！嘉定中学会跑出两个监督来！”

然而事情也并不奇怪，委实是一位新任的监督前来上任。这对于学校的办事人们当然是一个晴天霹雳，而对于我们学生子又是一阵霹雳后的一片晴光了。

新监督是洪雅县的老举人。他怎样受了提学使的委任，那提学使又怎样突头突脑地撤换了旧监督，这些情由我到现在也全不知道。新监督是一位胡须斑白、非人不暖的老先生。你看到他那种走马上任的神气，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全然不懂教育的外行乃至老腐败。但这对于旧的办事人是严重打击，就好

像替学生报了仇，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老先生是非常欢迎的。当天下午，学生就派了代表去见严监督，请他立刻进堂主持，要他撤换一切压制学生的旧的教职员，要他把斥退了的八个人通同召回，取消斥退牌，取消那几十名的大过。严先生都一一答应了。——不消说他是乐得做人情的，中国旧式的交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跟着严先生已经来了不少的新教职员。但是严老先生说：他要到第三天才能接事，因为秦监督还没有准备，要到第三天才能办交代。

这几天中的学生，当然就跟新的女蜂王出现，蜂子闹分窝时一样地闹杂了。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以前的教职员都不敢出头，都知道自己要遭替换，已纷纷向旧监督辞职。就在我们被斥退的那天晚上，有好些人偷偷地把自己的行李由学校的后门搬出去。那位旧监督秦先生，因为是责有所在，不能不留在堂里办移交，那真够他煎熬了。他一进一出要受学生们的冷嘲热骂，然而也不能不忍耐着装聋卖哑。

由旧式考棚改成的学校，礼堂就是从前的大堂。大堂前面一条很长很宽的空坝已改做操场，两侧有扶手的栏杆。

第三天上移交办妥了，秦先生的行李由礼堂后面送出。随后秦先生孤影悄然地也从礼堂后面走了

出来，严老先生在后面送他。

两边的栏杆上都站着学生，看见两位先生走下了礼堂，便一阵的鼓掌声，一阵的万岁声。但这鼓掌声和万岁声决不是对于甚么人表示欢迎和欢送的喝采。可怜那秦先生把他古铜色的面皮青一阵紫一阵的头也不敢抬起来，眼也不敢侧视。我想，古人所谓绞肠的痛苦，怕他这时候正在经验着罢？他的心脏最初一定兴奋过一时，使他觉得全身发烧；但一回头又紧缩得好像要断气，使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当然要痛恨那位严老举人。但在这时，他不一定痛恨他夺了自己的饭碗，倒一定是痛恨他走路的官派过于委迟。然而，他也一定要感谢的，在他踏完了那长操场的最后一步时，他要感谢那操场幸好没有再长。

不过秦先生的报复，他也早就预备好了。

秦先生前脚走了之后，学生便簇拥着严老举人要他立即取消我们的斥退牌。他这次当然也无可推诿了。他立地叫人检查案卷，才发现了一个绝望的事实。原来前任的监督早知道他自己一走，学生们一定要要求继任者取消我们的斥退，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在斥退了我们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新任监督突然来接事的那天的下午，把我们斥退了的八个人禀报上去，通飭全省了！这对于学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

于我们被斥退者尤其是一个绝望的打击。在当时斥退了学生，挂了斥退牌还要下通飭，这简直是一条绝路。学生从此便不能用自己的本名，甚至从此便不能在本省读书了。秦先生这个报复手段真是毒辣。他不仅断送了好几位学生的前途，而且还断送一位同学的性命。

那位带了重伤的同学，是洪雅县的人，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平常很用功，很守本分。他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自修课程，便是每天要读英文字典，至少要读二十个字来暗记。像他这样用死工的人我实在是少见的。那天他真冤枉，学生们在和粮子闹事的时候，他无辜的受了重伤，打得当场便在吐血。那昧尽天良的办事人，就以这为他在场闹事的证据把他斥退了。天生的拘谨人遭了斥退，已经使他伤上加伤。但幸好和他同县的新监督来了，以为有法挽回，他也就暂时得到安慰了。谁料斥退他的人，还把他禀上去了呢？这个消息一传到他的耳里，可怜他的内伤大裂，竟至开仓大吐起来。他始终爱说一句英文：“You see, I am killed! You see, I am killed!”^①除此以外并没有二句话。不消说他已经失掉了他的本性。

这位同学就在开仓大吐后的第二天，死在了他

① “你看，我被人杀了！你看，我被人杀了！”

回洪雅县去的肩舆里面。

当时办学的人对待学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好像是在管理死囚。这个往事，回想起来真不免令人痛心。

不过我自己是应该感谢的。斥退了我固然好，就要下我的通饬，那也更好。因为我不仅可以到成都，或者说不定还可以出省。这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呢？

二

我往成都去是和五哥同路。我们先到嘉定城落在王畏岩先生的家里。王先生在我进了中学之后，他曾经在省城的分设中学做过两年的国文教员，他是才卸了任回来。他便为我写了几封介绍信给分设中学的他的旧同事。

在王先生家里耽搁了一天，第二天就动身。我们雇的是长途轿子。在当时轿夫脚价一个人一天只要一吊钱光景，每天平均要走八十里路。第一天宿青神。第二天中午时分便到达眉山。眉山是苏氏父子的故乡了。地名虽然号称“眉山”，其实隔峨眉山已经有两三天的路程，峨眉山只剩下一些儿若隐若现的影子了。城里有一座三苏祠，但是关于三苏，特别是苏东坡的遗迹，却甚少。嘉定倒还比较多些。大抵眉山就在嘉定和成都的中途，从这儿以上，风气便渐渐

感觉着不同了。最显着地令人感到变异的是自眉山以上有一种很原始的交通工具名叫“鸡公车”。这是一种独轮车，车夫在后面推送，和上海一带的小车子“一轮明月”有些相像，但更小，更矮，只能坐一个人。车板上缚着一张小小的竹椅，人就坐在上面，正对着前面。这种鸡公车非常多，有时候一来一往在路上连成着一条很长的直线。叽呀叽呀的声音非常聒耳。这种鸡公车在眉山以南是没有踪影的，在眉山以北便一直使用到成都。这种简单的交通工具的使用，正足以证明成都附近就和江南地方一样，是一望平原了。

鸡公车虽然很简单，但它是破坏道路的健将。自眉山以上的南大路，便被这些原始的车轮纵横地拖出辙迹。下雨时满路泞泥；天晴时崎岖不平。在这种道路上，有时遇着一个小小的石子，鸡公便立地跳起来，把它身上坐着的乘客抖落在地上。然而坐在这种小车上，公然也还有能够睡觉的人。你可以看见有些颤巍巍地挺在空气中的上半身，就跟风中的竹尾一样，东倒西歪，或者前颠后簸。

第二天的站口是彭山，第三天的站口是双流，这些都是县治。它们有甚么特色的地方，我现在可记不清楚了。

第四天，假如你清早一早动身，走不上半天你便

可以到达成都。进成都自然是由南门进城，但你在离城还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便可以望见道旁一丛很葱郁的树林。那就是有名的“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了。武侯祠的庙门坐东向西，门内庭园中参天的古柏，虽不必就是汉时之物，但有的总怕是有五六百岁的年龄。

初到成都的时候就在这庙门口息了一次肩，我们进里面去瞻望了一下。里面有荷池，有水榭，有亭台，有花圃，有无数名人或不名人的题咏。顶多要算是对联。但是说来说去，总不外是三分六出、三顾两表之类的文字。丞相的祠殿之外有昭烈帝的坟在祠的南苑。坟的附近更有三义祠。全体的建筑是相当巍峨的，碑铭也特别多。这儿对于专治考古学的人想来会是一项很现成的资料，特别是那昭烈帝的坟。那假使发掘出来，总可以得到一些古物，足以解决历史上的问题的罢。我想中国现在所有的遍地的古墓，就是孔二先生的墓，都应该发掘，使那内藏的宝物重见天日。假使以为古迹须保存，问题却非常简单。发掘了之后依然给它一个墓堆，自然是无损于旧观的。然而出土物对于文化史的研究是会有重要贡献的呀！不过，主要的是出土物的研究要集中，要善于保存，要立在唯物史观的观点上去整理，去清算我们中国的古代以来的社会的进展。这事的实现，当然不是一天

一日可以说到的。

到了成都，我们住在一家嘉定人惯住的旅店里，张伯安已经比我们先到了两天。这时候是正月尾间，各学堂都络绎在开课了。

我们进甚么学校好呢？有没有希望得进省城的学校呢？

小学时代的杜绍裳先生，这时候在做提学使衙门的科长，不消说他便是我们唯一的军师。他替我们考查了案件，知道我们是被禀告上去了。然而没有下我们的通飭。这就很有希望再进别的学校。他劝我们考中等工业。他说我们只要把名字一改，便甚么都不成问题。他之所以这样劝告自然不外是“实业救国”的意思。不过关于这层，我们五哥和其他的同乡们都不甚赞成，以为这样是旁道。这旁道的意思是对正道而言。所谓正道，要像从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一样，是要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我们——我和张伯安——也觉得自己心不甘。因为中等工业的招考资格是小学毕业程度，而我們是有中学两年半的学历的。我们都不大喜欢，杜先生也就不好勉强。结局我们还是先去找中学堂插班。假如这一条路绝了望，我们又再来投考中等工业。

我们便得到好几封介绍信，大都是杜先生亲自

给我们或是他替我们斡旋的。照他的意见，我们须得先说明自己是被斥退了，才到省来插班的。这层或许是他要卸掉他作为教育行政者明知故犯的责任。我们也觉得这样爽快些，免得后来进了学校之后发生甚么问题。

我们第一次所找的便是在成都久负盛名的分设中学了。

这分设中学在南校场高等学堂的旁边，本来是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因为前任的校长刘士志先生不甘受“附属”的名义，才改为了“分设”，成为了一种半独立性的学校。由于是高等学堂的附属学校，经费充足，设备完全（得以利用高等学堂的设备），又加以刘士志的声望，所以学校也就很有声望。

我们到省的时候，刘士志已经被逼到北京去了。他之被逼到北京也就跟我们被逼到省城一样，是由于和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巽发生了冲突。事情的详细我不十分知道，好像是在年底省城开运动会的时候，在会场上抵触了那位总督部堂。这样能和总督部堂冲突的办事人，是很可以博得人们赞奖的。刘士志待学生也很严厉，却是很能得到学生的敬爱。但可惜他去北京之后不久便在都门病死了。

我们去投考分设中学的时候，新任的监督姓都，名叫静阶。他的姓很奇怪，他在社会上赢得一个绰号

(并不是学生取的)叫作“都喇嘛”。他的面孔也有点异乎寻常。八字胡须，棕黄色的面皮，额部很突出。戴着一顶平顶的便帽，珊瑚的小红结子。一切的动作都有几分机械式。

我们拿着一些介绍信去见喇嘛先生。我们填写的谒见单，由传事房递上去之后，他立刻就传见我们。还有一位国文教员郑先生，是王畏岩先生的同事，我们听说他还留在学堂里，便把王先生的介绍信也交给传事房传进去了。

都先生接见了我们，他只把介绍信看了一遍，便问：

——“你们带笔墨来没有？”

这一问真是来得突然。我们答应道：“没有。”

他说：“唔？你们怎搅的？怎么来考插班都不带笔墨？”

这愈见使我们诧异了。我们以为我们是斥退生，虽然有人写介绍信来，但信的内容我们是看过的，只是说“有无相当的班次准予插班”，怎么这样的容易，才拿起信来就要叫我们受试验呢？

——“我们没有想出先生今天就准许我们受试验。”

——“唔，今天不受试验，要等到几时啦？同学们都在上课了，你们没有看见吗？你们的光阴好拿来

晃荡？”

正当他在这样教训我们的时候，郑先生也出来了。他向我问了些王畏岩先生的近状。回头他把王先生写给他的介绍信转递给都监督。都监督接到手去也看了。

——“好的，郑先生，你来得恰好。我就请你出一道国文题来试验他们。”

——“今天就试验吗？”

——“是的，今天就试验。”

——“在甚么地方好呢？讲堂没有空的呢。”

——“就在这儿好了。唉，不要用甚么讲堂。”

——“好的，我去向曾先生（学堂的监学）说，请他们备两份卷子，我同时把题附在里面好了。”

郑先生说了便告辞着退进去了。

回头都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带笔墨来，同学里面有朋友好借用的没有？”

我们说：“我们初来，没有朋友。”

——“好，那我就借给你们用。不过你们不要辜负了我上好的笔墨啦。”

就这样，第一天我们就受了入学试验，试验只是一道国文，题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限二小时完卷。

我和伯安两人就在会客厅里面的茶几上做起试卷来。他坐在左边的一排，我坐在右边的一排，也没有甚么人来监考。都先生的书房是就在会客厅的右手，只有他时而出来看看我们。学堂内部每次课堂上堂下堂的摇铃声可以听见。在有一次大约是下堂铃罢，有几个比我们更小的学生在休息时间走到会客厅的帘外来，用着好奇的眼光，隔着帘子偷看我们。起初是一两个，他们就像蚂蚁一样，进去报了信，又来了十好几个。他们有的笑着指着自己的眼睛，有的又扯着自己的毛辫。这是在奚落我们的。因为伯安是独眼，我是因为患了那场重症伤寒，头毛脱完了，还没有长齐。但等到上堂的铃子一响，他们又一哄而散了。

文章大概也做了两个钟头的样子。彼此都做好了。都先生走出来接到了我们的卷子，他自己就阅起卷来。他约略看了一遍，还看了我们几眼。

——“唔，唉，你们还好，还好，你们可以进来。你们明天就可以进来。”

——“我们来插那一班呢，先生？”

——“哦，老实，这个我倒还不十分清楚。你们等一等，我去请曾先生来问一问。”

说着他把竹帘揭开，隔着天井便向着传事房喊出：

——“传房！你进去，请曾监学会老爷来。”

不一会曾先生出来了。都监督问他学校里有怎样的班次。曾先生说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级，乙班是四年级，丙班是三年级，丁班是二年级。

——“我看就插甲班好了，哎，文字做得都还通顺。”这是都先生说的。

曾监学很有几分迟疑的神气。

——“他们原来是有几年的学历的？”

——“哦，老实，你们是只有两年半的，是吗？”

——“是的，我们两年半还没有住完。”

曾先生说：“那吗要插甲班，年次太差远了。”

——“插入乙班怎样呢？”

曾先生依然有点迟疑：“我看丙班不最相当吗？”

——“唔，好。不过……唉，好，就插丙班罢。哎，你们今天下午就来缴学费，把一切手续办妥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学堂来。哎，不要在外边久晃了！”

就这样，我们便插入了分设中学的丙班。这是多么出人意外的容易，自始至终就好像在一场梦里。才由乡僻地方进省城来的学生，考的是省城数一数二的中学，而且自己是有内咎的斥退生。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悬心吊胆地怕不会被收容，怕自己不及格，对不住写介绍信的师长们。然而，这是多么出乎意外的容易！这是都先生办学外行，还是真的看中了我们的文

章，还是几封条子的力量呢？但不管怎样，我们是欢天喜地的，转学的问题很轻易地就解决了。

在我们进了学堂之后，立地知道这儿竟有两位旧同学。一位是嘉定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因为吃了监学先生的一碟辣椒酱油便遭了斥退的宿君，他本是和我们同年级的，然而已早来插入了乙班。还有一位是在小学校里低我们三级的罗君，他在这儿住的是丁班。我们时常在这样想：假使我们事先也托了甚么人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那位曾监学，我们的中学课程，或许会提早两年毕业的？

三

憧憬了多年的成都，憧憬了多年的成都学校，终究如愿相偿了。然而结果是怎样呢？

成都和嘉定依然是“鲁卫之政”！——这是我进学校不上两个礼拜便得了的一个幻灭的结论。一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骗文凭的学生。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这是国学一方面的东西，严格说起来，连我们嘉定中学的有些先生都还赶不上。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

化、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不过他对于学生很宽大，一切的问题他是不要学生演的，他自己不消说也乐得节省些精力。然而这样的教员公然还是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教课的红教习。这样的红色到真是有点令人恐怖了。一位姓徐的英文教员是浙江人，大约是上海那一座教会学堂出身，他一身的穿著真是时髦，甚么海虎绒、铁丝缎，有好些是我们乡下人自出世以来才第一次看见的东西。金丝眼镜，一把抓的尖帽子，嘴里也含有好几个金牙。他是不住在学校里的，一来一往都是坐的四人抬的弓杆大轿：因为他当时在做提学使衙门的英文科的科长。然而这位科长大人的英文程度究竟怎么样呢？说来恐怕有些人不大肯信，以为我是过甚其辞。然而始终是事实，连虚构也不容易构成的事实。我们读的是 chamberlain 的《二十世纪读本》，我记得是卷二，那开始的一课是《一条 Newfoundland 的狗》。我们那位英文科长，他竟不知道这“Newfoundland”是一个海岛的名字，他竟拿出我们中国人的望文生义的本事出来，把它直译成为“新大陆”。只消这样一点便够了，我看可以不必再举例证了。

你想，在一个省会地方，充当着最高学政机关的英文科长，他的英文程度才仅仅是这么样！在当时我

们是非常悲愤的。我们当时没有明确的意识，基本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甚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甚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我们当然不知道为甚么会发生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个人的良心或者是社会的道德上去寻求。所以不是归之于社会的腐败，便是归之于个人的昧良。更进一步，便是说整个精神文明的堕落。要挽救它，当然就只有革心的一条方法了。其实这些都是鬼话。我们现在是知道了，很明白地知道了。中国僵定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支配阶级中发生了一个固定的公式，便是求学是为作官。他们要支配封建社会中的单纯的农民，那是用不着多么大的学识的，只消熬些资格便够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学，结果就是资格，所谓求学，结果就是熬资格。海禁大开，资本主义一侵入到中国的内地以来，它整个地把中国化成了一个乡村，化成了一个供给原料的乡村。中国的支配阶级看见自己的支配权日渐动摇，所以也想到采取一些资本制度下的利器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然而在永远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乡村中，资本制度的所谓科学文明，始终没有基地来培植。外国人到中国来所施行的教育只是在教育奴才。我们从外国请来的一些导师都是些他本国不要、只能到这半殖民地

的海外来投机的妖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够希望有甚么好的教育，有甚么好的人才出现呢？中国闹洋学已经闹了好几十年，一直到现在就连“科学”的“科”字都还说不上半边。中国是只有飞跃的，有产阶级的文明虽然无法产生，而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素质却已经具备着了。

在成都振振有声的中学校都是这样的情形，其他的中学自然是不言而喻。说到成都学界的空气，那更是在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成都除分设中学、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等官立的中学之外，有不少的私立的中学校。官立中学已经是人情的世界，私立中学更用不着说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因而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在地方上连小学都只住得一两年的人，只要把中学五年的学费缴足，或者再缴纳些甚么手续费，便可以立地得到一张中学学业文凭。这样的文凭，它的效用却是非常的宏大。一个中学毕业生在当时是等于一名举人，有这样一张文凭，可能拿回家去贴报条，诓惑乡民，增长新地主的候补资格。而在省城也更可以飞扬。有这样一张中学文凭，可以投考本省的高等学堂、政法学堂、高等师范，京沪各地的官、公立学校，更可以参加文官考试、法官考试，乃至东西洋留学生的考送。

在这种私立中学之外还有不少的私立法政，要

算把中国人的投机心理，做官热，表示得更为尽致。周围只有二十二里路的一座成都城，在反正以前我们初到的时候，已经包含有了好几座私立法政学校，在反正以后的头一二年间，有一时竟陡增至四五十座之多。三月速成，六月速成，一年速成，当时的学界制造法政人才真是比花匠造纸花还要脚快手快。因而父子同学、祖孙同学的佳话便处处都有传闻。就那样，中国说是变了法，也就在“自强”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学校的陶冶之下。你怎么能够不失望、焦躁、愤懑、烦恼？最坏的是分设中学就在高等学堂的旁边。高等学堂在成都是最高学府，而那最高学府的最高学员，就有不少人是买得私立中学文凭而考入的。他的年纪和你相若，学问不管怎样，他总是你的“上级”。这对于年青人的自负心是怎样大的一种打击哟！

失望、焦躁、愤懑、烦恼，这几条支流所汇合而成的自然是无为、堕落、自暴、自弃的洪流。在嘉定时是这样，在成都时也还是这样！我到成都不久，又和酒常打交道了。成都有名的大曲酒那真不知道醉坏了我脑子里面的多少细胞！啊，那大曲酒，那可怕的大曲酒！那怕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酒精。我记得有一次我把一杯大曲酒泼在桌上，用火柴把它点燃时，它燃到没有痕迹，几乎把桌面都烧了。大曲酒本是高

梁煮的，香味非常浓烈，但是喝起来，实在非常辣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酒并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并不是喜欢吃它，而是赌气吃它。一肚皮的不高兴，一肚皮的不满足，想借酒来淘泻。酒真可淘泻这些忧郁、愤懑吗？李太白说得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消愁愁更愁。”这倒是很有经验之谈。酒是只有增长愁人的愤懑。平常，人的忧郁是受着中枢神经的制止，不准它过度表现的。神经中枢愈高级，对于麻醉剂的抵抗力愈薄弱。所以先被麻醉的是制止机关，人在这时便尽情地把自已的愤懑、忧郁都发泄出来，有的暴躁，有的悲哭，那正是神经麻痹的表现。人被酒力把一切意识完全消灭了之后，他也可以得到暂时的一段忘我的死静，然而那酒醒后的报仇是怎样苛刻哟！酒醒后真有说不出的苦楚。脑痛，口苦，人无力，全身的筋肉都在不断地抽搐。惨淡的心境就好像烈火过后的一座火烧场。这到底有甚么乐趣呢？这种情景在酒前早是自觉着的，然而依然要麻醉，依然要求自寻苦恼。我可以说，饮酒的人是想把精神上的苦痛替换成肉体上的苦痛，更换一句话说，他是在慢性自杀而已。

吃酒时自然要朋友，而我们是新入生，旧学生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张伯安可以陪我，但他比我沉着得多。他有他所喜欢的数学，他能够在那一方面求得

满足。但是我呢？我对于数学不知道从几时起便有点畏难。那时候一般的口号是“实业救国”，所以凡是有志救国的人总不得不倾向于实业。要倾向于实业便不能不注重数学和理科，而对于所谓文学便要加以轻视。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这样的自怨自艾，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不知道苦了自己多少。

和我们同时考插班的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都是都监督的同乡。一位姓罗，和我们同时考入了丙班。他的学历很有些曲折。他是到过日本的人，在日本成城学校住过几天，因为闹取缔风潮他便跟着一批中国的志士们回到中国。他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住了两年，是在最近才回到四川的。他比我长一两岁。因为到过东洋，头发是剪短了的。他是到过我所景仰的日本和上海的人，然而他的不懂科学却比我还要厉害。他有一部英文的《迈尔通史》，这怕就是表示他出过洋或者到过上海的唯一物证。这书，他很爱惜，放在他的书匣里从来没有翻读过。他有这部书，我们又同自修室，我有时向他借阅。当然要翻字典。翻出的生字我用铅笔替他注在书上，他责备了我，很郑重地用橡胶来擦了。不过我对于这位姓罗的同学是隐隐佩服的。他到过东洋和上海，却公然还有雄心再进本省的中学！当年出洋留学或者在上海留学的

人，不是学得几句“瓦塔苦西”、“阿那打”，或者是“那么温”、“阿尔来”^①的几句洋泾浜的“不落肯”^②，就可以回到家乡称孤道寡的吗？不忙说到十几年前的当时，更不忙说到那乡僻的边陲省份，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上海、北京，不是尽有跑到美国去鬼混了两三年，一回国来便是甚么“博士”、“硕士”，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么机关的委员，甚么大学的教授，甚么印书馆的编辑吗？

总之，这位姓罗的是我在成都新交的朋友。

还有一位姓李，他的态度真是彻底！他是由于家庭悲剧使他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境地。他很小失掉母亲，晚母对待他不好，他认为迟早是会被她毒死的。他插的是丁班，虽然和我们不同班，但我们同是插班生，便同在一个自修室，也同在一个寝室。他虽然也是彭县人，家却住在成都，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位很好的向导。他懒得真有程度。清早是死不起床的，点名时监学向床上去拉他，也拉他不动。监学把他也没可奈何。他是监督的同乡，好像还有甚么亲谊，因而监学先生们对于他须得有一番格外的关照。他似乎是

① 英文“number one”（第一号）、“all right”（是）的不够准确的读音。

② 英文“broken”（不完全的、不连贯的）的读音。

死了心的人。他丝毫没有向学的念头，而且还希望被学校斥退。他经常爱说：“读书有什么用？就把书读好也会被晚母毒死。”

李同学的这种特殊的性格和他的境遇，引起了我们的同情，他不久便成为了我们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四

这几位同学们就是我的酒友，此外也还有些住在别的学校的嘉定同乡。我们只要逢着星期便是喝酒。落雨的时候是在城里，天晴的时候大概是到城外各处的名胜地方。

成都城外很有不少的名胜足以供我们游玩。东门外的望江楼是很有名的，那在濯锦江的对岸，临着江边。那儿有不少的幽曲的建筑招揽游人，最负盛名的是有一眼薛涛井。薛涛是唐朝韦皋镇蜀时一位有名的校书，她能诗能文，手造了因她而名的“薛涛笺”。传说她制薛涛笺使用的那薛涛井的水。水是很清冽的，井畔有茶店，汲取井水来煮茶以供享游客。旧式的雅人自然是时常到这井边来喝茶的。井的附近有嵌壁的题咏，可是我连一个字也不记得了。望江楼好像是一座寺院的附属物，寺名好像是雷音寺，薛涛好像是在这儿落发做了女冠子的。

以往的记忆很模糊了，但是有一个记忆，特别是与望江楼有关的，却很鲜明地留存着。

那是成都办花会的时候。每年三月成都城外的青羊宫和草堂寺是要办花会的。这种措施并不甚古，是在“变法自强”以后所产生出来的花样。那是一种博览会的性质，会期大概有两个月的光景。

草堂寺是以杜工部草堂而得名的地方，在成都城外的西南角上。由南门出城与由西门出城，大概是恰好在相等的距离。由南门出城，约略是沿着浣花溪的北岸西走，途中要经过浣花潭、青羊宫，和其他私人的别墅。最后是到达很清幽深邃的草堂寺。这条路径，平常除乡里的农人、寺院的僧侣，或极少数偶尔要去寻幽访胜的墨客骚人之外，很少人往来。但到了花会的时候，便出现着肩摩踵接的人的洪流。最好你从南校场的城墙上去俯瞰——先附带着说一句，成都的城墙是很宏大的，坦平的城墙上可以并排着跑三两部汽车。你看那城下的马路上一来一往地都是新式的马车。

浣花溪里面平常是不见有舟楫的，不知几时从浙江的西湖里面搬去了好几十只的白布篷的平底湖船，在那儿很匆忙地迎送，使浣花溪自己也睁着了惊异的眼睛。

溪的此岸是人行道，溪的彼岸是马道。你看那人

行道上的行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由城里去的、由乡下来的，喝醉了的、唱歌的、嬉笑的。过了一群女学生，跟着就有一群男学生。平常两只脚除三合土以外从不沾地皮的人，现在也都和地上青草接近了。

彼岸的马道沿着一些浅山，那儿虽只是一些很可怜的、被人虐待到不成形状的“溜溜马”在疲于奔命，然而都好像才从外国来的高头健步的洋马。真正的洋马，时而也可以看见。那是凤凰山的新军骑来游玩的。那样的马会看不出是马，而是长颈鹿了。

学校的规矩，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时是可以走出南校场去游玩的。我们便爱走在城墙上去看热闹。但一到礼拜日，我们便要成为那人道上的人或者马道上的人了。马车，在那时我们是没有资格坐的，因为没有那样多的钱。

就在有一次的礼拜日，上半天在花会场上游玩了半天，下半年我们再决议骑马去游望江楼。我们——罗、李两位同学，伯安和我，此外还有些同县人——骑了将近十匹马，由南门进城，向着东门穿城而过。

马是溜溜马。这种可怜的马可以说是已经把马的性格完全磨灭掉了的。马已经是很老很瘦。它对于人类的虐待也有不少消极的方法来抵抗。走路是异

常迂缓的，你打它几鞭，它跑快几步，接着又迂缓下来。假使在它前面有一匹马，它就紧紧贴着它的屁股，“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地任你怎样打它，它都不肯抢先。这是溜溜马的差不多共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大概可以称为马的 Sabotage^①。但假如你是不会骑马的人，那它也很有揶揄你的手腕。它会突然跑得很快，把你扔下背来，便一溜烟地溜了。再不然你骑在它的身上，它横着便要把身子倒下去在地面上打滚。这时候不消说你的腿是很危险的。最俏皮的是它向一条狭窄的田埂走去，站着不动，两边都是水田，让你下了它的鞍背，也还要弄得你两脚的烂泥。

我们骑着马由南门穿过东门。我骑的是一匹黑马，这位先生比较还壮健，它零落成为溜溜马大约还不很久。我骑着它便打头阵。它也不肯十分走快，在城里不走快也正合乎我们的要求。因为城里人太多，走快了不能控制，反而不是好玩的事。荏苒苒地出了东门，我们很想一出了城门便要驰骋它们一下了。出城之后是还有一段很长的附廓街道，不幸就在出城之后走不几步，便遇着两位兵夫牵着两条军马在街上溜达。我的马照着它们的规则，走上去接着军马的屁股，便同盟怠工起来，死也不再抢先，死也不再

① 怠工。

走快。这真是有点难乎为情。前面是两匹散步的闲马，我们骑在马上便跟着它们在街上散步，两边两街的人是万目瞻仰着的。

恼羞成怒的我，施行起恐怖手段来了。我拼命把我手中从南门外折来的柳条鞭子在马屁股上乱打，我的背后的伯安也帮助打我坐下的马屁股。柳条鞭子打脱了皮，打断成了几节，然而马先生的怠工依然没法解决。

“这该死的亡八！这是非用最后的手段不可了！”

我把我的小刀子搜了出来。我仅仅把刀柄的头子用劲地凿了一下，啊，这可不得了！马公暴动起来了！它四脚四腿地跳跃起来，我死命地抓着了它的鬃毛。它大约怀恨着没有把我扔得下背来，便更加暴怒地在街上狂奔起来，一直往前面冲，全街的人都惊惶了，只是往两边让。我自己又是初学骑马的人，仅死守着一句成语“马儿跑得凶，一把抓着鬃”。我的死守倒不仅“一把”，而是两把。缰绳也拉不住了。我也不知道马儿跑凶了的时候，制马的缰绳是怎样拉法。我只是死死地两手抓着马的鬃毛，两膝不消说是挟不牢的。屁股，就跟打连枷的一样，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的马鞍上乱打。自己一心怕滚下马去，一心又怕那样的奔马踏伤了街上的行人，真真是弄得魂不附体了。把繁盛的一段街面跑过，跑到了人

行稀少的街尾，终究把街道跑穿了。算好，没有踏伤了什么，但它还一直在奔跑，好像一直要把我带进地狱里去。

马自然知道我是不会骑马的。它的目的——报仇的目的——就是想把我扔下背来。然而它不知道在怎样痛恨它自己的项上多生了那一项的鬃毛！我死死地拉着鬃毛不放，任随屁股在马鞍上打铁，可总也绊不下地来。我的屁股打得很痛，但是马背怕也是不十分舒服的。马的计策突然改变了，它自从暴动以来一直是笔直地往前奔，跑穿了街道，跑到田野里来了。跑到一处，在路的右手边有一座小神祠，祠的封火砖墙与路向成为直角。墙畔有一条小径，与大路的路向也成为一个正整的直角。吓，那马先生真是出乎意外的聪明。它一直风驰电掣地跑了来，跑到这儿却真如电火一般，突然正直角地向小路上转了方向。方向一转它便和石马一样死死立着了。这样一来依着惯性的法则，我无论怎样是应该被抛下马来的。然而终赖它项上的鬃毛没有被我扯脱，我便吊在它的鬃毛上。

这一场恶斗把我这位骑马的阶级真是制服得魂飞魄散了。亚非利加有一种黑色白条纹花的斑马，名叫 Zebra。撒哈拉沙漠中的狮子在猎取这种斑马的时候，它是一步跳在那斑马背上，一口咬定了它的项

脊。斑马自然是死命地奔跑，跑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倒在地上终竟成为狮子的食物。我坐下的那匹黑马，在它拼命狂奔的时候，我想来怕只有 Zebra 奔命时的迅速才可以比拟罢。然而可怜我这匹狮子，虽然始终没有被扔下，但在马静立着时，我只好倒在地上睡了好一会。心脏像要爆裂，周身的骨节好像解了体，屁股特别是痛得不能忍耐。

我们是要往望江楼的，然而我这一匹单人独马，却沿着濯锦江边在河的这一面奔跑，离隔河的江楼已经很远。同路的人，当我的马把街道跑穿之后，在河对岸看明白了，便有两位掉转头来迎接我。在他们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依然睡在神祠右侧的田圃上不能动弹。马大约也很疲倦了，它也没有再朝远处走，只在近处吃草。

两个人把我扶着，我才勉强站了起来。施行恐怖者的下落真是到了寸步难移的程度。朋友们没法，只好去雇了一乘小轿，把我送到望江楼。他们两个人牵着三匹马跟在我的轿子背后。

在望江楼休息了好一会，自己的精神才渐渐恢复了。

大家在望江楼上吃酒。吃酒之间自然又是满口的国家大事，一肚皮的牢骚不平。大家在痛骂学校的腐败、办事人的腐败、学界的腐败。在我们没有出过

省的人自然又要说到自己对于京、沪、欧、美的憧憬。姓罗的同学痛快淋漓地演说起来了：

——“嗳哟，四处的老鸦一般黑，你任随走到甚么地方去都是一样。欧美我没有去过，但是听说到那边去的人学到一点正经学问的并没有多少。博士文凭各国都是可以用钱买的。像美国更有这种滑头的办法，只要你肯出钱，他可以给你一张甚么大学的博士或者硕士的文凭。然而这座甚么大学结果只是一种幽灵大学，它根本是没有的。中国人便拿着这种文凭回到中国来骗钱，骗官做。

——“日本我是到过的。日本鬼很穷，他只要你的钱，管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一切私立大学都照例贩卖文凭。中国留学生在那边只是吊吊下宿屋的下女的膀子，学几句下贱的下女话。本来是全无科学常识的狗屁不通的人，跑到外国去，少则一二年，多则三五年便跑回来。你想，单是要把外国话学好都还说不上，怎么会有好大的学问？然而他们反正是留学生，反正是博士、硕士，你能怎样？

——“哼，京沪的学校！几座奴才教育的教会学堂不用说了，甚么国立或者公立的大中小学那一种不是骗鬼的地方？你想，教员只是那样的资料，学校那里会有甚么出色的？学生是一些青年人，虚荣心很重，真正有志趣向学的人，一百人中找不出几个。最

可笑的是上海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是教科书一切都要用原本。桌子上摆着一两本原文的教科书，便好像把清朝皇帝的江山都夺到了手的一样。你想，连《National Reader》^① 卷二的甚么 ‘Dear me, dear me! I am a little bee’^② 的儿歌都读不懂的人，那里就会懂得甚么《迈尔通史》，又是甚么麦铿季的物理呢？一般的学生都像中了魔的一样，要夸读甚么原书。这样一来倒也好，学生乐得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教员也乐得遮丑。甚么，他给你一用原文来解释，天老爷明白，你晓得他讲的是那一个星球上的话？所以照我看来，还是像在本省本本分分地使用本国翻译的或著述的教科书，倒还多少有点好处。”

结论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清政府没有认真改革的诚意，所以满天下的办事人都不肯认真；更进一步便是要把中国弄好，那就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还有一种是李同学的虚无主义：

——“管他妈的，学校就认真也好，不认真也好，中国就灭亡也好，不灭亡也好，纵横老子是看不见的。我几时被人用砒霜毒死，谁个能保障？”

① 《国民读本》。

② “啊，啊，我是个小蜜蜂。”

一面是兴奋，一面又是消沉，而结果呢，同样是年青人的悲歌慷慨。不过我始终忘不了的是那匹溜溜马的暴动。它使我坐凳都很艰难，回城的时候依然是用轿子。

五

然而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旧时代的势力与新时代的影响都集中在这儿。

旧的政治势力有总督部堂、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在这些旧式的官职之外表示着新时代的影响的，要算是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之类了。北门外的凤凰山已经创办了两师新军，总督衙门的旁边有西式建筑的督练公所，这些都是很鲜明的时代表现。

当时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怀，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干员，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他起初本是一位落魄的名士，在我们嘉定还卖过字的，后来不知怎样便做到了巡警道，大约在这些地方也正足以表示他的大有才干了。他的德政，四川人给了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

娼是官娼，他把成都的娼妓划成了两个区域，一

处是刘玄德即位为汉中王的武担山，一处是好像在东门附近的甚么石子院（院名记不清楚）。使娼妓成为了一种公开的营业，政府从而抽取花捐的这种近代办法，在四川大约是由他创始的。

场是“劝业场”。他在成都城的中央修了一条半西式的二层楼的洋街。目的原想提倡新式的工商业，然而开办的结果是一场都是洋货。刻薄的成都人当然又有他刻薄的品评，便是“周孝怀劝洋业，发洋财”。大约这种品评向周孝怀的耳朵里也是传达到了的，他自己手书的赵尧笙体的“劝业场”的“劝”字后来竟不能不改成“商”字以作敷衍了。——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笑话，但这儿正明显地表示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醉心于新式的工商业而提倡有心，而结果只能成为一种买办式的营业。

厂是“制革厂”。这怕是他最成功了的一项事业罢。这是用牛皮来制造各种西式皮筐的犯人的工厂。所出的革制品在四川自然成为最新式的流行商品。据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我们大哥的来信说，好像比日本的成品还要价廉物美，因为日本的革制品都是纸做的。

唱是戏园。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戏园，名叫“悦来茶园”，是采取官商合办的有限公司的体制。那儿在

初是唱的川戏，所谓“改良川戏”，自行招集了一批孩子来教练，很有些像日本的“帝国剧场”。当时“改良川戏”的名目颇流行于一时，如像老名士赵尧笙先生都有“改良活捉王魁”、“改良红梅阁”之类的剧本出现，沿用着四川原有的高腔，把词子改得异常文雅。这要算是戏剧的资本制度化，本身虽不是生产的，而在剥削者一方面却很是生产的。

察便是“警察”。这不消说完全采用的新式办法。这办警察的费用，多半就由前面的“娼场厂唱”得来，经费充足，因而在表现上也很有成绩。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针，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例如学生和警察的冲突，新军和警察的冲突，便是这种情趣的表现了。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四川人给他的译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他后来由巡警道调充了劝业道，大约也就是对于这种众怒的缓冲政策了。

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当时——倒不愧是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虽然他自己容或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他所

归属的当时的官场又是以拿办革命家自豪的封建势力的集团，但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于封建社会的革命。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自然这些都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德，而同时他的事业仅能限于极消极的一部分的消费部门，且如像“劝业场”之不能不改为“商业场”一样，多半是招来了一个滑稽的后果。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换一句话说，是“成也是你萧何，败也是你萧何”，而这位“萧何”是谁呢？是近代的资本帝国主义。近代的资本主义把几千年来僵定了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剿翻了，它尽可以依照它自己的形式造成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它不能不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围来以维系它的存在，因而便不能不把中国永远控制在原料供给者与精制品消费者的乡村状态之下，也就是半殖民地的状态之下。中国的觉醒了的新兴资产阶级，任你怎样地努力，怎样地挣扎，总不外是一个沐猴而冠，总打不破这样一条宿命的金箍咒。所以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你假使不彻底地和帝国主义者斗争，那你便只好成为一个不生不死的长久的乡村。这个长久当然也并不是无穷永劫的永久，资本

主义早迟有一天是要达到它的总崩溃的时候的。然而，我们能够坐着等待吗？

在当年的四川，除掉周孝怀的这些局部的事业之外，还有一件最普遍、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化的表现，那便是川汉铁路公司的建立。

以武汉为中心的京汉、粤汉、川汉三大铁路干线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化以来的新兴阶级的一个理想。京汉虽是借的外债算已经落成，粤汉也继续在动工，四川就在癸卯、甲辰之交要起来经营川汉铁路了。在经营上，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但是股本的收集却是带有政治势力的强制性质。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着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儿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为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四川的人口本不少，而土地又是很丰饶的，铁路的股本搜集到两千几百万两。有这样的资本，虽不算十分雄厚，但总可以做出一项事业来了。于是在成都设了一座总公司，在宜昌和上海设了分行，由公司的经费更在成都建设了一座铁道学堂。这个脚步好像很可以使那偏僻的四川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一样。

川汉铁路虽名说是川汉，而在当时四川人所计

划建筑的只是由成都到宜昌的一段。但这一段也就是很长大的工程，而且中间还要打通一条巫山山脉。在测量的当时，工程是分成了三个段落的：第一是由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一段，其次是由重庆至万县的渝万，又其次是由万县至宜昌的宜万。在未动工的时候，股东间，否，乃是股东的代表间，起了很大的争论：便是先修成渝后修宜万，还是先修宜万后修成渝。两者各有它的利益，两者也各有它的困难。

譬如先修成渝罢，因为地面平坦，工事自然很容易进行。铁路一容易成功就会使省内的交通增加无限的便宜，使省内的股东们得到铁路的观感，于将来的募股上也可以增加效力。但是要先修这段路有它的困难处，那便是材料运输上有困难。建筑上所必需的材料既不能不仰给于外来，而这外来材料便不能不专赖那峻险的川河来输运。这个困难本来在主张这一说的人是有它的解决办法的，便是铁路公司同时兼营川河的航业，购买些小轮船来使川河的航行蒸汽机关化。然而这项提议终究招了失败，终究是提倡先修宜万的人占了胜利。

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最重要的眼目便是避免了材料运输的困难，而在修成渝上所可得到的各项利益便不能不全盘牺牲了。而且这一段路要通过巫山，正是最难修的一段道路。这在主张先修的人反转成

为了一种理由，以为唯其难修，所以便应该先修。先修成了宜万这一段，使川河失掉了它的艰险，而蜀道也失掉了它的困难。大约在这儿，就像这样，是含有几分挑战性的英雄色彩。——甚么？图大事、成大业者不可畏难苟安！于是，一种土豪式的英雄主义便决定了川汉铁路的命运，两三千万两的股本，一部分归了耗费，一部分归了私囊，一部分成了北方军人的私斗军费，于是川汉铁路终于烟消云散了。

主张后一说的人多半是川东、川北一部分的人，特别是当时在四川知识界中振振有声的蒲殿俊、罗纶一流人物。据反对他们说，他们主张先修宜万是带有乡梓观念，因为宜万先修通，川东、川北的人便先得到利益。这或者也怕是一种理由罢。总之，事实证明主张先修宜万的人是失败了。仅仅在宜昌城外修了十几英里的铁路，在十几年来的抛弃之中，已经随着所有一切的铁材、木材成为了废物。而川河的蒸汽化，一小部分是由四川本省人，一大部分是由帝国主义者，不仅逐步地早已实现到了重庆，而且实现到了嘉定了。

事实是最公平的法官。尽管你是怎样煊赫一时的大英雄、大豪杰，转瞬之间便已证明了你是天下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在当时反对先修宜万、主张先修成渝最力的是

一位工程师名叫胡朝栋。他并不是四川人，但他是那一省的人我却忘记了。他以他专家的资格，以他工程师的职责，做了一本《为先修成渝铁路告四川父老意见书》，这书我是读过的，是报纸十二开的书型，大概有一两百页的光景。他以去就力争，结果是他失败了。同时他就辞去了他的位置。像这样有人格、有主见的胡先生，后来不知道怎样在中国的土木工程界里便再没有看见过他的名字。他是早死了呢？还是有人格、有点骨鲠之气的人，在中国的社会里终竟被埋没了呢？

六

二十年前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的声名差不多就像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一样，四川人恐怕是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他们的。他们是癸卯年最后一科的举人，特别是蒲殿俊，他是那一科的解元。这位先生在四川省外也比较有名，在民国十年代他是研究系的一位重要人物，做过一任北京反动政府的教育次长，也创办过戏剧学校，在《晨报》副刊上还做过些白话文字。他要算是一位比较有才艺的时代儿，然而他的时代已经是过去的时代。

他们生在由封建社会转移到资本制度的一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新兴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在

四川，他们是当时新兴势力的领袖。他们的思想始终是不赞成剧烈的流血革命而想实现出欧美的立宪制度的所谓稳健派。他们和当时主张民族革命的一派“乱党”是成为对立的。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他们这一派便是新兴资产阶级阵营内的右翼。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一方面得到新兴势力的拥护，而同时也得到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宽容，所以他们便得到了荣达的机会。

清朝末年，在宣统那位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资政院。虽然是一种过渡时代的形式，总算是成了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四川咨议局的正议长便是蒲殿俊，副议长便是罗纶。他们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记忆的有邓孝可，有朱山。他们的言论机关便是月刊杂志的《蜀报》。文字是当时风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闺墨式文章，于六朝风味的美词丽句之中，爱嵌以沉痛绝叫的状语；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呜呼”，总是一结便是“噫嘻”的。这种体裁在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着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狮派”的文字了。这种文字在当时自然也不失为是带有革命性的一种。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妇人一样，虽然不是天脚，总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体尽管怎样带有挑发性，而它们的内容却总

不外是一种君主立宪。更换一句话说，便是一方面承认着清廷的支配权，甚或认这种支配权的存在为神圣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参政，要求国会的早开。这种言论是很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宪和孙、黄的排满兴汉的对立，在四川虽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人占有势力，而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鄙屑他们的。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凡是这种思想的实行家，都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对象。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邹容，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我们崇拜温生材，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着的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不用说，就是不甚轰烈的马君武，有一时传说要到成都来主办工业学校，那可是怎样地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憧憬！

我们并不是甚么同盟会的会员，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会员也好像并没有好几个，特别在我们四川。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我们在那些出过外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先生里面找，但始终没有一个像。同年辈的同学们，连

因为我们是插班生，都好像在把我们当成异民族在看待，不消说更说不上。我们读过一些俄国的烧炭党人的小说，以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他们以殉教的精神在从事于救济国家，救济人类的事业，或者他们是为避免权力者的注意，为便于宣传民众起见，他们是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然而我们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依然跟我们的教员和同学相差不多。

分设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刘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来的。就是后来在四川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元祖的杨庶堪，也在那儿当过英文教员。在我们入学的头一年年底，他才和刘士志一道辞了职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他比我们早一年来插班，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先后同班的。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 *abcd* 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

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像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之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自比克来曼梭，自比吾家国藩，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銮、李劫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好像是生在我们的邻县峨眉县。他的父亲在峨眉县做过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后来听说他在法国是研究生物学。

旧的一些同学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别是我们丙班。他们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于他们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于聪明。大凡在学校里爱管事的学生，到头终竟是没有好结果的。能够获得这一点经验的聪明，大抵的学生都会有。我自在嘉定中学遭了斥退，我这个愚蠢人也学得了一些聪明，进了分设

中学以后，自己是有意识地遵守本分了。但谁料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进学堂不久，学堂要对于刘士志先生开追悼会，刘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追悼会也并不是甚么危险的集会，我们丙班的同学公然举了我做筹备员，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而且从此以后，丙班代表的资格，对我说来，差不多成了终身大总统一样。平常对于你尽管冷落，一遇有事时，总把你推选出来。这点厚意我是能够领会的。然而一被举出，我总还是要去担任，或许也怕是我生来便赋有一种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罢。

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学生在闹事的时候，它的性质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乐山小学遭了斥退，是因为要求礼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学又遭了斥退，是因为在会馆里看戏学生和营防斗殴。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说起来真是很可惭愧。然而成都学生界闹事的性质，就我所曾经参加过的看来，毕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天津闹过一次国会请愿，有三四千的群众向直隶总督请求代奏。还有温世霖诸人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计划着以全国学校总罢课作为要求的后盾。请愿结果失败了，清廷把温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

为相隔太远，大凡外界的风潮总要相隔一月之后，然后才能波及。外边的请愿运动已经镇压下去，而它的反响却在四川发生了出来。

时候已经在停课准备学年试验的期中，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丙班的代表不消说又是我。

教育总会是在高等学堂的右手，在午前十点钟开会的一个长方形的议事厅，早被各学校的代表塞满了，为数怕有两百人光景。但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开会的程序都没有把握。讲坛上簇拥着许多人，议论纷纷的开始便讨论怎样开会。坛上的人、坛下的人都争着说话。你插说几句，我插说几句，一直绵延到午后一点钟了，都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开会。因而走来凑趣的人不免也就啧有烦言了。

——“喂，今天到底开会不开会哟？”

——“我们饿着肚子还没有吃中饭呢！”

——“到底是请愿国会呢，还是看你们争风？”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本来是没有秩序的一个会场更加纷乱起来。在这时学生间惯用的催命符，便是在地板上擦脚。

——“好，开会了，开会了！”

发起的人几个争着叫，不知道那一个是会长，不知道那一个是主席，结局依然把会场整顿不起来，连宣布开会都宣布了好几次。

这种滑稽的现象，我想在初次从事运动的团体，大约随处都是有的。在当时不要说是学生会，就是堂堂的资政院或者咨议局都是时常要演一套全武行的。

但在混沌之中突然有一人登坛。这人的面貌很瘦削，大概有三十岁的光景，穿一件青布马褂，戴一副铁丝近视眼镜。他的穿著虽很朴素，但看他的风度却不像一位学生。

他在坛上几次想发言，也终不能如意。演坛上有两三个学生便同时大叫起来：

——“这是刘子通先生，我们请听刘先生说话！”

刘先生的名气我老早就听见过的，但在今天才第一次看见他。他是湖北人，在铁道学堂当教习。他在成都学生间很有声望。就是他这声望把一些无经验、无训练的学生征服了，会场便立刻地镇静了下来。

但这刘先生是教习，为什么那天他来参加了学生的集会，我不甚明白。是他有意来指导，或者是有人特地去请他来的，我都不甚明白。总之，有他的一登坛，会场镇静着了。

大家都在静待着听刘先生说话。

——“同学诸君！”刘先生这样先叫了一声。“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要请愿早开国会，但不幸我们今天的这个会场便没有请愿早开国会的资格！”

他一起便是这样的一句翻案文章，这样的演说在群众中本来很带危险性的：因为群众立地便可以哄动起来。但大约一方面是刘先生的声望服人，一方面也是会场的情景着实令人难堪，所以大家都甘受了他的批判。还有，他这样的一句严烈的批判，很可注意的是实际上并不带有严烈性。我现在过细地研究它的原由，怕他所用的人称是“我们”而不是“你们”罢？他开口一声便是“我们”，这样他自己便忘记了他的教习的资格，他是和学生群众合成了一体。学生群众的错误他也把来加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在这样一字间的差别，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教养，而且也可以判别一句话的力量。

刘先生的演说，结局是并没有甚么崇论宏议，他下了一句批判之后，只是说：“今天的会不是这样开的，应该先推举出一个临时主席，再来讨论本会的进行，产生出本会的决议。在我看来，今天我们的话已经说了不少了，凡是到会的人对于今天的宗旨没有不赞成，没有多作讨论的必要。我们最好是赶快产生决议来从事进行。我们应该进行的步骤，我看是第一

步应该组织一个常务机关，第二步是举代表去见咨议局长，请咨议局把这次的运动扩大起来，第三步是请四川总督代奏。此外如像通电京沪学界表示声援，通函省内各学校各界共同起来参加，都是今天本会应该急于解决的事。大会把大纲决定了，就移交给常务机关执行，一刻也不能容缓。”

这样简单的几句话，真好像是拨云雾而见青天，赞成的声浪在全场中沸腾了起来，有的竟高声叫着：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主席！”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代表！”

——“我们就举刘先生做起草委员！”

大家在这时候也把刘先生的身分忘记了，忘记了他铁道学堂的教习。

刘先生的这一番指导在我们目前已经充分受过政治训练的学生界看来，本来只是家常茶饭，但在当时的学生界，而且在当时的四川，它的评价却不能把今日来做标准。那样简单的一种实地训练给予了学生以多大的经验，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

会的后段便很顺畅地进行起来了。由几个高级的学校的代表组织了一个常务机关，分头去进行各

种事务。大抵的决议是：

1. 要求在明年便开设国会；
2. 要求四川总督代奏；
3. 一律罢课，不达到目的，誓不复课。

七

当时四川的总督是赵尔巽，他在清朝末年要算是一位有数的重臣。他是汉军旗，便是他的祖先本是汉人而投降了满人的。这种“奴才”对于他的“主子”——当时的大官或一般的满人都称清室为“主子”，称自己为“奴才”——自然是要表示两倍的忠诚了。

学生在第三天上又开第二次的代表大会。目的是报告常务委员会成立后的经过，及今后进行的方针。

开会仍在午前十点钟，但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早就有不少的武装警察和营防军，在步枪上上着刺刀，在教育总会的门前巡逻着了。

这对于学生是很大的威吓，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明哲保身的人预感到今天会发生甚么危险，在报到簿上偷偷地签了名，偷偷地溜走了；然而到会的人依然踊跃，到开会的时候，小小的一个议事厅又塞得像一匣火柴了。

受过了一次训练的群众毕竟不同。一切开会的景象都很井井有条，和前一次的开会判然是两个时代。

开会了。劈头的一个临时动议是质问当局为甚派兵来弹压。当时的封疆天子虽不必身在九重，但那容你几个毛桃子的学生便轻易见面，轻易质问？唯一的拐杖当然又只好去找咨议局的正副议长。

据代表回来报告，他们去会着了蒲议长。蒲议长顿时打电话（当时已有电话，但只限于行政机关）去问警察厅，说是奉了赵制军的命令，怕有乱党借端生事，特地派来保护的。说是蒲议长昨天已经去谒见了赵制军，赵制军已经允许了为我们代奏。照赵的意思以为学生关心国事是出于爱国的至诚，固然可以嘉许；但不可越俎代庖，甚至罢课要挟。

我们的代表质问过议长，问赵答应代奏，究竟有何诚意的表示？他口头答应，而实际不执行，有什么方法保障？我们请开国会即是求言论集会的自由，然在我们今天开会的会场上却派军警来弹压，岂不是完全表示了并无代奏的诚意？

蒲议长自然不能代答，他允许再去见赵制军，一切的回话等得到结果之后再亲自到会场上来报告。在他未来之前，大家应该严守秩序，决不可轻举妄动。

一省最高的言论代表者的议论大家自然是只有遵守的。在代表们报告完毕了之后，已经是午后一点钟的光景，便宣告中休，大家吃用会上准备好了的馒头。馒头，这真是再得机宜也没有的，像前回为饿饭诉苦的代表当然也就没有了。

在学生们休会用馒头的时候，到场的军警差不多全部都把枪架在教育总会门口，在附近的吃食店里，各自去解决他们自己的切身问题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支配阶级的爪牙，真是有点超然物外的神味。假使当时学生要暴动，那不已经是送来了很完备的武器吗？一切都是进展着的，便是支配阶级杀人的手腕也是一样。

有一位比较老一点的警察，大概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他还在门外站岗没有去吃饭。我看他人很和气，看见我们在吃馒头，好像很有点垂涎的样子。

我问他：“老总，你肚子不饿吗？为什么不去吃饭？”

——“不饿？你说我不饿？哼哼，小先生，吃饭要钱呢。”

——“你们平时站岗不吃中饭的吗？”

——“平时是要换班的，今天是专差，署长叫我们没有命令不准动。我们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大清早派到这儿来，又不派人来替代。”

——“我好不好送两个馒头给你？”

——“哼哼，”他只是笑。

这儿真是立地表现出了一个天国。究竟是饥饿的力量、馒头的力量大，它立地可以使狮子和婴儿同游，老虎和羔羊携手。

——“小先生，今天你们到底为甚么开会？”

——“你们还不晓得吗？我们是请愿早开国会。”

——“国会国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管国家的大事，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说话。”

——“哦吓！”他很惊骇了的一个神情，“怪不得我们的署长老爷说你们要造反啦！”

这个泛泛的插话，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有趣味。我们在请愿早开国会，而当时的支配阶级说我们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认我们在造反。我在当时不消说还替他解释了一下，怎样怎样，如此这般的并不是造反，然而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不真正是在造反吗？造反就是革命，现在想起来那对于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要求立宪，不就是革命的行动吗？当时的所谓“革命”是“灭满兴汉”，乃至是投炸弹、拉手枪，甚至于有时指斥要求立宪的行动是保皇党的行动；但由现在看来，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吗？当时的革命党人以为清廷是一切罪恶的渊藪，

当然也就是立宪的唯一的障碍，但这个见解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并没有摩着实际。中国在清朝灭后已经二十年，不是一直都还不能立宪吗？中国在帝国主义者的宰制之下，自己的这个资本制的革命，始终不能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完成。它无论怎样是会要飞跃的，就是两步要当成一步走。中国在不能脱掉帝国主义宰制的期间，它始终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级上闹轩轻戏。

会场在继续开会的时候，大概已经两点钟过了。这时又来了一批新的巡警，他们走来便把刘子通先生提去了，说是提学使司要请他说话。

刘先生在会中指使，当然有内探已经向当局报告了。大家阻挡着，劝他不要去，但他终究去了。他以为不会有甚么意外，就有也用不着畏怯。

刘先生去了，但从此以后便渺如黄鹤，不仅那天他没有再回会场，就在四川的学界也永久没有他的形迹了。有人说他是被递解回到了湖北，但是以后在中国的活动上也就再没有看见“刘子通”这个人了。我想，他或许在四川遭了暗算，或许是在武汉起义的时候，他已经阵亡了。

刘先生去后，群众事实上是失掉了它的领袖。他们等蒲议长的到来，而蒲议长却终不容易到来。时间

迟缓得就和癩病患者的脚步一样，只带来着许多的焦躁、愤懑、恐怖、不安。直等到蒲议长的到来，已经是快要上灯的时候了。

我第一次得瞻仰蒲议长的风采的便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貌不惊人，我现在也想不出他有甚么殊异的特征。不过他来的声势真是浩大，大家一听说他来，便都狂涛一样拍起掌来了。拍掌的声音差不多一直等到他登了台开口说话。

议长的声音很尖锐，不过他的说话却还井井有条。我很感谢他的是他把当时要求立宪运动的历史，叙述了一个梗概。

中国立宪运动的具体的表现大约是发轫于戊戌政变，但最可注意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就是民国前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这个公会的发起，江苏的新兴资本家张謇，是主要人物。运动的起源是由英国资本家手里争回沪杭甬铁路，在这争路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便一转而为立宪运动。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一个最规范的事实。将来假使有想编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中国资本家政治运动发展史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占最重要的一篇。

就因为有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提倡，所以一时才四方响应起来。在宣统元年（民国前三年）才有九

年立宪的诏书，到宣统二年更由这些人斗争的结果又才有六年立宪的缩短。当时一般新兴阶级的要求是在宣统三年就要立宪，我们学生界的运动，自然就是承继着他们的意识。

蒲议长不消说也是当时斗争中的健将，他是才从北京请愿了回来。温世霖的被捕，外边运动的风潮已经镇慑，他是知道的。四川学生界的运动，只是圈外的余波，当然他也不会有甚么不明白。所以他始终劝学生不要操切，他以为只要省当局答应了代奏，尽他口头也好，实际也好，只好暂时认为满足，静待时机。而且他说，当局是有意拿人，假使运动尚要继续，那就非出于流血不可了。

议长的舌锋便突入革命与立宪的问题上来。他说两者的对立便在这儿。一种是以非法的手段争夺政权，一种是以合法的主张要求立法。只有法是必由之路，只有依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议事厅必然要由门径，不能打破玻璃窗乱跳。

议长的话很有他的条理，学生方面终觉驳不倒他，然而总感觉不到充分的满足。自然，在老人们看来，总会说这是学生幼稚，学生的客气未除。但仅仅这样的批评终竟是难以使人心服的。譬如入门不跳窗眼的譬语，那只是片面的事实。万一有甚么意外的灾难，突然逼来，你就要不跳也不容许你不跳。这就

是所谓突变的理论。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明白地认识到的，然而真理的影子总暗默地反映在人的脑中。

夜分已经深了。

蒲议长辩论了一番，劝解了一番，但没有得到一个决议的形式，他便走了。不过他的辩论、他的劝解也好像收了很大的效果。在一部分的代表辩论正热烈的时候，多数的人已经在络续地退场。刚才拥挤得像一匣火柴一样的会场，真个又像一匣使用着的火柴一样，一根二根的抽出，抽到后来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了。

人一少，会场的热度自然也就减退了下来。还有是大家奔波了一天，疲劳和黑夜女神随身带来的睡药，帮助把问题暂时告了一个结束。大家最后的决议是：一律再继续停课，拒绝试验，侦查刘子通先生的下落。

就这样，在一个不得要领的观望的形势之中，也就只好宣告散会了。

在我们退出会场的时候人已很少，早来的军警依然还在那儿站岗，有的在纷纷吐出怨言：

——“妈的，今天不晓得见了甚么鬼！”

八

在学生无法下马的时候，当局者绊马的方法已

经准备周到了。

就在宣布继续罢课的那一天下午，提学使司有一道很严厉的通令下来。禁止学生借故生事，罢课要挟；假使有不听命的，还要惩办各学校的办事人。

这对于学生运动不消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起初开始运动的时候，因为运动的目标纯全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所以各学校的办事人，无论是怎样顽固，或内心是怎样的惴惴焉恐惧、怕犯所辖官长的逆鳞，然而在表面上总不能不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这回提学使司的命令下了，而且还要惩办他们，这比甚么早开国会自然是要更切己得几百倍；他们的态度也就靠着有这样一个借口，由放任一变而为高压了。

事实上是学生自己也临到了不能继续罢课的关头。平常学生罢课，除极少数是热心运动之外，大多数是趁趁热闹，乐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动机与其说是热诚，宁肯说是偷懒。在这一次运动的开始宣告罢课的时候，是处在一个很有便宜的时期，便是各学校都已经在准备试验的停课期中。有的应该毕业的班次也因毕业试验提前开始的结果，大都已经试验完毕，只在等待文凭的分发了。

但不幸的是已经罢课三天，试验已逼在眼前。在试验未开始的期中，尽管名目是在罢课，其实大家是

在按着课本拼命死读的。别的学校、别的班次是怎样我不十分知道，至少在我们丙班，从这儿后来出了不少的国家主义者的丙班，他们之所以举我为代表的心事，我是十分明白的。就是说：让你这猪头三去为我们撑门面，你没有时间温课，也好让我们来高列。在当时科举才废止不久，试验的观念在学生们的眼目中比自己的生命怕还要重要。好像自己来当学生，便是专门为来受试验的一样。这逼到临头的试验，对于运动的进行，比起五百道提学使司的命令来，是更加顽强的阻碍了。

在这儿，教职员与学生大众的利害完全一致，少数学生代表便在虚空中倒悬起来，成为了两种群众的公敌！

分设中学试验的开始就在罢课后的第四天。丙班的第一堂试验是英文，从一大清早起，自修室里都在“but cut”的乱念。大家都把钢笔、墨水准备得上好，自然是待机行事了。

八点钟了，已经摇了课堂铃，英文教习的H先生已经上了课堂，坐在黑板面前等着了。但是人的羞耻心毕竟还有它最后的一番控制，想受试验的心事，想升班的心事，尽管怎样迫切，而出卖团结的一种工贼式的行为，谁也不愿意来做一个魁首。在自修室里面你观望我、我观望你地只是不动。监学走来劝告了。

就跟从豢牢里赶羊子上屠宰场一样，一个二个从自修室里拉出房门，但等他前脚走进第二室里，第一室的人们又一个二个地退回自修室去了。所谓“扶得东来西又倒”，甲乙丙丁四班人，弄得两位监学疲于奔命。

监学的劝诱不行，最后是监督走来了。

监督的都喇嘛先生照例是像长颈鹿一样，把脖子向前面伸长着，一手理着他的八字胡须，一手垂在长统的袖子里面，一拐一拐地摆着他的官派脚步走来了。

——“唔唔？你们为何不上课堂？唔唔？你们为何不上课堂？”

从甲班说到乙班，从乙班说到丙班，但仅仅是这样一种催促要把群众的羞耻心克服是不够劲的。

喇嘛先生毕竟是老手，他看到集体的劝说不可行，他使用分散的办法，向软弱的各部分来个别击破。他第一步是去诱导乙班的那十几个满人。成都是有满人驻防的，所以乙班里面便有十几个满人学生。这十几位同学平常和我们汉人都不大接近，他们自己另外形成一个部落。自修室和寝室都是聚在一处，我们平时也就称他们的自修室或寝室为“满城”。他走进满城去劝那些满人学生。

——“唔？你们真蠢！你们也要罢甚么课？你们

要和你们的主子作对？”

他公然用民族的感情来歆动，那些满人学生首先就被他歆动了，于是乎他们便先上课堂。

喇嘛先生得到了这一着的成功，他便加添了一倍的力量。他放下了甲乙两班比较年纪大的学生，又来专攻丙丁两班。

——“你看，你们为何还不上课堂？乙班都已经上课堂了。”

大家仍然不动。他又捡着丙丁两班的比较更年青的小孩子来拖。

——“喑，你们这些小孩子，你们为何也要跟着他们大孩子闹？你们也要去参政吗？吓？你看，乙班都上课堂了。喑，你们真蠢！你们跟着他们大孩子闹，你们是受了骗。喑，你们知道吗？像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那些承头的学生都受了毕业试验的。他们受了试验，让你们来罢课。你看，你们蠢不蠢，喑？”

小的被他拉出来一个。但等他去拉第二个的时候，前一个又跑进自修室里去了，依然就跟拾取地上的板栗投进没有底子的提篮里一样。

——“都先生，我们不是满人呢！”

——“都先生，我们不好做汉奸呢！”

——“管他是满人也好，汉人也好，你们小孩子要参甚么政？不怕人家笑脱牙齿吗？喑？”

然而结果还没有效。

都先生又想出了一条妙计来了。他见一个二个的拉夫式的办法不行，他便叫两位监学把丙丁两班的学生全体整列在自修室门外。自修室是一排北向的六间房舍，和丙丁两班的讲堂相隔仅一个天井。

他也并不是要来演说，从前的旧人对于演说这一套本事是不大拿手的。他依然还是那种劝说的调门。

——“好，我看，唔，你们是害羞，你们怕先走了，别人笑你们。好的，我来给你们叫口令，你们一齐走过这道天井。唔？唔？你们——用意——！”

大家都笑起来了。喇嘛先生得到这一笑，以为他的幽默收到了成功，他更提起了他那种半像京腔不像京腔的声音，又来了一声——“用意！”

——“好不？我叫一二三，你们便一齐开步——走！好，来啊！一……二……三！一齐开步——走！”

尽管像在跳猴戏的一样，表示得异常滑稽，然而走还是没人走。

像这样低首下心的滑稽过后仍然发生不出效力，于是乎恼羞成怒了。喇嘛先生把一个古铜色的面孔气胀成了一个鸡血铜的面盆，八字胡随着他嘴唇的痉挛，就像去了戥的天秤，在一上一下地摆动。

——“唔？唔？唔？你们……你们……你们要和

我作对！你们这些糊涂虫！”

这样暴怒着的喇嘛先生，在他的心里依然在运用着策略的。他知道我是丙班的代表，他大约以为我真是一班之王，他便用下了擒贼擒王的手段。

——“郭生！”他唤我，“你可以叫他们上课堂啦！”

——“连监督都叫不动的，我怎么有那样大的魄力呢？”

——“那吗，你就先上课堂做一个榜样！”

他这一道命令真是咄咄逼人。

——“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

他棱着眼睛看了几眼，胡子翘了几翘，他愤愤地走上阶沿，走向他的居室里去了。但他刚好走进房里又退了出来。

——“张生！郭生！”他站在阶沿上气愤愤地在招呼着张伯安和我。

——“你们上来！”

我和张伯安服从了他的命令，沿着自修室前的北阶走上他站立着的东廊上。那儿的地基比自修室的地基高可两尺，临着天井的廊边是有一带回栏可以凭坐的。

我们走到了他的面前，他当着两位监学和两班

的学生便痛责我们。

——“啊，你两个！你们真对不住我！你们在本地中学肇事遭了斥退，是我把你们收容了进来。啊，你们，啊，你们！我以为你们可以改过自新，啊，你们又再来和我作对。你们又在这儿来肇事，把一切很好的同学都带坏了！你们到底上课堂不上课堂？不上课堂我要斥退你们！”

“都先生，”伯安也很愤气地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你要斥退就请斥退。”

伯安我真不知道他走的是甚么命运。从前嘉定中学堂的斥退是因为我连累了他，这回又是我把他连累了。喇嘛先生说要斥退我倒还有理可说，因为我当了代表，但是伯安并没有甚么罪过，他之不上课堂也就跟全班的人不上课堂一样，不是甚么罪魁，也不是甚么祸首。

好的，我们又算遭了一次斥退。要说是宿命，怕也只好说是宿命罢。我们当时便退到自修室里收拾书籍。两位监学在自修室外面对着丙、丁两班的学生威胁起来了。

——“好，你们看！为首的两人都斥退了，你们自己还想怎样？你们假如也遭了斥退，看你们回去怎样见你们的父兄？”

是的，对于羞耻心的压迫得到了一个缓颊的口

实了：为首的都已斥退，我们还想怎样呢？

就这样连拉带劝地把一群半推半就的学生便劝上了讲堂。

姓罗的一位同学，他和我们是同自修室的，他还算走得顶迟，在他和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和我们一一拉了手，问明了我们住的旅馆，他说他今晚上要来看我们。

那位懒得最彻底的姓李的同学（我真是对不住，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自始至终是陪伴着我们的，他看见一个二个人都上了课堂，他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来。

——“妈的一个×！”他很大地叫了一声，“办你妈的一个鬼学！老子也不愿意读书了！”

他在书桌上打了几拳，愤愤地也就把他的书籍收拾了起来，跟着我们走进寝室。

在我们把一切行李从寝室里搬出来，从东廊上走过的时候，大家都在讲堂上埋头受着试验，真是寒蝉仗马，悄然无声，比起刚才四五十分钟前的光景，就好像隔了四五个世纪的一样。

走过都监督的居室的时候，听见他在室内明声朗气地诵读很高古的《虢季子白盘》的铭文：

……丕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

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

声音继续到我们走出了的学堂门外。

第 二 篇

—

照阳历来说，在我们闹国会请愿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一一年了。一九一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华老大帝国的商标——黄色大龙旗就要改变，这有甚么人曾经梦想得到呢？

清廷在他的末年由于外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了一个旧有的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然自鸦片之战而中东之战而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旧有的封建势力被外来资本主义打得一败涂地，从此便不能不折首请降，一转而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爪牙了。

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传染病。它到东方来，把东方固定了几千年金瓯无缺的封建社会弄得七零八碎，而它同时在中国内部也播下了它的种子。这种子刚好就像过了节季的花草一样，一播下去便蓬然地发生了出来；于是中国的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便改换了形式，从前是与国外的资本主义斗争，现在是与国内的资本主义斗争了。在这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便成为旧有封建势力与外来帝国主义的共

同敌人。在这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是利用旧有的封建势力，而旧有的封建势力要维系着它的支配权也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自从庚子以来一直到现在，这差不多是成为了固定的方式。

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它起初战取它的位置的时候，它不能不遇着两重敌人：一方面要和国外的帝国主义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和国内的封建势力巷战。大资本家张謇关于沪杭甬铁路的抗争一转而举出国会请愿、立宪要求的烽火，不正明白地表示着这个路径吗？更明白的就是这个方式的复写而更加扩大的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这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在现在看来，并不是有多么大的光耀的。自民国成立以来，革命的果实为一小部分人所垄断。革命纪念日定为武汉起义的十月十日，由资本主义所酝酿成的中华民国就好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祇所创造的一样。其实这完全是想以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真正的历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来，他会知道辛亥革命只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延长。中华民国的双十节怕至少应该改成双九节罢？

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势力达到了它最后的专制阶段。由于要和国内新起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便尽力主张中央集权，把素来就和封建诸侯一样的各个省

份，各个省份的督抚的军民财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中央。在这儿更加上了一种民族感情，便是满人对于汉人的排满，也就极端的排汉。宣统小儿皇帝一即位，把一时炙手可热的袁世凯谪贬，大大地起用满人亲贵，使汉人不得入掌军机。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立宪运动的牵延敷衍，对于请愿国会的重要人物的拿捕，变相的科举制的复活，这些都是封建势力的独裁专擅、倒行逆施的表现。而在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势力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个斗争最赤裸的表现在盛宣怀的入掌邮传部，而施行他的铁路国有政策。

国有政策，在这政策的本身宁是可以奖励的。它的最高尚的动机不消说是想加速度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进展。因为中国商办的资产事业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粤汉铁路以四五千万两资金仅仅修了两百里路长不生不死的路轨，川汉铁路的三千万两资金在未动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烟消云散之势。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所触目到的便是办事人的中饱。一方面中饱的恶习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胃癌，而中国的资本的来源又敌不过这个无限量的中饱。所以像盛宣怀那样比较有点产业上的智识的人，他自然会提出这种国有政策，而以外来的雄厚资本，来代替民间的类似刮骨抽筋而来的一点薄弱的资本

了。

盛宣怀所找的财东便是当时由英、美、德、法四国所成立的银行团。他所要收回国有的对象便是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

这在形式与实质上结局只是国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商办诚然是腐败。他们知道腐败的原因一大部分是在中饱，而他们不知道中饱的原因又是甚么。商办公司的一些董事、理事，结果不外是一些腐败官僚，即是旧有的封建势力。由这种腐败官僚的手里又接收到腐败官僚的手里，这样便可以免掉他们的中饱，免掉事业的腐败吗？

中饱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便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中国人自己要修铁路，而一切的材料和工具都不能不仰给于外国人，在这中间还要经过几道的转折。你想，你中国有多大的资本来供这种层层剥削呢？所以结果是资本耗费了，而事业却没有眉目。近视眼的人们只看见事业的没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经营权取消了，而移交给资本主义。

产业国有本是很高尚的政策，借外债来举办产业也未可以无条件的反对。然而，重要的是要你不受债权者的控制，要你把自己的私有欲望克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能够办到吗？在中国的当时更能够办到

吗？

铁路国有的上谕是那年五月二十二日（阳历）下的，反响便是民间的反抗。起初是湖南、广东的人士起来斗争。当时外面斗争的情形我们不甚明了，大约粤汉铁路的股本没有川汉铁路的来得那样“括夺”，在那外面的反抗运动渐渐阴消下去的时候，四川人的猛烈的反抗热，却如像死火山复活的一样，突然爆发起来了。

四川的运动照例是要比外边迟一两个月的。运动的开始是在六月间，有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全省大中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者可以说七千万人都全部参加了。结果是九月七日赵尔丰的屠杀，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暴动，攻打各地的府县城池，围攻成都，有一个时期把成都围得来几乎水泄不通。九月十日清廷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把鄂军先后带领了几旅人要去剿灭四川。到这时候武汉才乘着这个机会于十月十日起义。于是各省便先后响应，到翌年的二月十二日，小儿皇帝退位，清廷终竟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权双手捧交出来了。

所以公平而且严格地说，辛亥革命的首功是应该由四川人担负，更应该由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担负的。虽然他们并没有革命意识，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发动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发动

者。事实是这样，这并不是我们目前想有意阿谀，或有意翻案。这场革命是中国社会史上最典型的一个插话。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表现，而且也是由经济斗争转化而为政治斗争的。因此，我认为它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和扩大。在叙述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特别是在叙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反帝国主义斗争史的人，这个插话，便是川汉铁路的发生、经营，一直到保路同志会的转化而为暴动而为革命的详细史迹，有值得我们十分留意的必要。我想凡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人，特别是四川境内的朋友，应该在目前赶紧把那行将散佚、或者已经散佚的材料，尽量收集起来，加以合理的整顿。那真是一个很有价值而且很有效用的事业。因为这件史事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上，它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绝好的例证，而且它还明白地指出了中国将来的去向。中国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当前的敌人封建势力的斗争要算是得到了意外的胜利。封建社会的中心势力的清廷倒溃了，铁路国有政策没有实现，而且由立宪运动一跃而办到共和政体。五条颜色的商标已登录了将近二十年，然而斗争中心的产业问题是怎么样？川汉铁路不是早已阴消了吗？粤汉铁路不是依然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侏儒吗？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岂不是在形式上虽然打倒了当前的一个敌人——不消说在实质上这个

敌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倒，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它却只在它的掌上翻筋斗吗？

这个更大的敌人是谁？

就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地控制着了，使你中国成为一个永远的乡村，使你中国人的产业永远没有方法发展。

因而保路同志会的运动，乃至结晶为辛亥革命的整个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结果是失败了。它的失败却告诉了我们一条路：中国革命自始至终应该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而这种革命不能由中国资本家的手来完成。

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是过了节季的播种。它在不适当的温度与各种条件之下，始终得不到它应有的成长，而它在畸形的状态之内很快地就达到了它的衰老时——下行阶段的反动时了。

二

说来差不多好像是一种奇迹。

都喇嘛先生那样严烈地说要斥退我们，我们自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吃学生饭了。然而，他终究没有挂我们的斥退牌。在现在想来，事实上他也没有挂斥退牌的必要。他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仇恨，他又何尝

不知道我们也并不是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过使用了小小的权术，杀鸡给猴子看。他是把我们弱者拿来做个榜样，在一般学生面前显示一番威风，好教别人震恐。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他当着众人骂了我们一番，全堂学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了课堂，去受试验。我们当时就搬出了学堂，他又何必要费一番挂牌的手续？

凑巧的是就在我们搬出学堂的那一天，大哥回省来了。他和我们同落在东大街上那家嘉定人常住的旅馆。

大哥自从乙巳年（一九〇五）出省，他在日本学了几年的法政。后来回到上海，在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里做过工作。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在北京考上了法科举人，得到了七品小京官的头衔，分发在法部衙门里行走。他这次回省来了。他回省的消息早就有的，但没有想出他回得这样快。

我们是六年不见了。这六年不见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绪。他听说我们遭了斥退，也没有十分责备我们。他反而安慰我们说：

——“斥退了也不要紧，明年好进官班法政学校。”

接受了他这个安慰时，委实说，我不免感受了一番惊异。他在去国之前不是再三叮咛过我，要学实

业、要学实业的吗？他不是常常说实业救国、实业救国，要振兴实业才可以富国强兵的吗？曾几何时，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儿回来，而他又劝我去学法政了。

他回成都，是受了官班法政学堂的聘请。成都的官立法政学堂有两个，一个是官班，一个是绅班。官班收容一些候补官员或宦家子弟；绅班便是一些绅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来是我们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那真腐败得有点程度。那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封建余孽，上学下学都坐轿子，有的还要带着跟班。这样的学校，他要去就聘，我已经有点诧异；而他还劝我去当学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不过我们那时候对于他还有点原谅，因为他是才回省的人，他不大明了学界的情势。

他回省便有很多的交际，一时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着我们，要我们和他同路。

来访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分设中学的甲班已经是五年级了，每周有两点钟的法制经济，要请大哥兼任。没想出这两点钟的法制经济便成了我和张伯安两个人复学的交换条件。他对我们大哥说：这两个学生平时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不该乘着一时的感情为别人所利用了。他要我们再进学堂去读书，到下学期开始时补受试验。

就这样我们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读书，仍然住的是分设中学。

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甚么收获、甚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了。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究竟是在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经不能确定。我所能记忆的只是快要受暑期试验的时候，而且开会一天的确是礼拜。所以推算起来，在阴历总是五六月之交，在阳历总在六月后半。运动的发生离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相差了这么久的原因，也因为要召集股东会议，不免需费一些时日。

这次的运动，主持者就是咨议局的一批新人，在开股东会议之前他们有一部分人已经在鼓动着反对的空气，因而学生的工作倒反没有甚么了。

在开股东会的那个礼拜日的上午，我们几个学生在一位泸州人的英文教员家里闲谈，那时候来了一位当时的青年名士朱山。这位朱山先生好像也是泸州人，他和罗纶、蒲殿俊是一党。不消说他也是《蜀报》的一位编辑，他会做旧体诗，在当时很觉得清新隽逸。他还相当年青，在当时怕还不上三十岁。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会你去参加不去？”
英文教习问他。

——“我去参加的。”

——“你看这一次可以闹得出一个名堂么？”

——“嗯唔，”朱山冷笑了一下，“趁趁热闹罢了。”

我们和他本不相识，看他来了，便让座。听他说了这几句话，我们也就起身告辞了。

我的堂兄，三哥，他在铁路公司做科员。每逢礼拜，照例是要到他那儿去一次。在股东会开会的时候，因此我们也得以在那儿参观。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钟琪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会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

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

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他们当时真是有点本领，把那满场的股东群众，好像抻成了一团粘土一样。

游说，在现在说来，就是宣传。这是很重要的。那一股的干事好像是罗纶兼任。游说股中要分派出

四位游说员向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道去宣传。这也是当场由各人自己来担任的。我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上午在英文教员家里的时候，不是说过这次运动只是“趁趁热闹”吗？然而这时候他登坛了。当罗纶在坛上大声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那一位同志担任？”

朱先生两脚跨到方桌面前，激昂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我朱山担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满面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个茶碗上，把茶盖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处飞溅，手也打出了血来。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料。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报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那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保路运动的指导者们，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在同志会的部署大体就绪之后，又是一个临时动议，便是全会场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门去请愿。这不消说是没有人不赞成的。大家从铁路公司走出，沿途步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都簇拥着跟来，走到藩台衙门的时候，把那辕门里面的一个大敞地完全站满了。

这时候赵尔巽已经调京，继任的他的兄弟赵尔丰，还在西藏。在这过渡期间是藩台王人文在署理。他在当时确是比较进步的分子，四川保路同志会能够收到那样的成功，一多半应该说是他的功劳。

群众拥挤在藩台衙门的大堂面前，为首的罗纶先进衙门里去了。不一会朝衣朝冠的王藩台走了出来。群众狂欢地鼓掌。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

一位师爷提了一把太师椅来，王藩台立在太师椅上和群众说话。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着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始终表示同情。他自己虽是云南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乡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更何况是有关桑梓的利益！所以这次的问题，他要向朝廷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官僚而能和民众接近，而且对于民众加以煽动。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老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甚么顾忌呢？于是乎保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像在火上加油了。

三

保路同志会在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庶政公诸舆论”，一个是“铁路准归商办”。这本来是从光绪皇帝的一道上谕上摘下来的。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这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预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争斗。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

罗、蒲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们对于光绪皇帝特别崇拜。上面的两个口号采自光绪的上谕可不用说，由保路同志会发出来的命令，要四川人在争路期中一律都供光绪皇上的牌位。理由之一是以戊戌政变的一个插话，表示这位满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时川汉铁路准归商办又是他所允许的。供奉光绪皇这个策略，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像小册子、日报，都络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光绪皇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在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然而，它在当时的效果，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

礼拜。

这给大家的效果是怎样呢？

这使运动带着了一种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时代的迷信，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之下统一了起来，团结了起来。

在封建社会的教条之下束缚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乱，不忠不义”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地要教他起来造反，要教他起来革命，哪怕你就要杀他的头，剿他的家，他也不敢担负这个罪名。在当时从正面来运动革命的人，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反而由群众误会为“乱党”或“会匪”，其原因也就在这儿。好了，现在大家都供的是光绪皇，大家的行动是对于皇帝的忠义。这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造反。有了这样一个保障，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来了。

铁路公司的股东是由各县派来的代表。在成都所拟定的宣传方针、运动步骤，便照样地传到各县。于是，俄顷之间运动便遍及于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绪皇的牌位之外，每条街道都要扎扎“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扎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旧式的街道本来是不十分宽敞的，在街心再搭上过街台，街道两旁差不多是不留遗地的。台又并不高，有的人从那下面通过时都要低头或弯腰。

这些过街台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时的市民非常虔诚，对于圣位台的扎扎煞费苦心。有的装饰得很辉煌，结彩张灯，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烛的三跪九叩。

最有趣味的是对于当时官场所发生的影响。市民在顶礼皇帝，无论是怎样反动的官僚也不能够哼出“不是”。当时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职员之类的准官界，有一种很流行的恶习，便是坐弓杆轿子。这弓杆轿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样，两支轿杆朝天穹窿出去，好像两张弯弓一样。但同时在横的平面上也是取的弓形，结果是形成一个橄榄形，两头是尖削着的。两头的轿夫，把轿子跨在肩上，刚好挟着一个颈子。在轿子前后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两肘紧挟着胸廓，两手紧擎着轿杆的。轿夫自始至终都是跑步，跑的时候一前一后的轿夫只是硬着颈子向前蹿，两手摇摆得很高，口里不断嚷着“边让，边让”。像这样跑当然容易疲倦，所以每乘轿子的后边总有三四个跟着跑的空手，预备着在街上随时换班。

这样的轿子跑起来很快，轿身又高，坐轿的人真好像是坐在云端的一样，显得很有威风。这不知道是那一位发明家的发明，我自出省以来，还不曾看见过。我想，这大约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过的人发明出来的罢。因为他们习惯了电车或者汽车的生活，所

以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发明出一种调子比较轻快的工具。那橄榄形的弓杆或许也就是从电车下面的发条装置所脱化出来的罢？然而，那全体的结构，看来实在是很不安稳。重心离地太高，如果偶一不慎，岂不会横倒在街心？

我们可以想见了。你想，成都城内每条街都有圣位台，而每座台子至多只有一人来往高。那吗，怎么通过官长老爷们的轿子？而且是那种作威作福、横冲直撞的弓杆轿子呢？于是乎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位台低而弓杆轿废。成都的市面真是比下上谕禁止还要神速，立地便断绝了肩舆和别种交通工具的往来。我们再可以想见了，你想，一切的官僚，就是督抚司道，在他们有事要进出衙门的时候，都不能不自行走路了！这在当年是多么珍妙的一个现象！

有一个笑话。

成都是有满城的，就在城内的西南隅。只有在这满城里面没有搭圣位台。有一次，在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满将军要拜会总督。他坐着轿子从一道城门出来，走不多远便遇着一座圣位台。他问明原故，知道供的是光绪皇帝，他在轿里说：

——“这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回轿去从另外一道门出城，又遇着同样的圣位台，他又叫道：

——“又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就这样，他走了三道城门终竟走不出来，他在事变中就一直没有出满城一步。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呢！在当时成都的人差不多人人都引以为快。官府的虎皮被剥掉了，官府在民众的战术之前投降了。

在成都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在地方上的各府州县的情形大约也是这样。几千年来的官威一时倒塌下来，这倒不能不说是类似天变地异。

赵尔丰是有名的杀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户”。他曾经做过四川的永宁道尹。永宁一带山高路险，与贵州连界。往年民不聊生时，多流为土匪。赵尔丰串通永宁劣绅傅华封，竟洗杀了不少村镇。他因而升了官，做到住藏大臣，当然是利用他杀人的本领去镇压西藏的兄弟民族。就因为他是“屠户”，他有杀人的本领，又因为赵氏一门是清室的忠顺奴才，所以清廷把他提拔起来，承继他的哥哥赵尔巽，做了四川总督。

四川人都有点怕他，听说他要从西藏回来，大家都有点悬心吊胆。所以一方面对于他表示回避，一方面对于王人文便尽力地挽留。但是在他尚未到任之前，王人文却被始终主张剿灭四川的端方参了一本，

说他收揽民心，养痍貽患，结果王人文是革职调京，而屠户也公然到了成都！

赵屠户到成都的日期是当年闰六月初一，阳历七月下旬。他到成都以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没展。

那样有名的屠户上任的当初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来，这正表明当时的运动已经深入于民间，所以他不敢造次。同时他自己的官阶也已经达到了应该持盈保泰的时候了。假使清廷不操之过切，铁路督办端方不火迫他，让他一方面软化那些知识阶级的首领，对地方上逐渐地用严烈的手腕进行取缔，四川的乱子不一定就会闹到不可收拾。但是清廷一再的逼迫他，逼得他在九月七日终竟把罗纶、蒲殿俊和其他几个领袖通同拘禁了起来。

在这次的运动中，蒲殿俊自始至终没有出过水面。这在他们的计划中便是预先准备着一个退路，预备到高压临头的时候，蒲殿俊好出来转圜，做一个和事老。毕竟是“屠户”的赵尔丰，他竟连这点机微都没有看到，他把罗、蒲一并拘禁起来了。

罗纶、蒲殿俊被捕！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全城的人都震动了，到第二天九月八号的上午，成都全体市民赴总督衙门请愿释放罗、蒲。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门口贴着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来，有的捧在手

里，有的顶在头上，各人手里拿着一炷香向总督衙门里涌去。

赵尔丰是早有准备的。他在总督署的门口和附近的要隘处已经派兵把守着，手无寸铁的市民冲进督署的西辕门，又冲到了大堂檐下，赵尔丰下令开枪。于是为头的便打死了好几个。群众如潮水一样崩溃下来。枪声只响了几次便停止了。一街都是光绪的牌位，一街都是线香，一街都是踩脱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伤了的人究竟有多少，没有人作过详细的调查。我现在连大概的数目都忘记了。我所能记忆的，只是那死者里面有十二三岁的小儿，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妈。街上的圣位台同时也被军警拆毁了。

这样一来简直是赵尔丰造反了。成都早就罢了市的，从此谁也不肯开门。各地的同志会便都暴动化了。

“水电报”，这是一个新名词，是四川人在当时创造出来的通信方法。方法是在一个木板上写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火速救援。木板上面涂以桐油。四川的河是四通八达的，把这种木板投在川河中，它便被传达到各处下游的地方。这个方法最初是学生会发明的，一应用起来便一个传十，十个传百。一处的人接到了一通水电报，同时又仿造出无数水电报流向下河。在这时尽管当局者在怎样戒严，检

查邮电，检查出版物，但这四通八达的水电报却是无法扣留的。

暴动的中心是在新津，这儿是先发难的地方。这儿的同志会把城池攻陷了，杀了县官，占领了县城，各地的武装势力便都络绎地投到这儿来。赵尔丰先派凤凰山的新军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军不仅毫无战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军。旧式的营防军更全无战斗的能力。

新津一县既不能弹压下来，各县的同志军又闻风兴起，赵尔丰弄到无兵可派，无兵可战的地步。他不能不屡电清廷请援，甚至于请撤回铁路国有的成命以缓和民意了。

四川一局部的乱机已经使中国的全局骚动。各省的咨议局都起来力争，有的省份（像是浙江）更请朝廷速斩赵尔丰以谢天下。

于是乎清廷也弄得来仓皇失措了。它一再起用些旧人来专门应付川事。起初是起用岑春煊为四川宣抚使，这当然是想利用四川人对于岑春煊的去思，期望他来软化四川。继后又命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兼管四省军事，把鄂军带领了两旅人进川，叫他剿办。像这样一硬一软的双刀并用，所谓“怀之以德惠，震之以刑威”，这在当时的清廷想来也一定煞费了一番苦心的。然而，它是铸就了一个大错，把它二百七十

七年的政权终究送掉了。

四

岑春煊在四川是很有声望的，他在赵尔巽之前做过一任四川总督。由四川又转到两广，在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大约他和摄政王有甚么不睦，便把位置失掉了。

他在四川的德政其实也并没有甚么，据有识者说来，他倒很兴了不少的苛捐杂税。然而一般的四川人爱戴他，真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之所以得到这样好的声望，是因为他的官纪很严。他很爱惩办一些贪官污吏。清室二百七十余年间的统治，在官场中已经凝集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贪婪恶习。一般的官府均以贪赃枉法为能，在上的鬻爵收贿，在下的刮骨抽筋。“官官相卫”，让你受苦的民间硬是呼天无路，吁地无门。人民的怕官府真比怕阎罗王老子还要厉害。然而，在这样的官场中，岑春煊的治绩却放出了一个异彩。他好象是专门生来惩治那些贪赃枉法的酷吏的。官吏有贪枉的行为，他准许民间控告。被控告了的官吏十个有九个都是革职。因此使官场中的人，人人自危，而民间的老百姓也就人人称快。

四川人为了争路的问题，正弄得来骑虎不能下辔的时候，听说“岑制军”要来了，一般的人士是怎

样地欢欣鼓舞哟。岑春煊在他未入川之前，他有一封告四川父老子弟的文电，是九月下旬到达成都的。那措辞的娓娓动人而且得体，真是极尽了他的宣抚的能事。这个文电一到，在四川一百四十几州县都传遍了，成都城竟有一两天自动解围，各州县的同志军也准备收兵了。

电文并不甚长，只有五六百字的光景，四川人把它当成“福音书”一样诵读。在日前我和几位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还有人能够把它全盘背诵出来。我现在把那开首的几句写出罢：

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而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遭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就这样他很娓娓婉婉地开腔一声春煊，闭腔一声吾蜀父老子弟，他以家人父子的感情来动人，而又不失掉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他的目的是在平定四川的扰乱，而他这样寥寥的几百言实在可以当几百万大兵。四川人险些儿就被他这样的一篇文章软化。我时常在想，清廷假使专门倚赖岑春煊，让他一个人

单人独马的进四川，那川事一定会立地平息。因此，鄂军不会调空，武汉不会起义，而清廷也不会那样迅速地便遭了灭亡。然而，它终究选择了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它才命岑春煊去宣抚，立地又命端午桥去剿办。一方面表示出信人不专，另一方面也使宣抚的力量被冲淡。因此岑春煊走到汉口便逗留着了，而端方则威风凛凛地执掌了兵马大权，浩浩荡荡入川。

端方在入四川之前也有一通文电，那和岑春煊的告蜀父老子弟的书，真可以说是绝好的对照。端电是告示体裁，文字之长将近万言，而在内容上更有天渊之别。

那么一通长电，到现在我相信谁也不能记忆了。我只记得他开口一声“本大臣”，闭口一声“尔川人”，把四川人看得来好像还是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纣时的蛮子。他又拚命地夸张他屠杀革命党的手腕，说他从前在山西怎样怎样地惩治乱党，在江苏又怎样怎样地剪灭会匪。他现在带领大兵前来，假使川人还是冥顽不灵，敢于上抗王命，他要剿灭四川。

这样一来，简直把四川人逼得来绝体绝命了。纵横已经成了乱党，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唯一的几稀的生路便只有反抗到底了。

端方在他的收集骨董、讲究一些中国式的考古学上，倒比较是一个聪明的人。说到政治上的处理

来，我不知道他怎么这样的愚蠢。自然，这样的电文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手稿，在他幕府里总还有不少的名下士，那样庄严的一篇文章说不定还会是我们年青名士朱山先生的杰作呢！他们习惯于猛于虎的官威，以为老百姓只要一加威吓，便自会俯首帖耳。殊不知老百姓的忍耐早已经超过了它的界限了。用旧式的眼光来批判，要说清朝的灭亡是由于端方的这通电报也不能说是过论。因为有他的一来使四川的祸乱愈见蔓延，而在不久之间武汉便起了响应。

武汉的起义谁也知道是在那年的十月十日。他这个消息，一直在十一月二十五号成都独立以后，我们才确切地知道了的。在成都独立以前，官界把外来消息完全封锁了。后来我们看上海的报纸——好像是《神州日报》——画有一方漫画嘲笑岑春煊，题为《岑三少割须弃袍》。岑春煊自受命为宣抚使以后，因为权限的不分明，他自己逗留在汉口不进，终于遭遇了武汉革命军的爆发，弄到他演了一场曹孟德的旧戏，逃回了上海。

岑春煊并没有入夔门一步，而入了夔门的端午桥就没有出夔门一步了。

端午桥带领着大兵，浩浩荡荡地要来“剿灭”四川。在他刚走到重庆，他的后路便已经断了。重庆是

四川革命势力的策源地，他羁留在这儿，部下的军心已经动摇。他如果有岑春煊那样的聪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个人改装逃走，或许他到现在都还活着，他的《陶斋吉金录》或许有再续三续出现了。但他到底没有这样的幽默。他逃命也带着兵队同走。他愈朝西进，到了资州，重庆和成都都先后独立了。他这个釜底游魂终竟为他所带来的鄂军所杀。

他死时的照片我是看见过的，一个大洋磁盘里盛着被斫下来了的头首，由一个兵捧着。他自己不肯唱《割须弃袍》的旧戏，却让着这位兵士来唱了一场《沙乐美》的新戏。

剩下的还有一位孤城落日的赵尔丰。他把外界的消息封锁了，但这是对于我们的封锁，对他自己乃至当时的官场当然是开放着的。

上海的报纸，特别是现在已经若存若亡的《神州日报》，和已经消灭了的《民立报》，那真是做了一项很伟大的工作。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本事在革命运动上倒真是发挥了它的伟大的潜能。清廷，事实上是到第二年的二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在辛亥的十一二月便已经崩溃了。四川，事实上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宣布独立的，但在上海的报纸上，省城是老早被保路同志军占领了。这在初期，在官场方

面自然会知道是在制造谣言。因为清廷就在武汉起义之后，经由山西、陕西对于赵尔丰都还有几次电报来斥责。然到十月尾和十一月初，环绕着四川的省份差不多全部都独立了。湖南是十月二十二独立的，陕西是二十五，云南是三十。十一月七日的贵州、广西，八日的广东。从此以后四川的官场便成了一个孤岛，完全和清廷隔离了。在这以后的上海的谣言，你要不信，你怎能不信？不然，像赵尔丰那样倔强的人，他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清廷并未灭亡之前，终究把政权和平地移交了出来，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赵尔丰自从九月七日把罗纶、蒲殿俊辈拘禁了之后，省城的对外宣传是说罗、蒲遇害。其实他对于他们是相当优待的。他只是不许他们出来活动罢了，一切都礼如上宾。我们听说他们在督署里面，时而打麻将，时而唱京戏，并且时而又饮酒赋诗。——这些名士假如有诗集传世，那时的诗一定有不少的慷慨淋漓的杰作。所以他们在那儿倒是得了一两个月的休养了。

外面的形势日非，四川在中国成了一个孤岛，成都在四川又算成了一个孤岛。在那快要独立的前几天，同志军已经有攻城的消息，四乡进城的蔬菜以及米粮的来路都断绝了。在这时，假使四川的新军里面真正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儿主持，四川老早已经是独

立了的。可惜妥协性成的四川人，就跟全中国人把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掠去了的一样，把成都独立的首功却让给赵尔丰去了。

成都独立的首功，说来有点奇异，是应该写在赵尔丰名下的。他在要独立的前几天终竟把罗、蒲诸人释放了。他在免使省民涂炭的口实之下（其实是想把政权交给温和的一派，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他们定下了几条条约。一条是宣布四川独立，由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做正都督，在正都督之下设副都督一人，由赵尔丰的私人陆军标统朱靖澜担任，兵权仍操在朱靖澜手里。还有一条便是赵尔丰自己的退位，他把印信封存藩库，他自己退回打箭炉去继续经营西藏，一切的旅费、政费仍由四川支給。重要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于是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都的独立也就跟中华民国的成立一样，在新旧双方的合意之下，乃至是在类似任命的形式之下，也就实现了。就这样，中国便说是革了命，四川也就说是革了命。

赵尔丰在后来虽然遭了杀戮，但从革命的立场上来说，成都的反正总应该推他为首功。而从旧式的观点来说，他算是已经做了贰臣。清朝灭亡之际，贰臣之多实在今古无两。这里自然是有种族的观念存在，但也是封建思想已经失掉了势力的证明。平心而论，像赵尔丰之于清廷，实在可以说是相当地鞠了一

下躬，尽了一下瘁的。请拿当时各省起事的先后和独立的先后来看罢。四川的起事占最先，而独立却差不多占最后。无论怎样，赵尔丰在四川和真正革命的民众总还打过几次仗，支持了两三个月。弄到后来实在是山尽水穷，才把政权交卸了出来。他对于清廷总算是可以对得住罢？然而清廷对于他怎样？清廷昧于局势的已经变迁，一味地对于民众加以压迫，一味地对于他个人加以责让，端方奏参了他，就让端方来查办，把他只看成一个罪人。他矢尽了忠诚，乐得一个“屠户”的美名，到这时恐怕也不免有知己寥落之感罢？在反正的当时，听说他自己本想做第一任都督，终因为怕不能屈服人心，他也就自行退让了。所以从清室立场看来，他比云南的李经羲、广东的张鸣岐、广西的沈秉堃，乃至王莽再世的袁世凯，虽然已经是“贰”，总还算“贰”得不甚厉害的。

立在反动的立场上对于赵尔丰可以容恕的地方多，立在革命的立场上对于四川当年新兴势力的指导者们实在是断难容恕。罗、蒲诸人本来是不赞成革命的妥协派，他们在长时期内也失掉了他们的自由，那是有可以借口的。但当时自命为革命党的，在独立以后虽然涌出了不少的人才出来，在独立以前他们到底在做甚么酣梦呢？特别是四川的新军界。统观各省的独立，差不多全部都是新军掉头，这正是资本主

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的表现。然而四川的新军，虽然有一小部分投到了保路同志军的阵营里，而大部分却只保持着一个消极的不动主义，竟使赵屠户那样的一个独夫在成都也支持了两三个月。坐使政权在暗默中从反动派又移到保守派的手里，从这儿便种下了二十年来政权争夺的丑恶种子。天下从此多事，四川也就从此多事了。

五

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支配权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的。形式上虽然号称革命，而在实质上则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功，封建的顽强势力始终没有被打破。但在革命成功了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人是怎样地欢欣鼓舞哟！特别是我们四川。因为它斗争的时间长，所以得到胜利也就分外地狂喜。

先从我们一些小孩子说起罢。我们最大的高兴是等不到独立的宣布，在头一天晚上便把辫子剪了。在这时，我们拿着剪子去强迫一些怕事的学生和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们，我们赶得他们鸡飞狗跳。特别是那位都喇嘛先生，我们拿着四五把剪子把他包围着，弄得他无处可逃，终究在谈笑之间把他的辫子的支配权和平授受了下来。

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只消大家把头上的毛辫子一剪，从此以后，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强国了。

这样欢狂的态度，在那些得到政权的新支配者，比我们还要荒唐。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成都的皇城正式成立了四川都督府。在一切的政权都还没有稳固的时候，他们下出了一道奇怪通天的命令，便是大赏三军，准许新旧的军士自由十天，不受军律的拘束！这真不知道是那一位军师想出的妙计。本来就是带着兽性、容易放纵的丘八，还要准许他们自由十天，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当中真正成为了百鬼昼行的世界。

新军驻扎在城外的凤凰山，多少有点新式的纪律，都还看不出他们怎样的骄纵。可怕的是那营防军了。

营防军穿的是旧式的号勇褂子，头上用黑色的纱布像印度人一样打一个很大的包头。在这时，他们的包头愈见大起来了，在额上加上一个英雄结子，有的还要加上一顶“英雄草帽”（就跟京戏《小放牛》唱花旦的戴的花草帽一样）。两边的鬓上各各倒插一朵通草花。号勇褂子上更披上一件斗篷（所谓“一口钟”），把明晃晃的马刀敞插在腰边。短裤下用黑色的纱罗打着裹腿，裹腿上也一边插着一支匕首。脚上是

线耳子草鞋。草鞋头上扎着一朵很大的绒条花。

就是这样的装束，他们把两个肩头耸着，把两只肘拐敞开，两三个人品着在街上走，一两丈宽的街面便都被他们霸占了。

我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形容，但我恐怕读者还是得不到那种可恐怖的光景。因为没有身当其境的人会以为这是一种假装行列，他们在扮演着戏台上所常见的武生。是的，是的，有那样的一个观念就好了。他们实在是就像舞台上的英雄们，不下装就走下了舞台的一样；但他们却比任何的名优还要演扮得逼真。他们在街上满凶横地摇摆着，开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闭口一声老子们怎么样。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

四川的独立本来是重庆在前，成都在后的。公平地说，蒲殿俊假使真是非凡的人才，假使真是以国家为前提的人，他不应该作政权的迷恋者。在赵尔丰把政权交出之后，便应该和重庆的一部分势力合并起来，最好是自己退让。因为他本来不是革命党人，不应该来享受革命的果实。然而他却连做梦也没有这样想到。否，他宁是一出马便和革命派对立的。在他得到了政权之后，丝毫也没有显示出一点经纶，而只是企图垄断革命。他对于政权的分配是怎样呢？依然

是让川北一派入包办。于是在这分赃不平上又树立了新的敌人。第一是和他们对立的当时的革命派，第二是掌有实力的新军派，第三是川北以外的失意派，这些在无形之中便组织成了一个反川北系的大同盟。

革命派的示威是在独立后的第三天。就在宣告独立的那一天的下午有一张布告出来，是说在二十七号的上午要在南校场召集省民大会，希望各界同胞参加。布告上的署名是

同盟会会长 孙 文

四川支部长 董修武（代）

末尾的年月用的是黄帝纪元，数目好像是四千六百零九年。

孙文！这在当年是使我们怎样憧憬的一个对象哟！他的名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四川怕以这为第一次。有他的名字列着的布告，就好像他在亲自对我们说话的一样，使我们少年人的心血起了高度的沸腾。

开会时很热闹。会场就在我们学校前面的南校场，在我们当然是就地风光。校场正中搭了一座临时的舞台，舞台上簇拥着不少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党人真是不少！平常我们时常看见的官班法政的教习，绅班法政的教习，乃至有许多穿军服、带

指挥刀的，原来都是革命党人。

董修武是四川人后来称他为“董太师”的，东文学堂出身的留学生，是我们大哥的同学。他学的也是经济，在绅班法政教书。平常我们也时常看见过他，但我们的嗅觉真钝，连革命党的革字的气味都不曾嗅到。今天是他的主席，登台的人大都是一篇悲歌慷慨的议论。会场上有军乐队助兴，因此也招来了不少的听众。但这些听众是全无组织的，就跟乡里人来看神会的一样，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我自己非常抱歉：当时的那一些悲歌慷慨的演说竟没有一句留在我的记忆里。

总之，这是一个对立。明显的是平时风头很旺的蒲殿俊、邓孝可诸人，今天却谁也没有到场。

但在革命党人中，在当时也有对立，便是洋货和土货的对立。董修武所代表的是留学生一派的洋货，还有是杨莘友们所代表的川省道地的土货。

我们有一位从堂的姊夫，原来他也是革命党人。有一天他把我拉着，到杨莘友们的办事处里去，我到这儿倒真正感受了一些革命的风味了。

杨莘友、王述怀，还有其他的一共六个人，是反正以后才从牢里放出来的。他们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的年底图谋革命，在未举事时被赵尔巽破获了，丢在了牢里的，算来已经坐了将近两年的牢。他们才

从牢里出来，有的因为忙于奔走，竟连剃头的时候都没有。一头蓬茸的乱发，一嘴蓬茸的乱须，一个苍白色的面孔，一双放着异光的鹞子眼睛，一身不相称的借来的衣裳，这样的革命党人让你一眼看见了，令你怎么也要肃然生敬。我看见他们的握手了。他们的握手和平常不同，宁可说是扣手。他们是把几个指头并着弯起来，就跟太极图一样彼此扣上。

六人之中有一位身子特别高，背有点弯，鼻子是一种罗马式的高鼻子。他和我谈过几句话，说他们不赞成罗、蒲的办法。那是向赵尔丰投降了，是赵氏的家奴。这个人我看是六人中的领袖，他也特别忙，和我说不上几句话，又有别的同志来会他。他回头又带着手枪出去了。这个人我现在把他的姓名忘记了。他就在那一天遭了别人的暗杀。下手的是甚么人，他的身后是怎样，我完全不知道。

从那办事处退出来的时候，我的那位姊夫他悄悄地对我说，说他们要暗杀蒲殿俊。

在革命期中，一个人上台很快，下台也很容易。蒲殿俊一做了都督之后，他的政治手腕已经落第，更加以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合作，他的末路早已迫在眼前。然而，使他没落的直接动力，却是他自己所酿成的兵变。

蒲殿俊在四川被称为“十日都督”，因为他的都督梦刚好做了十天。

十天，这是新旧各军的自由假期期满的日子。蒲都督在东校场检阅营防军，自此以后要叫他们重守军律了。真是可怜的幼稚的政治家！已经放出笼牢的老虎，他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叫它重入笼牢。兵士们也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要求发三月份的全饷。财政权大约在当时也还不曾被蒲掌握着，即使已被掌握，然在已经经过两三个月变乱后的四川，更哪有那样的余裕？这个要求不能干脆地答复，兵士们当场便哗变武来。当场便有兵士开枪。蒲都督几曾见过这样的局面，几曾听过这样的枪声？枪声一响，他被马弁们拖着逃跑了。

兵士的开枪大约是在午后两点钟左右。就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一城都是枪声。一个锦绣的成都城，就好像楚霸王火烧阿房宫，奈罗帝火烧罗马城一样，四处都在起火。

我们的学堂老早就把门关了。叛兵几时闯进学堂来，是不能保的。都先生把我们约束得很严，不准谁出门一步。在学堂里守着听了一夜的枪声，看了一夜的大火。夜间枪声很密的时候，城里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出门逃难。学堂门外就是南校场，簇拥到这儿来的有不少的人。时而也有人在学堂门外打门，但不

知道是难民，还是叛兵。

这真是恐怖的一夜，特别是那些难民，他们忧财产之丧失，悲骨肉分散，愁自己生命的难保，真不知道是怎样地惴栗了。

枪声和火光在天将亮的时候才渐渐停息了。

六

第二天清早，我因为关心着住在东门的一位堂姐，一等学堂门打开，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是很惨淡的。避难的人已经络绎在回到自己的家里。

原来变兵都是向天放的枪，因此，并没有甚么死伤的人。夜间所看见的东一处西一处的火光，真好像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狱的一样，其实所烧的都是当铺。也有人说是当铺主人自己放的火。因为当铺遭了抢，火烧后便免得偿还。

藩库是烧了，兵械库也的确抢了。在我走到南门大街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一些零星的变兵。他们那全身的披挂，可惜我没有照相机，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来。他们晓得银钱很贵重，抢了不少的大洋和银锭子。他们晓得枪弹是很好的武器，同时便也抢了一身的枪弹。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支枪。手里一边拿一支，肩上也一边挂一支。弹囊更加是不计其数，横也

是，顺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是，叠叠重重、重重叠叠地挂着。但是，你想，你一个人哪有那样大的力气呢？一夜没有睡觉，身上有不少的金银，还要加上这样多的一些枪弹。

丘八老爷到了这时，不能不起质变了。他们由用枪弹的老虎一变而为驮枪弹的驴马了。

各街已经有自卫团出现，是由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的。他们在这时候把平常很少见的马刀、关刀、牛角叉，通同摆出来了。这些人在晚间抢劫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力的队伍。晚间丘八老爷打冲锋，他们便接上二阵。所有各街的抢劫，一多半以上是他们干的。然而摇身一变，他们现在要保卫街坊了。还是该丘八老爷背时，已经变成了驴子，不要说别人还有关刀、马刀，就是赤手空拳把你身上的枪扭一支下来，也就把你解决了。结果是走慢了的一些变兵便都丢了性命。

最繁华的东大街、商业场，被抢劫得最厉害。一街都是包洋货的纸头、货匣、商标，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满街都是粉。在这时候锦绣的成都城倒真真成为十里香街了。

由于自卫团搜逻得很厉害，没有出城的变兵都躲藏了起来，有的也赶快改变了自己的装束，好在改装也很方便，他们是有抢来的现成衣服。在东大街遇

着这一件滑稽的悲剧。

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着。有几位自卫团抢上前去扭着他，其中一个拦腰便给他一“梭标”把他凿倒了。

原来这位化了装的老爷是露了马脚的。他抢的时候忘了抢裤子，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记的军裤。这位老爷当街便被几位自卫团结果了。但更有趣的是他们把他的灰鼠马褂、狐皮袍子剥开，里面又现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赵尔丰这时候还住在他的总督衙门里面。他和各街自卫团一样，都还有点机敏的手腕。各处的街头巷口都贴出了他的“总督部堂”的安民告示，然而没有印信。因为藩库烧了，存在藩库里的四川省总督的印信怕也被烧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门前，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贴了一张红纸的招租帖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丈写的字，情不自禁地发起笑来。有了这样一张避邪的符箓，想来他们一定是安全无恙的。门也不容易叫开，我又折到青石桥街去看我的大哥。那时候他住在青石桥街一家大公馆里。因为他的官气太大，我平常少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馆门前，又同样是一张符箓。毕竟是出过洋的人要不同一点，不比一些旧式的公馆人家，一闻枪声，一见火光，便全家全眷都出门

逃难，剩下一座空公馆让自己的用人及邻近的无业者便把“启发”打了。——这“打启发”三个字就是那次兵变之后传出来的话柄。据说那天晚上的新军的口令是“启发”。起初哗变的大抵是营防军，当局者似乎也曾去调凤凰山的新军来弹压。然而新军一进城也跟着变了。一到晚来，彼此成群结队的抢劫，彼此也在互问口令。于是东也是一声“启发”，西也是一声“启发”。从此以后“打启发”便成了成都的新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说“揩油”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启发”。

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各街的江湖派，恢复了《水浒传》上的梁山泊的风光。他们在各街都组织公堂，牛角叉、枪矛、青龙偃月刀、大红灯笼，摆设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爷的一幕掩闭了之后，现在又是陈涉、吴广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场了。在城内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英雄，更加以各县的保路同志军进城来成军，那真是开出了古今未有之奇局了。

蒲殿俊辈登台之后，因为纵容兵士的结果弄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时新军又不在他们手里，他们便提出了一个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志军进省成军。这一方面算是了结一场公案，而同时也想借

来作为弹压旧军、抑制新军的工具。因为这样，各路的同志军也就络绎抵省。但在他们抵省的时候，已经是兵变后的第二天。蒲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凡为瞻仰过同志军军容的人，读到贾长沙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绝不会认为只是文学家的夸张。保路同志军军容有的真是滑稽得使你要夸张也夸张不到。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钏、铜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而有的更异想天开，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雄赳赳气昂昂地拿着。我还亲眼看见一位拿“吊刀子”的。——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话，外边不知道叫甚么名字。这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在从前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出门便要带“吊刀子”，就是一双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个鞘子里面。这样的东西本是用来吃饭菜的，然而那位同志军，他把小刀抽出鞘来拿在手里，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间，大有仗着宝剑的钟馗的身手。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

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〇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保路同志会之起，直接虽是和封建社会作斗争，而间接却是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直接的一步没有走完，间接的一步却完全忘掉了。问题依然要归结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中国的革命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它毕竟只能出于向帝国主义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缩到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窠臼里。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

在营防军猖獗的时候，谁都兢兢业业地预感到一定会出甚么乱子，乱子终于出现了。现在又来了第二个兢兢业业的预感。你想，那样多的草莽英雄又闯进了成都城，这不正好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

在城外草堂寺旁边，自从我初上省的那一年起，

便计划着要设立公园，由官、绅、商、学出资合办。费了几万块钱和将近两年的工夫，公园刚好修成，便遇到革命。同志军一抵省，他们说那公园是赵尔丰、周孝怀辈的私产，便把它捣毁得片瓦无存了。

四川在初办新军的时候，原来预计的是两师人。在凤凰山驻扎一师，在新津驻扎一师。新津是进入西藏的通道，驻扎一师人在那儿是为了要控制西藏。自从我上省的那一年，新津城外也就在建筑西式营房，前后也差不多费了两年工夫，经费更不知道费了多少万。快要落成了，同志军也说是赵家的私产，把它捣毁成一片砖块。

这样的盲目的破坏不能不使当时的有产者震惊。有产者便想靠着有新式武器的军队来防御这行将临头的第二次的祸灾。一些军政上的人自然便乘机而起，扶植自己的势力。这个要求在我们学生的心中生出了反映。就在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成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我也自告奋勇去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武备学堂在那时已经改成陆军小学，是西式的建筑。因为它在北门城外，和南门区域相隔太远，直到去当志愿兵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和它见面。我把行李搬进了

武备学堂去了，在寝室里看到那陆军学生所睡的床，窄窄的刚好可以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这怎么能够睡呢？”在去当志愿兵的志士的心中，劈头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衡起来了。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和我同去又同出的很不少。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我自己即使忍耐着去吃一点苦，做到一个忠实的维持秩序的好兵，结果又怎样呢？只添了一个新军阀的爪牙，新富豪的鹰犬罢了。说得光大一点，我顶多可当成了四川境内的如蛆如猬的一个军阀。因而当时的落伍虽然不怎么光荣，然而也不是怎样的耻辱。

保路同志军虽然是四川独立的元勋，但他们依然是封建社会里面的骨董！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作为争路的工具罢了。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演傀儡剧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了。

七

舞台大转换，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董修武、

杨莘友诸人。

尹昌衡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又进过日本的士官学校，在那儿和蔡锷好像是同学，他们后来同回国，也同在广西的讲武堂干过事情。他是由赵尔巽手里调回四川来办督练公所的。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里面也比较还有点天分，他能够熬几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选非选的古诗。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自从清朝末年早就高呼着的“富国强兵”的口号总算是发生了效力：因为凡有国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强。这在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算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什么主义都是骗人的话，只要你手里有兵。你手里一有兵，不怕你昨天还是万恶的军阀，今天便可以成为忠实的信徒。你昨天还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开创了这个例子。

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在赵尔丰交出政权时早就有很多的谣言，说尹昌衡要带领陆军小学的学生和凤凰山的新军攻打总督府。我们对于他也朝夕在期待着。然而，谣言毕竟只是谣言。

自蒲殿俊登基以后，各派势力在暗中斗争了十

天，结果也就酿成了一场兵变。

蒲倒了，给与董、杨辈革命党人获得政权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与他们一个良好的教训：没有兵力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权。在这儿，革命党人便乐得和实力派苟合了。兵变后的第四天，我们奉天承运的尹大皇帝又在我们四川省七千万子民的拥戴之下诞登大宝了。

尹昌衡担任都督。董修武担任财政部长，实际上也就是内阁总理大臣或者宰相。杨莘友担任军事巡警总监。在这儿我们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担任交通部长。其他还有多少部我不甚记忆，部长是些甚么人也不甚记忆了。总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杨，其他也不过和我们的大哥一样，伴食大臣而已。

我们的大哥，他和尹昌衡一样，不是立宪派，不是革命党人，但也不是实力派。他的资格是东文学堂出身，是留学过东洋回来的，这第二批的新政府东洋帮最占优势，特别是东文帮。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差不多又被他们包办了。大哥在东文帮里面算是水面上的人物，所以部长的椅子也就有了他的一份。

新人一上台，委实又有一番新气象。都督是名实相符的军事家，四川立地便成立了四师新军（这在目前连四十师都有的四川当然不算多，然在当时的确是有点像孙悟空吹毫毛，在变戏法）。董太师的最高

妙的财政政策便是多发纸币，多铸铜元。纸币不限于一元以上的银元，就是十枚、二十枚、五十枚至一百枚的铜元代用券也应有尽有了。有的是皮筋纸，你怕有甚么不能解决的财政上的困难？铜元也多样化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乃至五百文的都有。那当五百的大铜元，与其说是铜元，宁可说是“铜镜”。但这种铜镜，在后来又有分用的办法。一个铜镜把它剖成四色，每色又当一百使用。——四川的一部币政史，假如有人肯把它纂集起来，一定抵当得过极幽默的滑稽小说。

董修武的德政，当然不是他一上台就造成了的，这儿所叙述的是综合着后来好几年的历史。不过这位太师他总还算是“行己有耻”的人，他后来（仿佛是民国三年的初间）终因为财政问题下了狱，而且在狱中服毒自尽了。

董修武先生，认真说，要算是时代的牺牲者。中国人在梦里寐里时常所想念着的便是要富国强兵，结果是国虽然没有富而兵倒强了起来。兵数一天一天地增加，在有限的收入里横添出无数的军费，你教人怎能不滥发纸币？发纸币本来也并不是甚么恶劣的政策，只要你有相当的信用，相当的基金。但是在中国的国度里你那里去找那种基金？中国的纸币大都是没有相应基金的，也就跟整个中国不能富的原

因是一样，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作怪。董先生要算是死在这个吃人不流血的怪物的虎口里了。

这些都是后事。就靠着这一批新上台的脚色，多少总还有了一番作为。特别是那位担任军事巡警的杨总监，他真有点雷厉风行的手腕。他的军事巡警是要背马枪的，这比从前拿着一根哭丧棍的警丁大有威风了。然而那马枪对于当时的江湖派却是无上的诱惑。政府尽管成立了，而他们摆的公堂依然存在。他们从那变兵身上抢枪的滋味是一时不会容易忘记的。这军事巡警不消说就成了他们的对头，于是乎他们也就从巡警的身上来抢马枪。弄到后来巡警站岗是两个人或三个人背靠背地站着，手里端着上了弹的马枪。就这样，终竟也把那一时的无政府状态弹压下来了。

这从有产者的立场上说来，总要算是他们的功德。他们弹压民众的手段虽然比赵尔丰、周孝怀还要厉害，而声望却是日隆。他们在成都人的眼中就好像刘、关、张再世一样。

那位二十世纪的刘玄德的确也有点刘玄德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的老婆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结婚以前，便先讨了六七位小老婆，而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当了都督之后收集起来的。他人很年青，在当时怕仅仅三十岁来往，人又魁梧，

面孔也还漂亮，地位又是一省的都督。他偶尔从都督府里出来巡街，在他出府的时候大都督真是威风。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黑马，前呼后拥地总有十几匹马队跟着。马队在街上总是放小跑。在这时，街上的人不消说都要边让，两街坊的人家，特别是平常不大出门的女眷，便都争到街口上来瞻仰这位八面威风的大将军了。

女眷们心悬目眩地在瞻仰将军，将军在电掣风驰中其实也就在物色他的妃嫔。他的一些爱妾就是在这样的机会中挑选出来了。

成都人有一句意义转变的说话，便是“愿尽义务”。这“愿尽义务”四个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随意说出口的。原因是这样。有一次都督出府，经过都督府所在的皇城附近一家成衣店门口。那成衣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在都督从她店铺门口跑过的时候，她饱看了一场。谁知都督也把她饱看进心里了。都督回府之后，就在那天晚上，派了副官去和成衣店的老板交涉：都督看中了那老板娘，要请她进宫。你说，那老板是怎样的答复？他很鞠躬尽瘁地回答道：

“既是都督有心，小民愿尽义务。”

就这样这“愿尽义务”便成为了成都人的话柄。这位尹将军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现还不仅这一点。

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脚名叫杨素兰，他的确是一位天才。我在成都看见他唱戏的时候，怕已经六十多岁了，然而他还是在唱闺门旦（花衫）。三二十年前，在他年青的时候，他是炙手可热的。有过一位总督很喜欢他，他时常出入公门。在那时的司道府县的大小候补官员没有一个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

尹都督也看上了这位老天才。他真异想天开，公然叫他扮成女眷进他的都督府。

有一天晚上是天才的不幸，在他进都督府门的时候，却闯着了那位号称张三爷的杨总监，把他破获了。这件事情便闹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们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诏，把杨总监褒奖了一场，似乎是称他为“铁面御史”。

中国的旧社会实在是一种怪异。像尹昌衡这些行为，真是够荒唐了，而在一般人看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三妻二妾是几千年来的“礼法”，愈见是大人人物，他的妻妾便可以愈见多。当事者自以为荣，而旁观者不胜歆羡。就像尹易衡这一个例子，他自己就丝毫没有甚么内疚的。不，不仅没有内疚，他反而在自己夸奖自己。有一次我听见他在成都青年会演说，他的题目是“英雄与好色”。他的演说我没有听完，只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三段论法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脑里。他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大前提）

昌衡好色（小前提）

所以昌衡是英雄（判断）

我不是来讲逻辑的，他这个三段论法究竟犯了逻辑上的那一条错误，我现在不管。总之你可以看出他是在怎样地自我陶醉！他既自封为英雄，所以我在这儿把他的佳话记述一些出来，我不是在揭发别人的阴私，我是在描写一位“英雄”呢。

尹大都督他到底不愧是一位英雄，在他的治下，那位以杀人成名而绰号“屠户”的赵尔丰终竟被人屠杀了。

快到阴历年底了，赵尔丰依然住在总督署里面。

外边对于他造了不少的谣言，说总督署里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几架机关枪陈列在大堂上，想乘机攻打出来。新政府屡次想要解决他，终不敢轻易动手。

快要到阴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许也怕是想立出一项功业来挽回他的名誉罢？他终究派了三营人把旧总督府包围了起来。里面并没有甚么动静，他们也就攻打进去。衙门里面那里有甚么兵？大堂上面那里有甚么机关枪呢？比诸葛亮的“空城计”还要空得厉害的，是老卒残兵的影子都不见一个。

一直走进里面去搜查的是一位哨官，名叫陶泽

锒。他最后终究搜到了赵尔丰的寝室，他闯进门去，里面打了一发手枪出来。

赵尔丰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着一位“蛮丫头”（四川人是这样称呼的，是否“蛮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汤药。那打手枪的就是这位蛮丫头了。

一位病夫，一位女子，当然只好束手就擒。蛮丫头好像当场便被枪决了，赵尔丰便从病床上拖了起来，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脑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样被指挥刀斫了下来。

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蛮丫头，四川人差不多没有人不称道她的。这位少数民族的女性为中国封建势力的末路，却点缀了一段优美的光辉。古代的所谓“忠义”，结晶在这位女性身上了。

赵尔丰死后还有小小的一场波折。

陶泽锒杀了赵尔丰后，尹大都督立地升他为标统。大都督自己把赵的首级提在手里打马出都督府，游街示众。

待他跑到东大街，从一家店铺的楼上“搭”的一声打了一枪下来，打中了他背后的一位马弁。大都督回马便跑，提着人头又跑回都督府里去了。

放枪的人，有人说就是帮助赵尔丰成名为“屠户”的那位傅华封。他跟随赵尔丰一同进藏，赵在屠杀少数民族上，他也帮了不少忙。

当成都围城时，傅华封忠于他的主子，曾率领边军救赵。但到了雅州，四川已经独立，他的部下因而溃散了。他被擒获后，尹昌衡要奖励“忠臣”，没有杀他，并把他聘为顾问。后来尹昌衡进藏，不用说傅又成为了尹的羽翼。他著过一部《西康建省计划书》，主张把四川西部和邻接地区划为“西康省”，就是要为新的主子拓土开疆了。

(1929年8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

北 伐 途 次

小 引

在这儿所要叙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的事情。

回顾起来已经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归了消灭，即使还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环境之下也搜集不起来。我现在只能够根据着我所参加过的一部分写出，而且是根据着我的日渐稀薄下去的记忆。因此我这篇文章只能够采取回想录的形式，记忆比较明确的地方写得自然会详，记忆比较淡薄的地方写得自然会简略。这样，文章便会流为是断片的，但也只好听其断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象进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观化起来，写成一部小说，但那样反会减少事实的真实性，同时是会发生出许多错误的。我将来假如有更适当的环境，能够搜集得丰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参加过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革命的人能够提供出些材料来，就像我现在一样写出

回想录，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时候一定可以写出那样的一部小说或者历史。要写出这部著作我觉得我自己是最适当的人：因为从广东到广东的那个巨大的波动，我是整个地参加了的。

这儿要从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离开长沙时写起。要从这儿写起的是因为从长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这一段落中我特别要纪念我的一位阵亡了的朋友。这位朋友虽然阵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阵亡了的将士一样，除少数接近的个人之外，连他的名字都是没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现在要大书特书地写在我这篇回想录里。我相信总不会是像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说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说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这易朽的记忆中离析了出来，让读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风飞散到人间。

—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议会。主任邓择生要经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参预军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体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行列。下午四点钟光景，大家正忙得来有了一个段落的

时候，邓主任突然下了一道命令来，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八时由长沙车站出发前进，留守部暂时留守在长沙。

从那连工作人员和夫役一道约一千人左右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来组成了先遣队，把所当需要的物品通统指配停当了；在六点钟的时候便指定了统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员领向车站。

我和秘书李德谟也是属于先遣队的。因离开开车还有两个钟头的余暇，便偷了这个余暇到附近的澡堂里去洗澡。在那样三伏天气，到了长沙将近一个礼拜了，我们没有洗过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气怎么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个澡真是异常的舒服。走出街头来正打算坐人力车赶到火车站上去，但是人力车夫已经罢了工了。因为已经七点钟，提灯行列开始了，车夫工会的工友都是要参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渐拥挤了起来，即使有人力车，也到了碍难通行的地步了。到这时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向导，拼命地向火车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车站门口的时候，俄顾问的翻译纪德甫和几位部员向着我们簇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叫着：

——“啊，你们到哪里去了？邓主任在大发雷霆——说要枪毙你们呢！……”

看表也只到七点半钟的光景，离开车的时刻还

有半个钟头，这发怒的原因使我一时摸不准确。

纪德甫是要时常跟着俄顾问的，他也常住在总司令部里面。他们——邓主任、俄顾问和他——是七点钟到的车站，看见先遣队的人员都已经上了车，以为我和德谟一定会立刻到的，便把开车的时间提前了半点钟。这个情形我们自然无从知道，而我们在洗澡，他们也无从知道。就这样在时间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点齟齬。

匆忙地赶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灯光中看见在最后一架车厢的门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邓主任，他的颈子是硬擎着的，头是照常微微偏在右边。

——“到了吗，唉？”他含着怒气的声音远远地在向着我们这一群人发问。

——“到了，到了，”别的人替我们答应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没有人力车的话向他说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颈子微微地点了几下。最后是说出：“好啦，我们开车啦。”

车是普通的三等客车，因为车上的电灯设备被北军破坏了还没有复元，车厢中只点着几盏马灯，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顾问铁罗尼坐在后面的一个车角上，他看见我们上了车，便跑来拉着了我的手，很亲热地用德国话向我叫着：

——“Genossen K! Wie sind sie?”^①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国话来和他说了一些。他们都退到一个车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觉得很有点没趣，就像做错了什么事的小孩子一样，只好远远地退在另一边的车角上去默坐起来。

不一会火车也就开动了。在昏暗中把驻扎得还不上一个礼拜的长沙留在了我们的后面。

二

车厢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样暗淡。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求有功只想无过地工作了好几天，不想要偷闲去洗个澡，竟闹出了这样大的笨事。洗了澡后的舒服已经被赶向车站时所跑出的汗水冲洗干净了，而在精神上还遭受了一次“枪毙”。一些没趣的只想向自己发怒的简单的念头在脑中回旋着，回旋着，自己不想向别人说话，别人也没有人来向自己说话。

火车跑了大约两个钟头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经到了目的地的汨罗。

在昏暗中又下了车，车站的情形是怎样，并且是

^① K 同志，你是怎么了的？

在那一个方向，都摸不准确。天上没有月光，连星星也都没有一个。主要的几个人借着马灯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坟台上，坟台是石板面就的。在那儿规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传出去了。当晚就地露营，明天清早六时向目的地出发。

铁道旁边不一会便生起了几堆火来，是准备夜饭的，部队忙着出发，连夜饭都还没有用。

邓主任的怒气似乎还没有解息，他依然没有向我说话。平时他对我比较是开心见肠的人，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将一样。突然的出发究竟为的是什么？岳州已经克服了，火车不日便可以开到岳州，为什么我们要赶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铁路而是指向东北，并且也不当大道，连普通的地图上都没有路钱。我们最后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儿？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些他对我全没有说明，也没有对我说明的意思。我觉得他对我没有这样严守秘密的必要。就是在车站上略略误了一下钟点（其实离开车前还有几分钟），也不应该有那样长久不解息的怒气。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头也掉过来在对着他表示不满了。

胡乱地在露天中用了夜饭，因为天黑，又因为明朝一早便要动身，各人用的行军床都来不及取出。铁罗尼顾问和邓主任和着衣裳便倒在那石板面的坟台

上睡了下去。我很惊异，同时也很佩服，怎么在那样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纪德甫、李德谟和我，在这时从他们的身边走开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觉的地方。我们有不约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个柔软的地方来睡。

一处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几株树子罩着，在马灯光中照明出来，显得异常幽雅。我们便把这儿选定了。德甫把自己背着的雨衣解了下来铺在草上，德谟也从邓主任的护兵手里找了一床广大的龙须草席来铺陈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钢丝床的一样，坐起了一个深窝。不一会大家把图囊来做了枕头，睡下去了。

德甫对于这次出发的动机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诉了我们。

原来就在那天午后，在总司令部开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我们的突然出发，便是在会议上决定的。因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军接连地得到了决定的胜利，敌人全线总退却，岳州是不攻而下的。敌人最后的殊死战大约是在汀泗桥、贺胜桥一带。这最后的抵抗如被冲破，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这样情势之下，我们在军事上要要和吴佩孚争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第八军争取武昌。湖北的政权不好落在唐生智的手里。我们现在所取的路线便是要去抄截唐生智，从弦线上去追踪第四军。因而我们的

目的地总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这样一得到了说明，我才好像见了天日的一样，在这次的出发中顿然感觉到了无限的趣味。因为这儿包含着一个赛跑的竞争心，而我们自己是这赛跑的选手。

说了一阵，因为疲倦，又因为草地的软和，不知不觉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的声音唤醒起来的时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湿透了的。草席不用说也和水里浸过的一样。这个哑谜的解释自然是不用费力的。因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松，由那儿所发的浓重的蒸气，在下半夜退了凉后，通统结成了露水。到这时才明白那本是骑兵将校出身、在革命战役中受过好几次伤的俄顾问，那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在第四军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为什么要选择着在坚硬的石板上去睡觉的原故。没有军事经验的人，连睡觉都要迂阔得闹出笑话来。不过还好，从广东出发以来也算经过了一月以上的锻炼，虽然在那夜露里湿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没有睡出什么毛病。

三

过汨罗江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并不宽，水也很浅。疑心到屈原何以会在这儿淹死。清早的太阳灿烂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浅山中，骑在马上，做出

了这样的一首旧诗：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

政治部从广东出发仅仅备了两匹马，是邓主任和俄顾问的代表。到了长沙又添购了两匹，于是乎我和纪德甫便也有骑马的份了。我骑的是一匹老白马，是从长沙那一座面坊里买来的。那马老先生异常驯善，循规蹈矩地总不肯走前头，只接在别的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趋亦趋”。但我那时还没把马骑会，就坐在那样的马上，忧的与其是天下，倒宁是马下。我最怕的是那骑兵顾问和团长主任，他们骑的马既比较优秀，而他们一高兴起来总爱放点小跑。这样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采取人道主义的方向，我的马多是让给别人骑，或者用去驮行李，但是做起诗来，却不免把自己夸张成为了英雄。

渡过汨罗以后的情形便不大记忆了，每天都是在山里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狭隘的小路。特别在入了湖北境界之后，山多是一些童山。路过的村庄都异常凋败。天气热，人多，又没有军队式的组织，行动异常缓慢。就那样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从新编制先遣队，把赶不上的人和沉重

的行李都留在后面，尽能跑路的和比较重要的人挑选着往前走。说也奇怪，我的体力，尤其是脚力，在那时候不知怎的，真是特别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个站口，总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营和中休的地点，有时还要为大家烧菜煮饭。因为从广东带来的火夫们，扛着几口大铁锅和食具，在汨罗车站出发后的头一天，便已经掉队了。

二十八日的下午四点钟，赶到了离崇阳不远的石城矶，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个人了。一方面在加紧赶路，但另一方面却又踌躇了起来。和山里跑了几天，和左右两翼的军队都没有联络；不知道军事上的情形是怎样了。逐渐和前线接近，几时和敌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测度。天色还早，本来还可以赶路，但就因为这样的形势，我们的领导者邓主任便叫我们暂时在石城矶宿营。他和俄顾问两人骑马赶向崇阳去，待有他的命令来时，我们再定行止。

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着马去了。在我的幻想里面，他们两位就像是两名勇敢的斥候。

我们便在石城矶宿营。那是小小的一个村落，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子是东西横亘的，南面流着一条清浅的溪水，人家都面着溪水立在北岸上。我们几个人，德甫、德谟、宣传科的副科长朱代杰和我，住在

东头的一家铁匠店里。店里有铁砧和废了的炉灶，看那情形是已经好久没有打铁了。但那村子并没有经过兵火，铁业的废止当然是另有原因。问那店主人，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我想到在日本势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铁厂是相去不远的，这明白是手工业被机械工业破坏了一个小小角度里的现象。

铁匠店的第二进有一个小小的横长方形的天井，上面一座敞厅，放着些极旧的桌椅，靠壁有一架颓败的神龛。

我的一位很忠实的勤务兵把我的行军床陈在天井的南沿，和店面紧接着。——说起我那位勤务兵，我现在费了好一阵的追忆才把他的名字记起来了，他名叫薛绍三，是福建人，在韶关的时候便开始跟着我，后来还跟着我到过南昌，足足跟过我一年。从长沙出发赶到这石城矶来的途中，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夫役都掉了队，连邓主任的几位护兵也一个都没有跟上，他却是始终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军床和一口小小的镗铁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时候，他就自己替我挑。我赶到了石城矶，还得有行军床睡觉，那是应该感谢他的。

行军床面好了，并且是面在屋顶下面的，这是从长沙出发以来的最舒服的一次。吃了夜饭，把应该办的事情了结了，便把疲倦得就和干鱿鱼一样的身子

拉直了起来，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秘书长！秘书长！”

听着有人在叫，朦胧地从深睡里醒了来。

——“秘书长，邓主任有信来了！”是薛绍三的声音。那声音好像是从远处来的。

周围通是黑暗，薛绍三提着一盏昏花的寡黄的马灯立在我的床头。

我一翻身起来，接过了他递给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是邓主任的笔迹，写着投交给我，还带了一笔是信到后交来人脚资二元。

我把信连忙拆开来，借着昏黄的马灯来看时，大意是邓主任和俄顾问在九点钟的时候到了崇阳，在崇阳得到了前线上的消息：我军已过羊楼司，正在跟着敌人穷追。又说他们两人第二天清早一早由崇阳出发，叫我带着纪翻译和李秘书连夜赶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表来看时是一点半钟。我问送信来的人，薛绍三又向外面去引了一个人进来。穿的是长衫，手里打着一个圆纱灯，上面有“崇阳县”的几个扁红字。看那情形大约是崇阳县的差人。我看他的衣裳是湿的，同时在天井中也听见有微微的雨声，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绍三把钱给了差人，打发他

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几个人叫醒了起来。

把部事交托给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给薛绍三，和德甫、德谟两个人动身的时候已经是两点钟过了。德甫带着两百块钱的现洋，让他坐着轿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儿的——在前面走着做向导。德谟和我都骑着马。我骑的仍然是那匹极驯善的老白马，走在最后。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团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轿上所挂着的两盏马灯。马是老马，又是半夜里赶出来走路的，睡眠没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烦的光景。它只是把头埋着，一面走，一面向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马颈提起来却要费很大的力气，好在慢慢地走也可以跟得上轿子，也就听它去埋头吐气去了。

动身的时候，起初有点兴奋，由屋内的空气转换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气里来，睡意是被驱走了。走不一会雨也住了。老马的老汉步却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药，本来还没睡足的、暂时被驱走了的睡眠，不知几时又飞了转来，袭击着坐在马上的骑士。有时脚擦着岩边或树干，发出些窸窣的声音，有时头上挂着树枝，冷的水滴洒在脸上，才突然地惊醒过来；但昏蒙蒙地没几分钟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马，想那坐下的马怕有时也是熟睡着的。古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

临深池”，我那时的情形可以说是“睡人骑梦马，夜半赴戎机”。但在事实上倒也并没有什么危险。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骑在马上。那时候的情形大约是潜意识在活动，就和梦游患者在梦中可以行动的一样。所以事实上就真的让盲人骑着瞎马，在月黑的深夜骑到很深的池子边上去，我敢保险，是断不会落进池子里的。以为危险，会落进池子的，只是睁着眼睛的人未曾行过实验的幻想。

在夜里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后的情形我现在也不记忆了。只记得到了崇阳城内时是早晨八点钟。先是到了邓主任信上所写明着的他们所住宿的旅馆。到了那儿时，他们在清早六点钟的时候已经走了。邓主任还留下了一封信，叫我们向着蒲圻跟踪前进。

用了早饭之后，德甫坐来的轿夫大约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阳城里另外雇了轿夫，在这儿又很费了些时间。我在那时写了一封信寄给广东的成仿吾，把出发长沙以后的情形告诉了他，信后附带了几行日本文是写给我留在广州的夫人的，这几行信却亏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现在把它译录在下边。

二十四日离开长沙；今晨八时顷到达此地。
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今闻已进展到离武

昌城仅中国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约在三日内便可以攻进武昌。攻进武昌之后便万事都顺利了。

祝你的健康，并祝孩子们的健康。

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都出乎意外。

××，二十九日。

五

崇阳城内的市面并没有什么骚扰，城里没有北军的痕迹，也还没有什么革命军的痕迹：因为由通城进攻的第四军直趋羊楼司，没有经过崇阳。我们从长沙动身所采取的路向不用说是走了好些枉路。我们假如先朝羊楼司走，那定然是早把第四军赶上了的。

由崇阳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后的进行可以无须乎用向导了。路因夜来的雨很滑，德甫的轿子走得很慢，我们便各自骑着马向前头走去。在途中的一个站口上，大约就是地图上的“洪上”，把马休息着等待德甫，聚齐了，吃了一顿中饭又走。

天气异常炎热，坐在马上总是想睡。路过着有树荫的青草平地时，特别有一种很难克服的诱惑，总要使你想跨下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个酣足。有时竟直在马上便昼寝起来——在马上昼寝，这个情形，在没有经验的人或许会以为是夸张，但其实这是极寻常的事。有些人闹着神经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

睡觉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杀的。那种人我劝他去从军或者做苦工，把闲着的筋肉充分地劳瘁一下，他会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够不睡的那种地步。

沿途风物都呈着太平无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的农人和行商，都像不知道在邻近的县分上有过、并且有着剧烈的战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留在记忆里的东西。

走到了天色渐渐向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渐渐的稀少了；直到后来在昏黄中只剩着德谟和我，和我们所骑着的两匹马。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们却又知道我们是不会骑的，走到一段田陇上的时候竟至立着不动。没有办法只得都下马来牵着马走。在那田畴中走着，周围的浅山由深蓝的颜色逐渐转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气连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后从来不曾起过的一种恐怖的念头——在那些浅山里面万一有从战线上溃逃了下来的北兵藏着，乘着这昏黑向我们一冲下来；再不然会有什么大股的强盗来趁火打劫？……这种无谓的忧虑执拗地来纠缠着。

德谟也是有点神经质的人，大约也是我的忧虑无形地传染了他：素来是少说话的他愈见沉默着，黑着一个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样。

好容易走到了一个村庄，问起路来，据说离蒲圻

还有五里路远。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赶到蒲圻，在蒲圻或许可以和邓主任们相会。征求德谟的同意，他黑着一个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也还须得等待着德甫一道，我们穿过了村庄，在北头上的一个土地庙前休息着。等了将近半个钟头，两个人交替着跑到村的南头上去望，总不见德甫的轿子来。天色已经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来了。路是完全看不见的。到了这时候只好决心到村上去找个宿处。

拉着马又折进村去，扣了好几家的门都没有回应。有些人家里面有湖南兵的声音，在那儿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军的兵士，不知道是几时进了村的。我们在外面打门，他们也一样的不理。最后到村南尽头处的一家门上扣门。里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没有人回应。我们在外边叫着说：

——“我们是南军的官长，只求借宿一夜，决不扰害你们，你们放心把门打开。”

几次放大声音在门外恳求，里面最后公然点起了亮来。有人的声息，并且有出来开门的神气。想那里面的主人大约是听明了我们说是官长，又听见我们的声音也还不甚粗暴，证明了我们的确是官长一类的人。或许也怕是我们那两匹马不耐烦地哼着鼻子，蹴着脚的声音替我们作了证明的。大门结局是开了。一位五十来往的男子点着一盏菜油灯应接我们。

我们又把来意说了一遍，他很殷勤地把我们招待进去。我们问他系马的地方，他尤其高兴。他说他家里有马房；接着又把两匹马引进他的马房去了。

房主人看见了我们并不粗暴，他愈见安心起来了。他把我们欢迎着，好像有些得意的神气。屋里很热，蚊子又异常的多，我们劝他把大门打开；他在敞厅正中的土面上烧起了柴火来熏蚊子。

我们还没有吃夜饭，他出门去替我们买了几升米来。他自己有些子鸡，便替我们杀了两只，很殷勤地在厨下准备着；又替我们烧了些水来洗脚。

我们坐在大门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仍然不见到来。我刚才替自己怀着的忧虑又为他唤醒起来了。他的身上是带着我们的盘费的，那两名轿夫不会图财害命吗？天色已经黑了，轿夫是两名，他是一个人，两个人要结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吗？这比溃兵和强盗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对德谟说着，他也是在作同样的想法。

——“假如是那样，我们真是害了他呢，我们不应该把钱让他一个人带着。”我这样说。

——“不过他是有枪的，”德谟说，“那两名轿夫或许不敢动手。”

——“近在身旁的敌人，有枪也是不行的。”

两人正在谈说着的时候，远处有光亮现出，向着

村上走来。唯一的希望发生了，希望那就是德甫轿上的马灯。

我们走向村外去迎接，灯光渐渐近了。

——“是纪德甫吗？”我们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欢喜的回应所唤起来的自然是同样的欢喜。

六

轿子到了店门口，德甫拿着一支开了盒的驳壳枪走下了轿来。

看着他拿着枪的情形，我和德谟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们以为你在路上遇了什么事情呢，等你一点半钟了。”我对着德甫说。

——“两位轿夫走得太慢。他们说蒲圻在开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这儿赶不上你们，我还要逼着他们赶到蒲圻的。”德甫说。

——“我也本来是想赶到蒲圻的，因为没有马灯。”

——“那么好了，现在有马灯来了，我们赶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会沉默着不肯说话的

德谟赞成着，“我们吃了饭就动身。”

德甫也是没有用夜饭的，我们便走进店去。两位轿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轿里的行李搬了出来，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们预备饭食。

不一会我们开起饭来，店主人另外开了一桌饭出去招呼两位轿夫的时候，那两位胆怯的夫子已经逃得来没有踪影了。

——“糟糕！”纪德甫叫着，“那两位家伙早就是想跑的，他们在路上已经把轿钱通统要去了。”

这样一来，我们要在当夜动身的计划便很难实现了。店主人也殷勤地留着我们，说路烂很难走，叫我们第二天清早一早动身。我们便决定了在他的家中过宿。

那房子是一列三间的建筑，前后有两栋。第一栋接着街面，中间是一个敞厅，前面接着店门，后面接着一个横的长方形的天井，左右是铺面。那主人有三个小儿女睡在右手一间的地阵板上，藏在乌黑的被条下面，自从我们进了他们的家，都吓得不敢出来。左手的铺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们在那儿下榻，说那里面有床，也还有擀面台。

天井的两侧有过道连接着前后两栋，第二栋的正中是堂屋，靠壁陈列着神龛。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的天井边上塑着一个一连有三口锅的长灶头。左右

有耳房，右边的耳房便是马房，左边是关着的，想来怕是面房了。

由那房子的结构看来，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后来零落了才开始了开面坊而兼带面馆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头一定是后来塑上去的。马房我进去看过，那从前应该是有地板的房间已经成了土面。马是只有我们自己的两匹。据那店主人说，他家中在年内接连出了两次丧事，死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室，他的马就为经营丧葬卖去了。面坊的生意是停了业的。这位主人又算是经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卖掉，成为流氓无产者了。

湖北的天气夜里就到九点钟过后都还不能退凉，又加以在敞厅中烧着火熏蚊子，热得来很令人难耐。德谟跑到门外去，在石面的阶沿上睡下了。我和德甫走进左侧的铺面去。那儿前后有两间房间，前面是纯粹的铺面，在柜台背后靠壁陈着一张很宽大的擀面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下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后面的一间小房间里去，那儿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来，怕是那店主人的母亲或者祖母结婚时的嫁奁。后手一只角上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纸扎的灵堂，那当然是店主人的母亲和妻室死时用过的。那在丧事过后是应该烧毁的东西，而店主人还珍重地保存

着，足见他真是穷得有点程度，他似乎是想留来在自己的丧事时使用的一样。桌下放着一架铁火盆。房间怕有两三个月没有人住宿过，也没有人打扫过，灰尘真是“山积”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没有草，也没有草席。我自己决定就在这儿睡下。把纪德甫的雨衣取来了铺在床上，把马灯吹熄，我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间醒了转来，我以为是天亮了，但周围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表时，才十一点过钟，睡了还不上两个钟头。自己还在诧异这突然的睡醒时，颈子上异常的作痒，同时全身都像在发烧的一样。房里的空气闷热得难耐，便索性起床把马灯点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个地方来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来了，奇异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动的一样。我起初怀疑是我自己的眼睛发花，待我再过细看时，这第二次受的一惊比我疑床板的移动还要厉害。真正是见所未见的一个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动着的臭虫！那臭虫的大众真好像是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我是睡在那儿就和闯入了小人国的葛理维一样，足足被它们攻击了两个钟头。把我从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的，就是这臭虫大军。这场仇恨不能不报。我穿着胶皮鞋愤恨地踏上床去，便把那千军万马的臭虫阵践踏了起来。我算是打

倒了一个臭虫帝国。同时又感觉着自己的身上还有敌人驰骋着，便提着马灯，抱着雨衣，跑出了敞厅来。

敞厅上烧着熏蚊子的柴火还没有灭尽，把火拨活起来，把自己身上穿的军服和衬衫脱下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虫丝毫也不夸张地是“势如雨下”。它们受着了炮烙之刑，发出了浓烈的异样的奇臭。

身上的臭虫大约也扫荡干净了，时间还早，便在敞厅上的一个杨妃椅上又胡乱地睡下去了。

七

店主人起得很早。他替我们把早饭弄好，让我们起来吃了之后，也才六点钟的光景。

要准备动身了，到马房去辔马。我那匹老白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来，两只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泪，看那情形它实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没有马夫跟着的马是很大的麻烦，在自己的饮食起居都顾不周到的时候，对于马的饮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地照顾。鞍鞴要自己辔，马到疲倦了的时候得自己牵，那马老先生的用处在我已是消灭了的。我便索性又讲了点子马道主义，把马寄放在面房老板那儿。我留了一封信给政治部后来的人，让他们过身时把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经营面坊的主人是把自己的马卖掉了的，那匹老白马他或许会藏匿起来不肯交出，

但就那样也乐得做了一番顺水人情。老板或许也可以把面坊恢复起来。本来是在面坊里住惯了的老马又落到面坊里，也算得是适材适所。不过那匹马，后来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见得那面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称我也不记得。

夜间住了的雨，清早又微微地下过一会。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虫的悲喜剧还闹了一幕小小的余波。驮着硬洋的纪德甫骑着唯一的一匹青马，我和李德谟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会他叫起来了。他在自己的颈子上抓下了好几个臭虫来。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虫潜藏在衣缝深处，在火上没有抖落干净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脱了下来清扫了一遍。我自己的颈子上也有点罗唆，原来是昨晚在床上放过一下的军帽里面，在那皮沿的内部也藏蓄了好些余孽。

走到八点钟的时候快到蒲圻车站了，愈和前线接近，空气便愈觉得紧张。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从他们口中探听得不少的前线上的消息。据他们说来，汀泗桥的战事是昨晚结束了的，现刻怕在咸宁一带开火。总司令部的火车昨夜已经开到了蒲圻。

在离蒲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过河便是往咸宁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线去的兵士都是从

那儿渡河的。德谟和德甫主张渡河走去，我是主张到蒲圻车站去把择生的消息探听明白了再定走法。他们不肯听我的话，我同他们也就分了手，约定在咸宁聚齐。

我一个人走到车站上去，总司令部的车的确是停在那儿的。我走到那主脑部的车厢去，刚好走到车门口，遇着白崇禧从车里走出。他那时是代行着参谋总长的职务的。他看见了我却是先开了口：

——“哦，K 先生（他对我照例是这样的称呼），你也赶到了这儿！”

我问他：“择生是不是在车上？”

他说：“择生是昨晚到的，我们的车子是夜里到的，他到车上来开过会。今早一早他又赶到前线上去了。现在怕在咸宁和贺胜桥一带开火，陆续有伤兵送转来。我们的兵站部准备得太不周到，伤兵拿着没办法。我们这火车是要立刻载着伤兵开回岳州的。”他又问我：“是不是要去见总司令？”

我答应他：“我是要赶到前线上去的，去追赶择生。”

——“那吗你最好是乘火车，停不一会会有火车要开到咸宁。”

刚好说了几句话，月台有哨子的声音，开回岳州的火车开动起来。我去找着了站长，问明了开往咸宁

的车子是第八军的军用车，还要等一两个钟头才能开，因为军火还没有载好。

乘着还有一些时间，我便在车站上巡视了一下，还有好些没有搭上火车的伤兵被留在车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脚打断了，有的是头上受了伤已经失掉了意识，呻吟的声音异常的凄楚。有很浓厚的硝烟气和石炭酸水气。但是却没见有人吐出怨言，大约也是因为打了胜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杂乱，而在杂乱上是带着了一层欣喜的彩色。

巡视了一会，我又走去找着站长，叫他替我在车上找一个座位。他说他自己不能够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军的营长。那营长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装载军装包子，是新制的革命军的军服和军帽：因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数还穿着从前的军装。

我对那营长说：我是总政治部里的人，要赶到前线上去，要搭他们的车子。

那营长带着一个很冷淡的态度，把我的身子上下估量了一下，他没有说可，也没有说不可，只是对着站长说：“车子怕不够啦，只空着两个车厢了，连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是把我看得很下贱，以为顶高不过是一名准尉司书。那也是难怪的。因为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蓝布的军装，自从由长沙出发以后在山里跑了几天，

已经肮脏得很有点程度；脚上一双烂草鞋套在一双绿色帆布胶皮鞋上，两脚都已经被泥浆紧了。

我听到他那样的口气，也没有管他，自己跑上最末尾的一个空着的铁皮车里去了。等到军装包子装到这架空车来的时候，我在车上也很卖了一些气力，替他们搬运。包子高齐车顶地装满了半车，算也装完了。那营长和他的属员们最后也上了车来，他对我倒也没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铁脸皮在车底的铁皮上坐下了。

八

其实我是太客气了。在快要开车的时候从月台上涌进了好些人来，大抵是第四军落了伍的夫役。营长的手下人不要他们上车，但也没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广东人，高声地反问着：

——“吊那妈，耐牢害^① 革命军？耐害反革命的北洋军？……”

空着的半个车厢已经挤满了，车子开动了起来，月台上还有好些人没有挤上。

挤上来的人里面有一位是第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本是广东大学的学生，他把我认出了。他仍然把

^① 你不是。

我叫着“K 院长”。他说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长沙，现在病好了，要赶到前线上去。他虽然穿的是同样的蓝布军服，但比较整齐洁净，没有像我身上的那样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总司令部的火车赶来的。他背着一条毛毡和一顶第四军的特征的铜鼓帽。他看我坐在铁皮的车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毡解开来叠着，请我坐，我却不过他的厚意，便拉长起来让他和我并坐。

我们的坐处是向着铁皮车的东侧的门道的，和那位营长阁下相隔不远。那位阁下大约是看明白了我比司书的地位要高得一点，他在打开烟匣要吸烟的时候，公然敬了我一支香烟。后来，在九月间，刘佐龙在汉口举行军长就职典礼时，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出席。在行礼毕后的茶点席上我也还看见过这位营长。他的席次和我离开得很远，他公然走到我面前来特别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我们是十年前的旧交一样。可是那营长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没有攀问过，我揣想他现在怕已经升成了军长了吧？

车内和车外的情形都是很杂乱的，但是，是有光辉的杂乱。一切都好像是浮在了战胜的荣光里。铁道两旁和离铁道稍远的路上，都像潮水一样，涌着本军的队伍。

由于夜间和早晨的微雨，空气是很湿润的，一受

着晌午的太阳的熏蒸，倍感着燥热。战死了的北洋军队没有收尸，狼藉在铁道沿线的两侧；死后仅仅十几个钟头，已经腐化着，发出异样的奇臭。汀泗桥是最有名的激战地，在那儿附近的两侧的湖沼里面浮着无数的死尸，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侧着。（在战事告了结束之后，听说从那儿水底捞出了不少的枪械。）那儿的尸臭尤其厉害。

过汀泗桥不远，在东侧的一段疏林里面，有三个裸体的绑在树上的死尸，通是跪着的，一个特别肥，身体异常的苍白而丰满，头是垂着的，嘴上有长长的八字胡须。在当着心窝的地方有一个拇指大的枪眼，从那儿流出的血液在白皙的肚子上画着一条含着润意的黑线。颈背后插得有一道纸扎的箭标，写着“正法旅长一名×××”。人的名字没有看得清楚。余外的两名死尸也没有看得清楚，火车已经跑过了。那三名军官是由吴佩孚正法了的，吴佩孚亲自到汀泗桥来督战，无如战线仍然溃败了。但可佩服的毕竟是大帅，连他自己都要忙着逃命的时候，他却有那样的闲情来明正典刑。

过了那带疏林，在东侧的湖沼的彼岸，看见纪德甫和李德谟两个人牵着那匹青马，夹在队伍中间走着。他们比我先走得两点多钟，但是瞬息之间火车便已经把他们赶过了。这个比赛恰是我们从汨罗跑路

赶到蒲圻来的一个缩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别人的火车只跑了五个钟头。

快到咸宁车站时，在一处空地上看见了邓主任和俄顾问骑的马，又看见了邓主任的一位马弁。那是留在长沙总司令部行营里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车赶来了的。我高兴得很，以为这一次终竟把择生赶上了。在咸宁下了车，我便向那马弁和马的所在处跑去。

那马弁远远地看见了我，就像迷了路的小儿看见了娘的一样，欢喜得快要流出眼泪的样子。他告诉我，他是在蒲圻车站上碰着邓主任的，早晨跟着赶到了咸宁来。主任到城内第四军军部里去了，叫他带着马在车站上等着，一直等了两三个钟头都不见来。他自己还没有吃早饭，肚子又饿，又没有一个钱。

我把了钱给他，车站上已经有些卖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车站外面的壁上四处都是用粉笔写的留白，是某某团部、某某营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属的人员在某处集合或者前进。我在进口处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粉笔给纪德甫、李德谟两个人题了壁报。叫他们在车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军军部。

咸宁车站和县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间有一条路，拥挤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补济着交

通，那些船怕是临时拉来使用的。我跳上了一只渡船渡进城去，问到了第四军军部。但到了那儿时，那儿的留守部队正待要出发。据说军部的主要人们都已经前进了，邓主任也跟着前进了，出发后已经有两点钟的光景。

就这样，这一次的追赶又扑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军军部的留守部队前进，但有德谟和德甫没有跟上，又怕他们在车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个人折回车站去。

九

在车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谟。两个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谟尤其带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像是我叫他们去吃了苦的一样。他们说路是怎样的泥泞，人是什么样的拥挤，空气是怎样的奇臭。特别是还要服伺着一匹马。但这是不能由我负责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于他们的本意。不过我到了后来，就是在我写着这篇回想录的现在，都觉得有点失悔，失悔我自己没有去涉历过那一段路。在火车中坐着虽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桥的战场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宁以上还没有通车。前线在贺胜桥作战，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上敌人所埋下的地雷也还没有扫清。时而有从路线上抬转来的工人，是因为误踏了地

雷受了伤的。赶上前线的队伍大都避开了铁路轨道，拣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铁路轨道走的人也还是不少：因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捷近。德甫和德谟上过走小路的当，我们便决定冒险沿着铁路轨道走去。马是不能骑的，一匹青马也只好交给邓主任的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宁等候后来的部队。

三个人互相隔着五尺远的光景，在铁路沿线上走，起初是很小心的，路轨中间有石子面的部分自然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微有些隆起或新异的地方便要停着脚。但是走过咸宁车站，过了一两道小桥之后，觉得路轨上并没有什么变异，也就渐渐地胆大了起来，放着脚步不断地追赶过在我们前头走着的人。

沿路两旁都有北军遗弃了的物品，刺刀、马刀、军服、军帽、子弹带、手榴弹、下了机关的步枪、人的尸首、马的尸首。那些尸首还没有腐化，像汀泗桥一带那样的奇臭还没有。

在路上赶过了不少的人，在一处山凹处看见了一处地雷爆发过的地方，地上溅的血还是鲜红的，没有凝集。血迹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处看见铁路上在微微地冒着烟，当心地上前去看时，看见了一根枕木在燃，不知道是怎样地燃起来了。我便撒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浇熄了。

被我们赶过了的人中有两位是我们认识的人，便是李汉俊和詹大悲。他们和我是在长沙相识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伞，脚上是一双泥浆了的哗叽鞋，走路的神情很有点狼狈。汉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颇有点滑稽的风味：他穿的是在长沙买的一件不甚合身的军服，戴着一顶军帽，手里也撑着一把洋伞。两个人的优养惯了的白嫩的脸和手都已经烘成桃红色了。

和他们擦身过的时候，问他们遇着过择生没有，他们说在蒲圻遇着过，以后便一直分了手。看那光景他们也是昨晚由长沙乘着总司令部的火车到达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赶上来的。

就这样一直赶到向晚的时候，快要到贺胜桥了。在澄清的空气中，隔着山还听见前面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踊跃了起来，以为这一次总可以赶到最前线了。但到我们赶到了贺胜桥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天色黑了下来，有很多的部队在离市街不远的一个村落里宿营，四处都起着营火。我们去问了好几处，问第四军的司令部，有的说是前进了，有的说是扎在贺胜桥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领。

在咸宁的时候，因为城内的饮食店都把食料卖尽了，我是只在街头买过一些豆腐干来当了午饭吃的。德甫和德谟也只在咸宁车站上吃了一些粉条。三

个人没吃中饭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饿得来不能忍耐了。又是星月都没有的黑夜，要赶路也没有办法，只得到一家农家里去歇脚，托那儿的主人替我们准备一些夜饭。

正在吃夜饭的时候，詹大悲和李汉俊两人也赶上来了。不约而同地也落到我们停留着的农家里。他们是带有一位下人，一来便闯进了那农家的内室，把那家人的寝室占领了。那下人回头又拿了一个空菜匣来，把我们弄好了的饭打了一匣去。我到饭用完后走进那寝室里面去看过他们，他们也正在吃饭，菜匣里面带着不少的干粮。我心里感觉着不大愉快：他们既有那样多的好菜，为甚么看见我们在吃白眼饭的时候不分出一点给我们，要把饭拿到这儿来藏着吃？为着那样小小的事情怀着大大的不平，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觉得真是孩子气，但当时的实感是那样，我无须乎掩饰。

睡的时候，德甫从农场上拉了两把稻草来，铺在门道外边的一个角落里，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门道内的小小的堂屋里，有一架炕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谟便在那上面打横了起来。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门来，和炕床平行着，放在两个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卧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约是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门扇便一同倒在地

上，发出了蛮大的响声。我自己被惊醒了，连睡在炕床上的德谟也被惊醒了，他模糊地问了我一声：“炸弹？”

我倒下地时，右脚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脚棱上，起初麻木着没有感觉着什么，待把两个短竹凳移开，就尽那门扇陈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时，小趾疼痛了起来；把火柴擦燃来看时，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血泡。

十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来赶路，连早饭也都没有吃。这一天关于沿途的记忆丝毫也没有，大约是因为始终都在铁路沿线上跑，所接触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没有变化的原故。现在所记得的只是自己担心着怕不能走路的脚，在路上跑着却也没有怎样吃苦。

在傍晚时分跑到了离武昌城仅仅有十五里路远的纸坊。听说第四军的军部是扎在纸坊车站上的，跑到车站上去问，又已经前进了。据留守的人说：“怕现刻已经进了武昌。”

听着这样的消息应该是喜欢，但在我自己却把赶路的兴会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线去参加实际的作战，但是从汨罗跑

到纸坊来，足足跑了一个礼拜，才不外乎是和从前上京求名的“风餐露宿、星夜登程”的举子一样。德谟和德甫两人也和我抱着同样的感觉，我们决定当晚就在纸坊过夜，等明天清早起来再走。

留守处的人叫我们到车站对面的站长住宅里去，说那儿有空着的房间。我们找了两升米，便拿过站长住宅去。那儿有一个花园，花园中一带房廊东头的确有一间空房，陈着三尊大床也都是空着的。房间的东南两面有临着花园的回廊，回廊边上围绕着栏杆。我们到橱里去找着了一个小火炉和沙锅，拿到回廊上来准备熬点稀饭。同时德甫在园子外又找了些蔬菜来，准备一同煮在那稀饭里面，沙锅的容量颇大，我们尽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异常，闻着稀饭的香气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

稀饭让德甫和德谟两人熬着，我一个人又到车站上去打听前方的消息。刚走过车站去便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来，露天中的杂色队伍都涌进车站来躲避，挤得来真是和新开封的火柴匣一样。就这样暂时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军用电话似乎受了雨的影响，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见那儿的回廊上已经纵横地睡着了无数的人。走进房里去，看见德甫和德谟两人睡在近门的一尊

床上，里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汉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陈着他们被雨打湿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几个人。原来詹、李两人也同落在这儿，他们在中途雇了轿子坐来，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问到稀饭上来。

德谟睡在床上说：“我们弄好了，等你不来，正在吃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也来吃，连轿夫也来吃。他们说他们有米带着，吃了再煮，一锅饭立地便吃干净了，连我们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问：“再煮的稀饭在那儿呢？”

没有人回话。

汉俊在床上叫着他们的下人：“你煮的稀饭呢？”

——“我们马马虎虎地可以过去，没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们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饥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难遏抑地想痛骂出来。但只客气着又连说了一声“糟糕！”

——“不要紧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进武昌城去，我请你们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担心吃铅弹。”

我对于詹大悲，特别地感觉着一种先天的不满意。我在肚子里面骂了他好几声的“臭官僚”，“投机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员会里面，是有他的名字

的，他这一两天来赶路的热心不外是去抢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国民革命！不外是让几位投机的烂绅士做做新官僚罢了！”——心里尽管怀着怒气，但也没有说出口来。

床上已经没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浆的脚践踏得没有睡下去的勇气。我索性负着气从房里跑出来，拣着东面的回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上的饥饿交战，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会也什么都不在意识里了。

十一

九月一号的清早又由纸坊向着武昌城出发。早饭是不用说的，连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么物什都买不到。

在路上走不好一会，看见田畴间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庙宇。我们便避开大路向那庙宇走去，想在那儿找点食物。汉俊也跟着了我们来，詹大悲坐着轿子竟自往前头去了。庙宇的名字我不记得了，走到那时才是荒废了的一座，连乞丐的影子都没有一个。

汉俊说：“还是熬着一下，我们赶进武昌城去开早饭啦。”

他说着又独自从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们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些

人家，我们便向那儿走去。

那儿是小小的一个村落，有好些农家的儿童们站在村外看铁路沿线上过兵，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看见了我们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惧，有的反向着我们走来，问我们要空弹壳。

走进村里去，走向一家起着炊烟的门首，说明了我们要买点食物吃，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欢迎，请我们进门去。通过小小的厅堂，在厅堂后面的厨房里一张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对着一道后门。门外是一片敞场。厨房的另一边是一个长灶头，正在煮着豆浆。原来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生意的。据说平时是送进武昌城里去卖，自战事发生以来已经有好几天没做生意，今天因为“南军”胜利了，他们又才开起火来，准备午饭时挑进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见我们到了，便有好些人围集来了，探听军事上的消息。我们根据着数日来的长驱直入，满相信着先头部队是已经进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们还要坚决。他们说，昨天下午三点钟吴佩孚、陈嘉谟坐着的火车跑过。接着便是崩溃下来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赶上来的南军，和吴佩孚的火车相隔得只有两三个钟头。以后便一直连夜连晚都在过兵，过到了现在还没有过完。村里人就像自己打了胜仗的一样，非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

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说：“我们南军怕有好几百万人马啦。”

主人把煮熟了的豆浆和现成的饭、现成的豆腐干来犒享我们。我们一面吃着，一面和他们谈笑。说也奇怪，我们也并没有向他们宣传，事前也不会有人向他们宣传过，他们总口口声声地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这样期待的“南军”自然会打胜仗；但是打了胜仗后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后门的敞场上有喧哗的声音起来：“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来！……”大家涌到后门外去看时，一群村上的人在敞场边上一排杨柳树列下围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们也走上前去看时，原来他们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装的北兵。

那北兵被众人揪打着，口口声声地说：“咱不是北兵，咱是南边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么也不能改变。

——“你这北方拐子！你还在扯谎！你这狗娘养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鸡。——你这身上的衣裳是偷来的。——打！把他打死！……”

有用拳头的，有用脚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来了，哀号了起来。

我们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开。我们对大家说，那位北兵也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没有出路才来当兵的。他从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个人不好，是他们的官长不好。又对他们说，南军里面也有北边人，北军里面也有南边人，并不是南边人就好，北边人就不好。德甫是山东人，在这儿他自然提出了一个现身说法的实证。

大家都了解了我们的意思，把敌忾和缓了下来。那位北兵欢喜得流着眼泪，一翻身便向我们磕了几个响头。他回答着我们的诘问，说他是河南人，他是参加过南口战事的，从河南调到南口，又从南口调到湖北，他们的军队有两个月没有发炮。

——“你现在要往那儿去？”我问他。

——“咱要回家乡去啦，副爷。”

——“你可有路费吗？”

——“连一个铜板也没啦，副爷。”

我们把了几块钱现洋给他，他接到手里便扑东一声又在地下磕起响头来，向着我们三个人每人磕了一个头。

——“三位青天大老爷，三位救命的活菩萨！咱要赌咒，咱一辈子不再当兵了。”

那人起来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狈地走了。有的人

在他的背后叫着：“老乡，你回去传传名啦，看我们南军的官长是怎样有良心。”

那人把头点着，没有掉过身来。

把剩下的饭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对他们说：

——“南军的官长，你老不要着急，队伍是一定进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饭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打从铁轨路线上去，走不好远便有一道桥，桥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赶船到武昌，可以赶到文昌门进城，比走路来得快，也来得舒服。”

我们听着他的话，着实很愉快，并也决定照着他的指示，赶船。心里还暗暗地在耽心，怕所说的船通被北军拉走了。

把饭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饭钱，辞别了店主人出门。他们还把我们送出了村口，远远地向我们指示着那赶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铁道路线，杂在一些队伍里面走了不远，果然有一道桥，但是桥下是连船的影子也没有的。我们还以为船是一定被北军拉走了，说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军队拉走了，不得已只好还是走路。

十二

愈朝前走，路线上的本军队伍愈见稠密，走到后

来队伍是停止着进行的。我们便一直向前超越过去。在八点钟过的时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队伍的最前头。在铁路的正中看见了邓主任和铁罗尼顾问，和另一位背立着的人在那儿在讨论着什么。他们也看见了我们。择生把左手的拳头高举起来，满高兴地向我叫着：

——“呵，你们到了！”

背立着的那个人掉过了头来。是一位中等身材、古铜色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里含着一支大雪茄。

铁罗尼照例把两手来握着我的两手，连连地叫着“Genossen K, Genossen K”，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双眼睛充满着光辉和喜悦。

择生把另一个人为我介绍了，那便是第四军的第一师师长陈铭枢。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的。

——“还没有进城吗？”我问着。

——“敌人跑得太快”，陈铭枢说，“我们赶迟了一刻。”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是走到了最前线，一方面高兴着我们还可以参加最后的一战，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谟说：“我们幸好没有赶船，如果真的由文昌门进了城，现在是成了俘虏啦。”

周围的风物渐渐映到了稍有余暇的心境里来。

空气是异常清澄的，近处的树木戴着青翠而新鲜的叶冠，有的还在点滴着夜来的宿雨。

稍后几步，有一位肥胖而白皙的人，嘴上有八字胡须，头上戴着尖顶的京帽，穿着长衫和坎肩，坐在路轨上面。择生把他颐指了一下，对我说：“那是咸宁县的伪知事。”在那人的旁边还有几位穿长衫的人，想来也是由咸宁带来的。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样子很镇静，但他操在膝前的一双手却掩不着他内心的恐怖，不住地在发抖。旁边穿长衫的人有一位像是他的跟随人，问他冷不冷，他只把头摇着。

我问择生：“把他带到前线上来是什么意思？”

择生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微笑说：“我们是要骇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还在替吴大帅办差，那晓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择生们还没有吃早饭，不一会有人担了一桶饭来，他们便踞在铁轨路线上吃。附近的农民围集了好些人到我们周围来，他们也异常高兴。有些人特别送来了饭菜。

——“把一支枪给我们吧，”其中有一位很勇敢地向着我，说：“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经过训练才行。”我对他说着，“我们的战火还很长，将来要打到北京去。

把武昌打下了的时候会招兵，你来应募好啦。”

正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在那澄清的空气中突然轰的响出了一声大炮。围集在我们周围的农民就像一群鸟雀一样惊散了。

——“哦，开火了！”在后边的队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

我特别把那位咸宁县的知事看了一下，看他的脸色吓得碧青，嘴唇变成了紫色，牙关连连地在发战。

作战的计划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师长的张发奎已经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处炮击宾阳门一带。停留在铁路沿线上的队伍进攻中和门和保安门。陈铭枢的队伍摆在南湖一带作两方的策应。目的是希望敌人出城来应战。

敌人的大炮接着又响了几炮，是正对着铁路沿线打来的。炮弹来得很高，在我们的头上拉着风远远飞到后边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炮声，似乎我们的炮队也在应战。在铁路沿线上的左翼军采取了散兵线要开始进攻了。陈铭枢带着了一部分队伍从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宁县知事是一同带了去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释放，还是遭了枪毙。

敌炮的间隔愈来愈密促，中间夹着步枪的射击声。择生听着那枪声，他很高兴地说着：“吓，敌人

开城应战了！”

俄顾问尤其高兴，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国话说：“Genossen K, wir wollen in Wuchan Mittagessen geben!”^①

前进的军号吹起来了，队伍逐次前进。我们是沿着大路走的，铁罗尼走在最前头，其次是择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谟。敌人的炮接二连三地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头的铁罗尼和邓择生时，却不免又惭愧起来。那矮小的铁罗尼，他是骑兵将校，革命战役时右边的膝头上受过伤，因此在固有的骑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层颠簸的意思，愈见像一只水鸭，但他的头部却丝毫也没有动颤。曾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也照常把颈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着直党党地在走。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颈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筋的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① K 同志，我们要进武昌城开午餐会啦！

十三

起初每人相隔得五尺远的光景鱼贯进行着，敌弹来得愈见密接了，铁罗尼和邓主任教我们走下路边去向田塍上散开来。他们说路线来得高，五个穿着官长服的人进行着是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的。我们服从了他们的指挥向左侧的路旁走下去。一离开了路线，斜坡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湿了的土是很疏松而泥泞的，异常难走。

走下了坡时看见了詹大悲，他是逼紧着坡脚走的，身上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经有好几处被泥染污了，他似乎跌过好几跤。看见了他那样狼狈的情形不免又生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着说：

——“詹大老，你很有军事上的经验啦。”

——“怎见得？”他问我。

——“你懂得借路塍来抵挡大炮。”

没有等待他有回答的余裕，又是轰的一声飞过，詹大老把杖着的洋伞举起来在头上挡了一下。

下边的田地里是采取着散兵线进行着的我们的军队。人人都带着一个严肃的面孔，进行很迟钝，一些下级的军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确是可怜的一幅图画，要说是和驱着羔羊上屠场一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前面并没看见敌人，但听见有枪

声，有些枪声来得也很近。蓦地有冲锋的军号吹奏起来，下级的连、排长高撑起指挥刀呐喊着冲锋，向前面突贯，军队跟着突贯，我们也跟着突贯。

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没有遮拦的地方，看见了武昌的城郭了。那连接着的通湘门和中和门上的城楼在惨淡的白光中缥缈着，却没看见一个敌人的影子。在前头领导着的军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们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敌人从城墙头上不断地把大炮轰来，但那些炮手们似乎很少经验，也怕是由于接连的大败已经是惊惶失措，一炮二炮地都打从头上飞过，落得很远的后方去了。炮到不能打准，渐渐失掉了它的威严；我自己的头公然也不再为它低下去了。我感觉着一种嘲笑的趣味，觉得敌人是在放花炮。尖锐的步枪声，啪啪啪啪地连响着的机关枪声，也就好像是一些鞭炮。

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次的冲锋真是有点奇异。不知道是什么原故，那些军事上的指挥官在开始冲锋之前竟没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敌情，只听着枪炮声便往前冲，结果是向着空气冲了一阵。这儿自然有一个心理上的遗算。大家以为敌人一定会要背城借一地出城迎战，但那知敌人是害怕了的，冲锋的结果，只是明白了城里的敌人是想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

不知道是从那儿传来的消息，又说敌人是由保

安门出了城，有一部分队伍又冲向保安门，我们也跟着冲去。

保安门外是有市街掩护着的，街坊上很热闹，卖饮食的店子早已经在开门做生意了。两侧布满着的我们的军队，都停止着没有作战。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门的敌人也还是没有开门。我们三个人便一直沿着街侧往前进，有些下级的军官注意我们，叫我们留心着流弹。城上的敌人时时在对着街路上射击，街上的居民和本军不断地有遭受流弹的人。愈朝城边走，街面愈见惨淡，铺口都是掩闭着的。我们一直走到看见了城门口的地方，看见了那严闭着的城门。这一闭关真是有点令人失望，同时也有点令人愤恨。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两扇木制而蒙着铁皮的城门，就和中国的封建余孽一样，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还在发挥着它们的威力。我想到那样的古城，就拿大炮来轰也一定是可以轰破的，但可怜的是在本军的队伍中竟连那样的大炮也没有。有几尊新捕获的野炮已经运到洪山去了。后来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炮想要打进武昌城都没有打到。

从城门边上又退转去，在街面的右侧找着了左翼军的司令部，我们走了进去。在里面的一间客厅里看见了铁罗尼和邓择生。他们在一座炕床上对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择生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

着什么事情。有好些穿长衫的街坊上的绅士们很匆忙地进出着。

“Genossen K, neharasho! Wir können nicht in Wuchan Mit — tagsessen geben.”^① 很有点幽默味的铁罗尼假装着一个失望的样子对我说。

“Vielleicht können wir eine Abendgesellschaft geben.”^② 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语来和他应答。

客厅正中的方桌上堆着无数的肉心馒头，我和德甫、德谟三人不期然地都同时伸出手去拿了来吃，自从离开长沙以后，整整一个礼拜，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吃食。

敌人既采取坚壁的办法，白天的战事是没有进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敌人或许会于夜间出来袭击。择生和俄顾问都要参预军事计划，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盘托付了给我。计算起来比我稍缓一步的由石城矶来的部员们在日内或者会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个临时办公处来集中这一部分人。万一在日内或者夜间攻进了武昌，各种标语和布告丝

① K 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

② 或者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的。

毫也没有携带，是应该临时写作的。还有隶属于各军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应该召集起来，讨论一下在城外四乡及入城以后的工作的步骤和范围。政治部的临时办公处决定设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学（后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我和德谟两人便和他们分了手。纪德甫是要跟随着俄顾问作翻译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们再在一道了。

敌人从城墙上时常有枪炮射出，我们退到着弹距离以外迂回着向南湖走去。途中经过一些农家，他们于惊惶之中都带着亲睦的气象，对于我们表示出满腔的欢迎和信赖。他们并没有逃避的情形，有些农家在屋子里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来躲避子弹，让孩子们踞在那儿。

十四

在文科大学遇见了李汉俊和几位湖北党部的人，还有在暑假中留在学校里的几位学生，其中有两位是我们四川人，我已经把他们的姓名忘记了。多蒙他们的帮助，在学校后部的一段楼房里，找了几间房间来做办公处。学校的中枢部和楼下的全部已经被军部驻扎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写标语，做传单，同时利用着大学的学生们向四乡去宣传。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带领的一批人还未见到来，反是在长沙留守着的一大部队人和党红会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广东附随着政治部出发的）赶着火车先到了。正在为安置他们忙乱着的时候，择生派了人来把我和德谟找去。

我们被引到了一座小巧的洋房里，那不知道是铁道局的附属物，还是外国宣教师的住家，暂时在做着军司令部。在一间精巧的客厅中，很杂乱地呈现出一些军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国顾问，邓择生和铁罗尼都在那儿。兴高彩烈地有好几种声音，好几种言语，在作着军事上的杂谈。淡巴菇的烟子和气味是很浓烈的。

择生看见了我们，他第一声问我们的便是吃了饭没有。由他这一问，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门外吃了几个肉心馒头之外，还不曾和饭见面。他吩咐了那儿的护兵替我们送了两份来，我们坐在一个角上和大家的谈话不相干地吃着。说也奇怪，在有好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忘记了的我，却把那晚吃的菜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是吃的清炖鸡，火候很适宜，味道也很合口。

择生在众人的谈话中是最热心的一个，因为他在前本是军事上的人，第四军的主脑部都是他的旧友。他能讲德国话，能够直接用德国话来应对俄顾问的一部分谈话，或者替他们翻译。在谈笑之中也时而

有军事上的报告送来。有一次是第一军的刘峙师长派人送来的报告，说他的队伍开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驻扎在铁路工程处。但那报告没有遵守军事上的格式，也没有记明时刻。会集在那儿的军官们便拿来做了讥评的中心，择生讥评的特别露骨。

——“连军事上的 ABC 都不懂，也在做师长。”

第一军从广东出发时是派了两师人参加的，在未到长沙以前部下的队伍已经逃走了不少，一直没有上过火线。在长沙时其中有一团人成立党部，我代表着总政治部去出席，那一团人中有一三分之一是在长沙新补充的队伍，有好些还穿着长衫。但到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昌城下了，那刘师长却也神速，用火车载着自己的兵赶到了武昌城下。

——“名将的用兵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的。”说这话的是好颇以儒将自命的陈铭枢。

择生又来问了我们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把下半年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诉了他。向他说留在长沙的大部分队伍乘火车到了，反是代杰所带领着的一部分先遣队和胡公冕所带领着的一部分的宣传大队还没有到。

——“他们大约在路上没有赶上火车。还是我们几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择生又很得意地说着，但他却没注意到他的话是有点夸张：因为他忘记了他自

己的脚是踏在马镫上的。

他又简单地告诉了我们一些军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汉口的刘佐龙派了代表来输诚，交涉还没有办妥。吴佩孚在昨晚崩溃了下来便渡过了江去，大约连夜逃向河南去了。我们这一方面有第八军派了一部分队伍由白沙洲绕道渡江，已经取得了汉阳，早迟要向武胜关进军，以截阻北洋军队的来援。城里的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想来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吴佩孚的来援。但当晚自然要提防他们的夜袭，那倒是很值得欢迎的事。

——“他们要出城来夜袭，那是他们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择生用着他爱用的表现法来这样说。

待我们把饭吃完了之后，聚集着的军事上的要人们大都分头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择生和铁罗尼是要留在司令部里的，我便和德谟又回到文科大学。

十五

那一天晚上敌人没有动静，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动静，军事上的人们有些焦躁起来了。攻城的大炮没有，飞机也没有。（有由俄国朋友驾驶的小飞机还没有到，但也不是军事用机。）对着一座封建时代的古城简直没有办法。

军事上的人们在中午时分开了一次会，决定组

织敢死队，在当晚乘着夜阴去爬城。本来是没有工兵队的革命军，政治部在这时候又成了临时的工兵队。好在这时候代杰所领率的一批先遣队和胡公冕所领率的宣传大队都已经到齐了。政治部派了许多人到四乡去征发梯子和麻绳。梯子是一块钱一架，由政治部发出征发券。被征发了的人家可以凭券到政治部来领钱。

征发队一派遣了出去，络续便有好些梯子征发回来，有些是崭新的，有些旧得来怕已经有百年以上的高寿。凡是旧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约是用久被折断、被锯短了的原故。爬城的地点是选定在宾阳门的东北角上一段小丘上，那儿的城墙比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长的梯子连着两架，短的连着三架，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积在南操场上，部里留下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兵，便一同在那儿绑扎起来。由我自己的手也绑扎了三四架。绑扎好了，又抬到学校门外去。

在夜半的时候，由各军所挑选出来的敢死队到南操场来齐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队，每小队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架，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队打荷起去。

择生是要跟着去督队的，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告奋勇也要求去，择生不允许。他说我也走了，部里没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明天

进了城之后。竟连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在东江之役本是有阵地经验的人，他都不肯让他去，只挑选了十名的宣传员带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场送着敢死队出校门，已经是两点钟过了，看着他们荷着长梯，向黑暗中消逝。天上仍然没有星月，灯火不用说是不能点的。看着这样的光景，不由得把《易水歌》在脑里的银幕上浮现出来，不断地起着寒栗。

在敢死队出发后，一方面做着第二天清早进城的准备，一方面静候着前线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时候，稀疏地听见了一些枪炮的响声。爬城的计划显然是失败了。在五点钟的时候我叫胡公冕到总司令部去探听消息，结果是不出所料。因为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

在前线上虽然没有直接的交绥，但仍然有中流弹的士兵被送转来，总司令部的卫生处是组织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伤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的卫生股只有一位股长和两位股员，仍然不济事，好在党红会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属在政治部的，她们也很踊跃地帮着做救护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点钟，邓主任和俄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

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在做着小队长。

从文科大学向北走去，不远更折向东首时，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里和通湘门以东的城墙平行着，全无掩蔽。城楼和城墙很鲜明地现在左侧，城上的敌兵都隐约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抛撒着，自然是昨晚的绑扎不牢，在途中解脱了的。宾阳门一带的附郭居民，为避免前线上的炮火，负荷着家财向乡下逃难。男男女女在田塍上络绎不绝。

走到洪山的宝通寺近处，路上有鲜红的还未凝结的血，过路的士兵对我们说：刚才有一位兄弟在这儿中了流弹。

宝通寺是卫生处驻扎着的，成了临时的野外病院，门前呈着很杂乱的情形。但我们没有工夫进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关帝庙，那儿是前敌司令部的驻扎处。从那庙门走过时，陈铭枢含着一支雪茄刚好从左侧的大门中走出。我那时候很佩服他，觉得他很沉勇，就像是关圣帝君显了神的一样。连那在他的后面跟着的两名护兵，也就像是周仓和关平。

我问我们的关圣帝君：“择生是不是也在里面？”

关圣帝君曰：“不在，怕还在前面的长春观里面。”

他也是要往前线去的，我们便跟着他一同走出了关帝庙的东辕门。

从那儿走出了之后，左侧是一两家人家的背后，右侧是一段空地。空地尽处，左侧的人家也尽了，接着在道路的右侧又有一排和城墙正对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门户都是掩闭着的，同时怕已经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晌午的阳光照着，城墙上明显地可以看出的敌人，不断地向那阳光中放射出啾啾的枪声，把那儿的光景渲染得异常惨白。但无论你怎么用力地凝视，那些神秘的子弹你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的关圣帝君长叹起来了。

——“顿兵于坚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戏的口白这样说，同时又回向着他的两员站将，提着驳壳枪的周仓和关平。

——“你们到这屋后去看看，看有没有背道好走。”

两员护将去探寻了一会，转来报告的是：“没路好走。”于是我们的关圣帝君把头摇了几下，又走回关帝庙去了。

十六

我们和关圣帝君分了手，向那惨白没有掩蔽的

道路上走去。三个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寿走在中间，胡公冕走在最后，每人相隔五六尺远。开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时候是心惊胆战的，说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 and 那些啾啾地叫着的神秘的东西相遇。但到走过了那四五十步，觉得退转去也还是一样了。愈朝前走便愈见冷静了起来，是由死心塌地中生出来的冷静。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两句话，所谓“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颇感觉着一种轻淡的幽默趣味。

就那样恍兮忽兮地走着，眼前用红墙围着的长春观真好像就是长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门首遇着了独立团的团长叶挺。他也带着了两名护兵由那儿出来。

——“喂，赵子龙，怎样？”我这样简单地向他打招呼。我们当时在对外宣传上是称他为赵子龙，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却不曾知道奉上这个徽号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头摇着。

——“择生是在里面吗？”

——“我也在找他啦，里面连一个鬼影子也没有。”

——“他该不是战死了吗？”

——“不会的，我们今天清早一同踞在这儿，隔

着墙和城墙上的敌人对打。他叫我去找陈师长，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转来便没看见了他。他是和铁罗尼一道的。

——“陈师长我们在关帝庙的门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转去了。”

——“糟糕！”神经质的赵子龙愤慨着，失了眠的充着血的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嘴唇在战颤。

我们又各人离开来，先先后后地退转去，叶挺折进关帝庙去了。

由关帝庙的西辕门退出来的我们，走不好远，在路的左侧一座花园的柴门口遇着了邓择生和铁罗尼。他们两人坐在那门槛上，纪德甫和择生的两名护兵立在他的面前，都带着一个很疲倦的面孔。铁罗尼的眼膛分外的黑，眼仁充着血，向着我微笑。择生却很不高兴地问着我们：

——“你们来干什么？”

——“来看看前线上的情形，同时来找你们的，怕你们阵亡了啦。”我回答他。

择生苦笑着。

公冕问那十名宣传员的去向，择生说：“那几位小家伙骇倒了，在关帝庙前面的一家人家里躲着不敢出来。死是不会死的，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到了晚上会爬出来的。”他又回过来问着我：“你们走到了

前面的那儿？”

——“到了长春观，遇着了叶挺。他进关帝庙去了。”

他硬着颈子偏着头点了几下，扁着的嘴边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会再有战事的，我们回去睡觉去吧。”择生这样说着站了起来，又用德文来向着铁罗尼说了一遍，铁罗尼也站了起来。

大家默默地走着归路。走过了洪山，在一个小小的庄落上遇着上前线来的总司令部的一群人。其中有总司令的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勇名啧啧的张发奎——那时候我们是称他为张飞。但这位近代张飞的身子很矮小，脸也很尖削，头上一顶软军帽，俄国式地朝天戴着，身上穿一套洗淡了的青色布军服，裤脚敞着，脚上穿一双绿色的胶皮鞋。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样子，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一定会把他当成勤务兵。

两来的人一接头，两种国语的会话各自分开来了，各各报告着前线上的情形。立着谈了一刻，择生和铁罗尼又随着总司令部的一团人折向前线去。他们要到前敌司令部去开临时军事会议。我和公冕们便同他们分了手。

十七

时候已经过了正午，因为口渴，我们便走到一处人家去求一点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列三间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挂角上有一带耳房，后面还有一排老房子，看那情形大约是中等地主而兼带着自行耕种的农家。我们向那左手的耳房边走去，因为那儿的后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厨房的所在。

耳房里坐着好些女眷，又纵横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墙附近的居民到这儿来避难的。我们说明了来意。厨房里出来了一位中年的农妇替我们捧了一壶茶来，并且请我们往外面最右侧的一间厅堂中去休息。那家里的男主人也出来了，是一位很朴素的中年人，很客气地来陪我们坐了一下。他问明了我们还没有吃中饭，又留着我们吃饭，叫他的女人替我们杀一只鸡。

在饭没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壶酒来，有两盘花生和豆腐干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寿也推说不喝（大约也是因为大队长在面前有点忌惮）。我一个人便自斟自饮起来。酒是黄色而带甜味的，和我们四川乡下酿的荫酒相同。那种酒的酒母是糯米制的甜酒，有时掺些烧酒在里面，又泡些香椽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来的酒也有香椽一类的

香味，大约泡制的方法是完全一样。这种酒在成分上是一种混成酒，喝时很可口，喝后却很醉人。

我不客气地把起初送来的一壶酒喝干净了，主人把饭送了来，鸡是红烧的，另外还炒了一盘鸡杂，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壶拿了去，又替我换了一壶来。我已经有几分醺醺的醉意，推诿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气”，主人说，“你老是军人，军人是能够喝酒的。”

——“他不是军人呢，”公冕对他说，“他本来是大学堂的先生。”

——“哦，怪不得总有几分斯文气象啦，”他说，“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紧，你老再喝一壶吧。”

说着便提起壶来替我斟酒，还说了一些菜不好的话，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饮起来，把第二壶也喝得干干净净，足足怕喝了两斤荫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饭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钱包倾倒了出来，凑集了三块钱，把来交给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说：“你老在替我们老百姓出死力，这点我们是应该孝敬的。”——在这些地方足见得当时的农民对于革命的信赖和欢迎。当时的革命军比较上还有点纪律，而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

军用票，如像“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

我们在那一次不用说也卖了一下膏药：“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

把钱放在桌上，告辞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充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隙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像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充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

夫役们更加忙乱起来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道：“城墙上的炮手打得还不错啦，只可惜那炮弹怕

是劣货 made in Japan^① 的。”

——“这两炮都不错，也怕是地面松的关系，要是爆发了，今天的牺牲是很不小的。”公冕这样说。

夫役的一队人把正中处走过了，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撒尿。尿正洒到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这一炮大有进步啦，吓！”我一面撒着尿，一面感叹着。

队伍把那段路已经走过了，连公冕和恩寿也一同踉跄地退了转去，只剩我一个人立在地里。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我退转去走不几步，看见路上倒了一担稀饭，路旁的番薯地里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儿呻唤。

我问他：“你受了伤吗？”

他指着他的左脚脚颈：“嗷哟，吊那妈，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伤的夫子等着，回头便去替他叫担架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

① 日本造。

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睡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十八

九月三号和四号都没有动作，只是敌人早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学是革命军司令部，时常有大炮对着这个方向打来。因此在夜间是不准点灯的，有点灯的必要时都须得在灯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们所住宿着同时兼带着办公室的房间是在楼上最后的一排，背面的窗口正对着武昌城。在四号的晚上，在两个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军服来罩在马灯

上，我和胡公冕、朱代杰、李德谟几个人在拟定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军去的政治工作人员名单。正在这时候，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两个人走了进来。他们和邓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间空出了的讲堂里的。

铁罗尼是很有趣味的一个人。他虽然是骑兵将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知识是很正确而丰富的，而且还有文艺上的教养。他很喜欢诗，特别喜欢往年自杀了的俄国的薄命诗人约先宁。在行军途中，他随身带着的一册约先宁的诗集，有时我以纪德甫为介，请他把那清新的歌咏农村的诗，替我们在口头上翻译过。

大约因为我也是喜欢文艺，而且也特别喜欢诗的原故，铁罗尼和我很能相得。自从从广东出发以来，一有闲暇，他每爱和我作个人谈话。在那样的时候自然总是靠着纪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们把名单拟定，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又才谈起话来。

铁罗尼问我进了武昌城以后的工作步骤，我把预计着的梗概告诉了他，他特别注重对学生方面的宣传。他说：“武昌的师范大学有不少的学生，那儿听说是国家主义派的根据地，现在虽然是在暑假期中离开了学校，不久便要开学了，他们是又要转来的，你用怎样的理论来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以前还没有到广东的时候便曾经思索过的。因为在上海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如像“醒狮派”和“孤军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学，有过半数和我相识。我知道他们有好些的确是有爱国热诚的，他们是看到中国的积弱，总想用最良的方法来把中国强盛起来。他们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谓国家主义。“醒狮派”的人很笼统，他们的国家主义只是一种热情，一种声浪，更具体地说，只是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两个口号。内的国贼是什么，外的强权是什么，怎样去除，怎样去抗，他们并没有充分的素养来分析。虽然在曾琦口中也曾经提出过飞机潜航艇政策，但是可怜，他老先生却没有想到飞机和潜航艇不会从天飞下来，从海里浮出来的。他们对于经济问题还没有睁开眼睛，极简单、极捷近、极可痛心的一个实证，每天呈在眼面前，他们都没有见到，那便是他们的机关报《醒狮》用的正是洋纸！

“孤军派”的人比较起“醒狮派”是要“醒”得一点。他们比较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主张恢复约法，主张裁兵，也特别把经济问题提出来讨论过。他们大体的倾向在拥护个人资本主义。这一批人大体上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他们更有一个具体的信念，便是要仿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一样

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但自变法维新（便是由封建制度变成资本制度）以来不数十年，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第一级的强国。日本正好是中国的指路碑，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这个提示正是他们和一切的常识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条，他们是相信中国一定能够。但其实这儿正是一个问题，问题便是：日本人用那样的方法强盛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中国人要效法日本——这是中东之战以来的中国的国是。自甲午以来中国送到日本去的留学生，没有详细的统计，我想至少总在三四十万以上，就是我们自己便是由这种国是中所产生出的一个世代。但我们效法的结果是怎样呢？

效法日本其实是间接效法欧美，更具体地说，便是在暗默间想怎样来把中国数千年沉滞着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除派遣留日学生之外，派遣到欧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个总数和留日学生也会是不相上下的。但那仿效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中国人效法欧美，事实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欧美以前。举出些简单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圣经》是从汉译本重译过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乃至大正时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国邝氏著的

《英文熟语辞典》！然而这个情形在四五十年后恰恰颠倒了，中国人甚至要采用日本人编著的中国史了。

问题的面貌在这儿更加显明了起来，便是日本人效法欧美成了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我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为有地大物博的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欧洲的资本主义侵入东方来，日本是同样受着患害的。但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日本岛子，在欧美人看来，比较起中国自然是没有多么大的殖民价值。因而在资本主义的进军向着中国万箭齐射的时候，日本人便在这短时期内培植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要仿效日本，想在今后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国更好的殖民地来缓和欧美的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进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的一样。然而这个条件已经是无法具备的了。中国今后要想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国主义者火星或者别的星球上发现了广大而有价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这样的意见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之下，对着铁罗尼谈出，他很表示赞成。他说：“土耳其近年的国权运动的成功也有同样的意义，便是近东问题已经解化成远东问题了。”

——“土耳其的外观上的成功，英法帝国主义的

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吗？”我多少带着反驳的意思这样说，“意思不是在掣肘苏联吗？”

——“那是自然，”铁罗尼说，“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样，那时又是在掣肘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假如没有日英同盟的掩护，恐怕它的成功也没有那样的快。不过根本还是中国做了乌龟。”

乌龟这个表现我起初没有懂到他的用意，觉得有点奇怪。我又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说的神道碑下的赑屃。那在行军途次他是看见过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来。不错，我们的背上的确驮着很大的神道碑，碑上刻写着有旧时代的残骸“军阀”和“官僚”，在那上面更狼藉着无数的帝国主义者的商标。

话正谈得高兴，突然有一声大炮落得很近，而且爆发了。室外起了一番哗噪的声音。

代杰走了进来，说：“大炮落在围墙的外边，打破了一只墙角。”

接着又有人来传达严密熄灯的命令。铁罗尼和纪德甫便起身告辞，拿着手电一开一闭地从廊道中间向前面的讲堂里走去了。

十九

五号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

近农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已经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遭了失败，这一次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下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主持其事的仍然是总政治部。五号上午已经有梯子络续送来，堆积在南操场上，大家又来从事绑扎。扎好了的便抬到学校门外去停积着。

这一次的梯数比前一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断断续续地送来的，因此绑扎的工事便很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军所挑拨出来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齐集的时候，还剩下好些梯子没曾绑好。操场上没有可以工作的余地了，大家把那还没有绑好的梯子都抬到校门外出，又在那儿继续着工作。

天已经黑下来了，全靠着几盏马灯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适逢其会有好几盏马灯的洋油都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所的，洋油尽了可以到那儿去取。在场的人们没有人知道那施发所的所在，替他们说出地址来时，但那大学的内部大家也不熟悉。于是我自己便把马灯收集起来，左右两只手各提了三四盏走进施发所去讨油。进去时灯光是很幽晦的，倒没有感觉着什么，出来时因为油份充足，灯光倍加明亮，左右两手各提着三四盏，自己都觉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飞起来的一样。走到校门口恰好碰着一群军事上的

将官们迎头走来，有几位俄顾问参在里面。陈铭枢和张发奎在最前头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没有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后部有一位年青的军官，脸色白皙而清秀，身材长而细，他招呼着我：

——“哼，你这家伙，点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话中含蓄着责备的语气。他没等我的回话说出，又把从扎梯处跑来的邓主任拉着了。

——“喂，择生，这位尊驾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宝贝吧？”一面说，一面把我指着。

——“怎么？”择生惊讶着回问他。

——“毫没有军事的常识！在敌人面前点着那么多的灯，好做炮靶子啦！”

——“你真神经过敏，”择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学堂在背后挡着，敌人会有千里眼看见这些灯光？”

那军官没再说什么，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进去了。择生也跟着进去了。

在混成队出来就道的时候，所有的梯子也刚好绑完，部署是和前次的办法一样，只是人更多，气象更加悲壮。

刚才的那一群军官们又走出来了，择生和铁罗尼也在里面。

刚才责骂过我的那位年青的军官呈着笑容走来向我拉手。

他说：“刚才得罪了，我是黄琪翔。”

黄在那时还是张发奎部下的团长，在军中有美男子的称誉，但我们还不曾见过面。

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择生和我拉了手，铁罗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后是纪德甫走来。

德甫自来是少说话的，从广东出发以来，尤其是自长沙出发以来的这些天，我们虽然时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说没有直接谈过一次话。他的身材高长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带黄色，但也不是病态，年纪只有二十五六岁，青春依然还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态度里。他穿的依然还是从汨罗以来的那件黄色的布军服，到了武昌以来连换洗的时候都还没有。他除背着图囊和皮带之外还背着一杆驳壳枪。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别用力。他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

他是说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那要你回来？我们明天赶上来相见。”

在那时候谁都相信当晚一定会打进城的，虽然免不了是有不小的牺牲。混成队中的士兵们有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数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胜的勇气。他们的路似乎只有两条：不是死在武昌城

下，便是活在武昌城内。他们每个人虽然都有金钱上的犒赏（数目我不记得的），但好不足以污损他们的英勇。因为献身的精神，敢死的气魄，终不是金钱可以买得来的。

我们彼此拉了手之后，指挥敢死队的军事上的人们向那深不可测的、和死境似乎并无区别的黑暗中消去了。

二十

谁都想到在五号的夜里一定可以攻进城，当晚留守着的人，特别是政治部，要准备第二天进城的工作，大家都没有睡觉。

敢死队出发后有两个钟头的光景，炮火的声音特别地猛烈起来，想见战斗是异常的激烈。炮火的声音一直到天快见亮的时候才渐渐衰竭了。在那时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我军已经攻进了武昌，正在城里巷战。进城的门道有的说是宾阳门，有的说是通湘门，有的又说是武胜门。先进城的军队有的说是第四军，有的说是第八军，又有的说是第一军。消息虽然有各种的歧异，但是在已经攻进了城的一点上是一致着的。

每来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追究起那消息的来源时又多是渺茫无着的。我们希望着择

生从前线上会有什么确实的消息送来，但是始终没有。消息传来得很频繁，盖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总司令部去问过两次。第一次他回来的报告是：会着了白参谋长，讲那攻进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还没有得到前方来的确报。第二次他是见到了总司令，说他正在和前线打电话，说的确是攻进了城，是第一军的第六团，由武胜门攻进的，大约宾阳门在现在也已经攻破了。

得到了这第二次的报告，自然是再无可怀疑了。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经把出发的事情准备好了的，便顿时在南操场内整起队来，时候是七点多钟。在要出发的时候，我自己又亲自跑向总司令部去，正待上楼，碰着了已经任命为湖北财政厅长的陈公博由楼上下来。他先对我说，武昌的确攻破了，他也要立刻进城去。

我听了他的话便也没有再上楼去，折回南操场，让部队出发。

胡公冕骑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马走在最前头，领率着宣传大队。其次是我与代杰、德谟诸人领率着政治部的全体人员。政治部的两面大旗是由两位宣传员在前头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学的校门大家都很有点威风。特别是那骑在马上胡公冕，俨然像是一名凯旋将军

一样。

路上不断地有逃难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来，看见我们威风凛凛地在向着城走，都远远地便把担子放下了。我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逃难，城已经攻破了！”他们听见我们这样说，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担子转向城一边走。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三岔路口上来了。那儿有三条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门，左手是朝保安门走，右手是朝洪山走的。在那儿又遇着了陈公博，他骑在一匹皂骊马上正在躊躇。向直走自然很捷近，但那儿异常的惨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决定朝左手走，我们是朝右手，觉得由宾阳门攻进更要可靠一点。

向右手走不好远，便要走到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上来。公冕的那匹青马本来是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见过仗火的凡马。但那家伙的神经似乎比人还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时它便罗唆起来。无论怎样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来。终究使我们的胡大元帅不能不赶快从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头的马，让马夫拉在最后头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气是很晴朗的。自从在八月三十一号的晚上下过一次暴雨之后，接连着好几天都是晴天。地面干燥得就和沙漠一样。武昌城远远地在阳炎中横陈着，

脚根是看不见的，白蒙蒙地好像是一座蜃气楼。

刚刚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处，我正向旁边的德谟指点着说：“我们前天挨大炮的地点便是在这儿了。”话还没有十分落脚，忽然地，乓的一声，炮弹刚好落在队伍的中间不及三尺远的光景。地里起了一阵土烟，部队里也起了一阵人烟。炮弹没有爆裂，队伍却是爆裂了。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见过仗火的人，无论平常是怎样的热心，怎样的夸口，一到临场便是要露出马脚。政治部的好些勇士们听见了一声大炮，便吓得鸡飞狗跳起来。有的把手里拿着的标语和传单统统抛弃了，有的吓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人姓曾的，吓得当场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劲骇软了，几乎连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来了两声大炮，都打得很准确。但都要感谢那骗钱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把些不中用的废弹卖给了中国的军阀，一个二个都没有开花。而我们总政治部的好些不打便开花的大炮们，要收拾起来走过那段危险地面，真是很费了力气。

走到有掩蔽的地方了。公冕很赞叹地对我说：“敌人还不错，城里在巷战，公然还有这样的镇静。”

——“怕有点靠不住吧，”我怀疑了起来，我是不相信敌人会有那样的镇静的。“进城的消息真是老总亲自对你讲的吗？”

——“是的啦，是他亲自对我讲的。”公冕很坚决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骗。”我这样说，一种诋报军情和冒功图赏的那类卑劣事迹，在我的脑中浮现了起来。

搬家逃难的人是络绎不绝的。从前线上也时而有散兵下来，抓着他们诘问时，都不知道有攻进了城的那么一回事。由种种情形的归纳，觉得那个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队的进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几位愿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线去探听，待把消息探听的确了，再定行止。

二十一

我们走到离洪山不远的地方，从对面有一架担架抬来，后面有一位背着驳壳枪的护兵跟随着。

担架愈见抬拢来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遮盖着的。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皮腿套，两脚长伸着没动。我的注意力是完全集中在担架上的，我想到那负伤的一定是一位官长。

当那担架从我们的身旁擦身过的时候，那后面跟随着的一名护兵突然叫着我：

——“秘书长！主任……”

那人原来就是邓主任的护兵杨升，我大大地吃

了一惊，连忙问着：“主任怎样？受了伤吗？”

——“无系，系……①”

我没等他把话说完，由那服装已经唤起了我的记忆和判断。我已经知道了那担架上的人是谁了。连忙跑到担架旁边去，揭开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来看，纪德甫的面孔现了出来。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脸色转化成了苍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眼泪顿时在我眼里鼓荡了起来。

——“主任有信。”杨升从自己的怀中取出了一封信来给我，是择生写给我的。信是写在抄本的一叶上扯下来的，那诚恳而简单的几行文字至今还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脑里。

××同志：

攻城计划仍归水泡，敌人尚在顽强抵抗。德甫同志于今晨正七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

Yenda Den 七时四十分于长春观。

择生的署名是惯爱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写成“演达·邓”的，他这几行手书就像一股电气一样，一霎时使在场的同志们都严肃了起来，有好一阵大

① 不是，是……

家都没有声息。

攻进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说完全是假造的。因为谁都相信当晚的夜袭一定可以攻进城，而先攻进城的部队在论功行赏上自会掌握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统制权，这便构成了那假造情报的动机和目的。但是为这种小小的阴谋所欺骗了的不愉快，却为纪德甫之战死所唤起的严肃而悲壮的感情，所镇压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伫立了一会之后，又只得回到全体的部员们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帜卷了起来，把队伍分散开，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敌人的炮手，大约也是因为有城墙的保护完全恢复了他们的镇静，在人少的时候他们是不肯开炮的。一些成了惊弓之鸟的部员们，算也诚惶诚恐地、先后把那段危险的地面通过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杨升用他那很难懂的广东话把晚上夜袭的情形告诉了我。话虽难懂，但也得到了一个梗概。

敢死队有一部分人是到达了城下，而且有少数的人是爬上了城墙的。但是敌人也早有防备。远处的用机关枪扫击，近处的用手榴弹投掷。爬上了城的人因为众寡不敌，都被打下了城来。其中有一位曹连长，爬上了城，也被敌人打下了。他的部下为去抢回他的尸首，死伤的很不少。

邓主任的马也被打死了。他们在前线上督队，一个子弹打来，端正地打中了马的脑壳。那子弹从邓主任的左腋下穿过，军服的袖子打穿了一个洞。人没有受伤，马是顿时倒了。

清早他们退到了长春观。那儿的地方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同一个水平上，和城墙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的光景。他们就躲在那土墙背后，用驳壳枪和城上的敌人对打。把头伸出墙头去，打一枪立刻又缩下墙来。敌人也晓得这边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机关枪对准扫射，但都没有把墙打穿。打进了园子里的枪弹，真是就和雨点一样。这边不应战，敌人也把枪准掉过了方向，不再对准着这边。但你一伸出头去打得几枪，他们又来向你下一阵子弹雨。就这样来复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纪德甫把头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势，正回过头来报告坐在墙脚下的邓主任和铁罗尼的时候，突然地有枪弹打中了什么的声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邓主任赶快把他扶着，晓得他是受了伤，顺着势子把他放横在地上。

邓主任和铁罗尼都来关照他，他用很低微的声音说：“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他就只这样说了这一句话，以后便没有声息了。

毫无虚饰的杨升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情形告诉了我。我听着他那木讷而低抑的声音，看着他那劳瘁了

一夜而气色很沉闷的相貌，晓得他的内心是虔诚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别是德甫临终的那句话，很打动了，他向着我反复了两三遍。一个人临到了死的关头，完全忘却了自我的存在，而顾虑着同在患难中的友人。——在这种精神的面前是谁个也会低头的。更何况杨升是和他同处在一个死地的人，在他那朴素的心中，和山里的溪泉一样没有什么渣滓和尘埃夹杂着的心中，自然是会有更清澄更透彻的印象。

——“我不要紧，请你们留心着敌人。”

二十二

纪德甫的尸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学，停放在临着南操场的楼上的一间讲堂里。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制办棺木和衣衾，另一方面得着几位部员和勤务兵的帮助，把他身上的军服解开来了，检验他的伤痕。

枪弹是从后头骨的左侧打进去的，从后颈窝下穿出；又从右肩打进胸部，由肩胛骨的右侧穿出；最后又打穿了右侧大腿的右侧的皮部。子弹的余势已尽，笼在军裤里面融断成了三个颗粒，连布制的军裤都没有打穿。

就这样一枪贯穿了三处。头部和胸部的都是致

命伤。血流得不多，但那内部的出血不用说是很厉害的。

接着又检查他随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类之外，手上有一只手表，衣包里有一个钱包。那个钱包是皮制的，已经很旧了，当着众人面前我替他打开来。从那里面取出的内容是：——两个铜板和两张当票。当票是广东的当铺所开的，写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当的是什么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说来，怕只是被条和书籍之类，因为出发时不能随身带走，所以才采取了那样的办法，交给了当铺。

“两个铜板”——这层或者有人要怀疑，以为我是在有意地夸张。其实这倒是不足怪的，自广东出发以后直到武昌城下，没有正式地发过薪水。（自然，假如有需要，是随时可以向财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伙食，在行军中谁也不感觉有什么用费，所以德甫的钱包里也就只有那样的一点财产。不过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写着实话，毫无意思做小说。假如我要做小说，在这儿也正好夸张一下，可以替他编出一部日记或者编些信札出来。为投满脸骚疮的年青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还可以编出几封恋爱的书信。但那是无聊到万分的，那样只会

污辱了我们的德甫。

德甫的钱包我是交给了德谟他们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样我不知道。只有那断成了三个颗粒的枪弹，我是把来当成纪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难的时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抢劫。那个贵重的纪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资料，一齐遗失了。

在那天的午后，棺木和衣衾都采办了回来，德甫便立即收殓了。我因为工作忙，没有临场。收殓后的棺木是暂时停寄在学校后庭的一个库房里面的。

在那天午后还做了些什么工作，我现在全无记忆了。只记得夜里我睡在床上做过几首哀悼德甫的诗，我现在把它们记录在这儿。

一棺盖定壮图空，身后萧条两板铜。

沉毅如君偏不禄，人间何处吊英雄？

回思夜袭临歧语：不破坚城矢不归！

今日成尸横马革，难禁清泪滴君衣。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

一弹穿头复贯胸，成仁心事底从容。

宾阳门外长春观，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点钟，在要把德甫的灵柩送到邻近的寺院里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体人员连同勤务兵，都聚集在后庭的那座小库房前面为他展吊。小屋是砖砌的，就和汽车的格纳库^①一样，前面的门敞开着。因为天气热，棺材下已经有血水流出，同时也有臭味了。这样的情景尤其是触动哀感。

由胡公冕赞礼，大家在棺前沉默了五分钟之后，组织股长的李鹤龄报告德甫的履历。大意说他是山东人，在中学毕业后便到苏俄留学，留学期间不长，为中国的革命所迫提前回了国。但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语程度和理论水平已经可以有把握地作政治上的谈话和翻译了。他是共产党员，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样，他是怎样到的俄国，他是山东那一县的人，我现在都不记得。

接着是邓主任代表政治部全体的人致哀词，报告了他阵亡时的情况。接着是俄顾问铁罗尼用法国话致哀词，由鹤龄替他翻译。

铁罗尼的确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说，一面流着眼泪。他说：革命阵营里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

^① 汽车房。

同时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侣。他平时对于他太生疏了，对他没有充分的认识，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很明显地有一部分是表现在他的眼泪里的，铁罗尼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诗人，他是由于他的浪漫的热情而成为了革命家。他喜欢幽默，喜欢诗歌，喜欢在规律的生活之外作些余兴。但是纪德甫的性格却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谈话之外，连开口的机会都很少。从广东出发以来和他共同了两个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见过他有发笑的机会的。因此他们两人在平时便不很投合，铁罗尼早有换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掉换工作。但是德甫的庄严的一死把铁罗尼对于他的感情完全改变了。

二十三

自从纪德甫死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没有怎样的进展。爬城的计划失败了两次，牺牲了好些同志，以后便没有再行采用了。在两三天后大家所系望着的飞机由俄国同志的操纵从广东飞了来，但那飞机并不是轰炸机，也没有炸弹，只在武昌城上空把通常的手榴弹投了两次，散了几次传单，结果只是把敌人恐骇了一下。

这儿却有一个小小的插话。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手榴弹，有一颗是把武昌美术师范学校打中了的，并且还打中了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华林。华林当时在那儿教书，也就在那儿寄宿，那炸弹的破片打伤了他的足趾。他为此受了一些痛苦。后来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后，对于革命军曾经加以诅咒，而那诅咒的余沫更曾经飞溅到我的身上来过。

我现在把这段插话写在这儿，倒也并不是心存报复地要来奚落华林先生，我是想请他做一个活的证人，证明飞机投过炸弹的事情是实。而且更希望他为我们提供出些资料来，他在武昌城里过四十天的笼城生活，像他那样有文笔的人，最好把那段生活记录出来，写一部“武昌城内”。

飞机的威骇没有用处，继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护的地方打地道通到武昌城下去。这样的工作不免要旷日持久，武昌城外的革命军便只有采取着待命的形势把武昌包围着。

到了八号，因为汉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紧，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汉口采办，非得有机关在汉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决定了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起初本是拟定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的晚上，择生又来找我着我说：汉口的事情还是要我去主持才行。于是预备好了的规模又不能不

改变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选了二三十名精悍的同志，带了十名警卫兵，在九号清早向白沙洲出发。这一行人中，代杰、鹤龄、德谟和我，便是核心人物。

到了白沙洲时，暂时驻扎在那儿的武圣庙里，因为所要搭乘的小火轮要载第八军的军火，一时很不容易载齐。中饭是在那儿用的。由白沙洲渡过鹦鹉洲时天色已经黄昏，再从汉阳城外走过时更已经黑下来了，便点起了马灯照着走路。这个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敌人自然是看见了，隔着江便不断地有枪炮射来。枪声和炮声在夜气中响得更加透彻，但是却没有一个子弹打中。

汉水上面是搭着浮桥的，由那浮桥渡过宝庆码头时，马灯的光映在水中，水是异常的清浅。渡过汉口后当晚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和前两天派来的人接了头。在第二天，十号的清早，才搬进了设在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里的办事处去。

公司是有四层楼的西式建筑，楼下正中是大门，左侧是公司的门市，右侧是银行式的一个大厅，那儿在前做过银行。在军事期中是做着逆军的军需处的。楼上是旧势力的俱乐部，因此便被认为准逆产，由我们所派来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对于公司的营业没有加以妨害的范围内，我们把楼上楼下非公司的部分

都占据了起来。楼下银行式的大厅便成为了总政治部的办公厅。左侧前面当门的一隅有一间小室，便作为了主任室，主要的几个人便聚集在这儿。我自己是时常在这间小室中的一尊沙发上过夜的。

当时的汉口还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吴佩孚逃走后还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他会卷土重来。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还没有开市，各种报纸也都还是没改换旧时的论调。刘佐龙所领率的鄂军集中在那儿。刘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隐隐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对于南北两方都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此外，还有好些新附的军队，那在名义上虽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实质上是形同敌国。我们跳进这样的环境里去，所负的使命便是要扩充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气势，来镇压周围的敌人。

我们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民众团体的组织加紧地进行，各种工会有组织的公开强化了起来，无组织的便从新加以组织。甚至如像省市党部的公开都是在我们的掩护之下成全了的。

就这样聚精会神地干了一个礼拜，各种宣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有一种美国人办的新闻也被我们把它拉了来。民众团体逐渐地产生，民气高涨了起

来，汉口的市面便顿然改了旧观。我们自己在这几天中所过的生活要算是最紧张、最有趣味的生活，晚上睡觉的时间很少，多不过三四个钟头，甚至连熬几个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这样自以为痛快的时候，却于不识不知之间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二十四

在移到了汉口的第五天，码头工会的工友们把一位著名的工贼郭聘伯逮捕了来，这人在一年后的武汉政府时代是枪毙了的。最初送到部里来的时候，部里的同志们便主张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规定上政治部并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便决定暂时把他扣留起来；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邓主任请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状和我们主张枪决以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意思。

犯人送来时是清早，待到傍晚时分，突然有一营人的队伍开到了政治部的门前，对着政治部阵列着。照那服装看来，知道是刘佐龙部下的队伍。这是犯人的党羽去怂恿了刘佐龙，要他用威吓的手段来把犯人夺回去的。部里的人不免有些惊惶，因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只有十名警卫兵，每次派两名在大门外轮流守卫。这十人的力量无论怎样是不能和那一

营人抵挡的。我自己也隐隐地怀着不安，但我想到那来的人不会便有胆量动作。他们不过是来向我们示威，我们却也不好向他们示弱。我壮着胆子叫人去传那营长。那营长却很恭顺，他一个人走了进来。我在主任室传见了。那是一位将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脸上满脸都带着烟屎，嘴上有点稀疏的八字胡须，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肿的北洋军服。

我先开口问他：“你们来是什么意思？”

他有点狐疑不定的神气，吃格着说：“我们不知道贵台是什么机关。”

——“什么机关？”我反应了一声，“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见地恭顺起来。

——“你们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逼着问他。

——“听说贵部……唉……逮捕了人。”他噤着说着。

——“逮捕了人怎么样？”我没等他说完又抢着诘问他，“你是来要人的吗？”

——“不，不，不，不是那样，”他连连地把两手举起来摆着，“因为外边有不好的风声，我们是奉了上台的命令来……来……保护贵部的。”

我听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几乎忍不住要发出笑来。我也把我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

——“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们自己有警卫队，就有什么动静，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你们的军队不好这样轻易地调动，反而要惹出不妥当的风声。我请你从速把你的队伍调回去。”

那营长诚惶诚恐地便告辞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转——走！”的号令声，那开来的队伍又从原路开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演了一场空城计，在营长的司马懿走了之后，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场。

但就在营长退去后不上二十分钟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请示的人回来了，带来的邓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为然。他说我们政治部没有捕人杀人之权，在目前革命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分，尤其是不可任性动作。他叫我们把犯人严加看管着，再听候发落。

我得到他的来示自然不很满意；但我也私自庆幸，因为我慎重地请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够先意承旨地体贴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杀，谁还敢妄杀呢？一场高兴不用说已经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还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负号来。

第二天清早，武昌方面又派了人来传达邓主任的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过武昌。这个命令是表示着对于我们的绝对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们严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们解过武昌。他怕我们不

遵守他的命令，会要任性枪毙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捕杀一名罪恶昭著的工贼会有这样的严重。在我的意思，初到汉口来，在革命势力还未巩固的时候，正好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出来示威，借此也可以收揽民心；然而上司的见解和我们的却是正相反对。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时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汉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轻易的事情。万一路上有了差池，谁好担待呢？于是又只得把十名警卫兵，留下两名在门外站哨之外，通统派遣去，护送着郭聘伯老爷过江。门卫的换班暂时也只好用勤务兵来假充了。

二十五

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的请示到达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经先到了彼岸。他的党羽在总司令部告了状，说码头工会的人任意捕人。这个消息把武昌方面的军事中枢歆动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总司令部出过一张布告，对于民众团体任意捕人的事严加禁止。一有我的请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经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们又主张枪决。这是很把邓主任作难了一下的。他还有更严厉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我的请示还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过江去了。

事情只是这样的结束，在我虽是觉得不甚痛快一点，但也没有什么，因为逮捕的下手人并不是我们。我们虽主张枪毙，但仅仅是一个主张，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请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条江水，邓主任对于我们的误解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十八号的晚上那时在总司令部秘书处担任着工作的蒋先云给朱代杰写了一封信来，就为处理郭聘伯的事责备他们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同时叙及邓择生向他诉苦，说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说是我们几个四川人有点迹近把持，不应该在部中激成了广东派和四川派的对立。

这个非难真是有点像晴空霹雳，而且对于我们几个人也可以说是顶门一针。我们几个——代杰、鹤龄、德谟，和我——太不凑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占着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团结拢来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担任着庶务科长，后来在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加入了宣传科，又兼带了行营秘书长的职务，他便以辅助我的意义，改为了宣传科的副科长。——这个名目都是临时定出的。组织股长的鹤龄本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在出发的前一天才转过政治部来。德谟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后一些，他一直在担任着秘书。我们几个人都是个别地进的部。我在上海时虽和德谟相识，但并没有怎样的深交；代

杰和鹤龄更是到了广东后才认识的。就这样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们，在拚命做着工作，连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诸度外的時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党派观念。在代杰、鹤龄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愤慨。我自信自广东出发以来是很能遵守纪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辞劳苦地干了两个月，却落得了个感情家的评语，我心里真是不舒服。而这个评语不是择生直接向我说出，而是间接的诉苦，尤其是使我难耐。像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过了江去。

十九号下午择生过江来了。到了政治部时已经是晚上，我回避着他没有直接和他谈话。他在主任室里和代杰诸人谈论了足足两个钟头，谈话的内容我没有过问。

二十号清早还在六点钟以前，择生派了人来把我请到他留宿着的旅馆里，那是同在后城马路，离烟草公司不远。

我穿着便衣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他已经把军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们在一张方桌旁坐下了。

择生带着一个愁蹙而又含着怒气的面孔问我：“你是在斗气，还是认真要不干的？”

——“两来都是，”我索性不客气地回答着：“气

也要斗，职也要辞。”

在平常我们对他是很有礼貌的，因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的命令，我们是只有唯唯听从的。这一次他看见我的态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热汤，闷了一下，有好一会没有说话。

——“在现在革命的工作异常紧张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反革命吗？”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样可以革命。”

——“你打算要到什么地方？”

——“打算到上海。”

——“目前在孙传芳统制之下你能够去吗？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脑袋子已经不会在颈子上的。”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这样的半死不活，羊头狗肉的革命，真是吃不消。”

择生又沉闷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缓和地说：“你对于革命的现状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像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

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

我这样抽象地说了一遍之后，又举出了些事实来证明，同时也提到郭聘伯的逮捕这件事情来。我说：“为爱全一位著名的工贼，而失掉几万工人群众的信赖，这样的‘策略’我真是不懂。”

择生说：“你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的苦处的。总之，我们和衷共济地缓缓地做去吧。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老总不久要向江西出发，他希望你去，但我们都委婉地谢却了。武汉的工作无论怎样是不能离开你的，我已经派了党务科长季刚去江西。你无论如何应该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干下去。我说你是感情家，并不是骂你的意思，革命家没有强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不过在目前，对内对外的策略都是应该讲的，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还有部内分出了党派的话，是有少数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无那样的成见的。我也相信你们决不是那样腐败的封建余孽。”

他诚恳地这样说着，说得快要流出眼泪来的样

子，我为他的诚恳却不免打动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缓和了下来。

他最后又严重地下出一个结论：“总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够离开这儿的。就是代杰、鹤龄、德谟，都不许有一个人离开！你们离开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他说的话委实也是实际情形。在当时一切工作计划是由代杰经手，一切来往文电是由德谟经手，鹤龄是长于演说的人，并且又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所以对外的宣传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担任的。他们三个人的确是一尊宝鼎的三根柱脚，我不过是代替着择生总成其事而已。他们三个人要走了一个，政治部的事情一定会办不动。又假使我走了，他们的兴趣也是会减少的。我本来有一多半是闹着感情，听了择生的一席话把气平了下来，只好答应他又维持下去。

那一整天择生都留在汉口，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过江去了。

但在夜间在主任室的办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张写了几行没有写完的信笺，是择生写给广东的留守主任孙炳文的。信里有这样的话：“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们的气难受，我恨不曾在武昌城下战死。……”

二十六

九月下旬，总司令部终究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战

事的中心已移到江西。总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来归附的军队很多，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各方面来归附的军队既多，所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带领的一个宣传大队，所有的宣传员，不久便被派遣一空。连公冕本人也就不准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总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后，有行营设在汉口，行营主任便是择生。同时湖北省政府也相继在汉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择生。他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自然很忙，因为工作关系留在汉口的时候多，顿在武昌城下的时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数政治部人员在九月尾上索性通统移到了汉口来。附属着的党红会也分遣到武汉各军的军医处服务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择生所要过江去的工贼郭聘伯又郑重地护送过了江来，仍然关闭在烟草公司三楼上一间小楼房里。

政治部一搬过了江来，工作人员添多了，同时内部的负责人员也由择生调动了一下。他把编纂委员郭冠杰改任为总务科长，把属于总务科的财政股长也改换了。

冠杰是择生的同乡，也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后来是改习了法政的，曾经在法国留过学。他因为和我是同姓，时常称我“宗兄”。他是择生最亲信的人，时常肯把择生的私话来传递给我。他初到汉口来的时候对我说：“择生时常说，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强，择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长沙时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汉口来的工作便杂乱得一点，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原故。”

他一接了事之后，照政治部的规定，总务科长本是有批核一切来往公文的权限的，他便把德谟素来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过去了。但他对于这层却没有经验，每天几十百件的公文堆积在他的案头不知道怎样处理。过了三天又由邓主任的命令叫把所有的来往公文仍归德谟办理。

湖北省政府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那个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勋。在咸宁以后和我们一同驰驱过两天的詹大悲和李汉俊在其中要算是铮铮佼佼

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内部组织是分成四科，科长秉承委员会的意旨受各委员的指挥以执行政务；其中的教育科，择生要叫我去担任，连委任状都下了，是总司令部第七号的委任状。但这项委任我坚决辞退了。

有一天择生到政治部来，他问我：“为什么要辞退教育科长的事？文化工作正应该大干一下，除你而外没有再适当的人。”

我的答话很直率，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做官的，受你的指挥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员们的意旨我却办不到。”

——“你不干谁个好干？”

——“汉俊正是很适当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担。他以委员而兼科长，就和詹大悲一样，办事也会顺手。”

在我明确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后，大悲和汉俊也到政治部来找过我。他们起初以政府委员的资格，说要委屈我，要我一定把教育科的事情担任起来。

我仍然说：“我不愿意做官。”

大悲说：“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

——“不同的只是名目罢了。”我说。我在这儿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担任着

委员而兼任实业科长，还有湖北矿务局的局长，你老先生不和前清时代的道台一样吗？”

大悲先生不动声色地笑着说：“这是策略问题啦，你知道我们是兼差不兼薪的。”

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对于他总有一种先天的厌恶。我自从认识了他以来便不高兴他，他的一切派头不外是一个官僚的模范。他老先生是惯爱讲策略的，说不上十句话便会有五个“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当时的中央委员，自从军事一进展到武汉以后，他俨然就像是邓演达的执掌鹅毛扇的军师。邓对于他也就和刘玄德之于诸葛孔明，如鱼得水了。

——“你不干谁个好干呢？”汉俊说。

——“你正好干啦，我已经向择生推荐了你。”

结果是汉俊说，他暂时为我代替着。又说他打算组织一个教育编制委员会，由省市党部的宣传科长、省政府的教育科长，以及其他适当的人物来构成，要我去做主席，但是我也谢绝了。

二十七

江西的战事没有初到武昌城下时那么顺利。旧历的中秋第六军曾经攻进过南昌一次，但受到敌人的反攻。以众寡不敌反遭了一次惨败。战线绵亘着南

浔铁路一带，敌人踞着南浔铁路，以徐家埠为中心，上下策应，和他应战的有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一共好几师人，支持了许久，终不容易把敌人打破。在九月尾上孙传芳的军舰公然有两只开到了黄石港来，竟连武昌围城的兵士都不能不开了大部分去抵御。这个消息是保密的，但城内的敌人和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有连络，却早知道了，乘着围城的兵力稀薄时，有一夜公然敢于派遣了一部分人缒城而出。适当其冲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混战了两个钟头，算把出城的敌人通统歼灭了。独立团也遭了很大的损失。那一团人经过几次的激战，所有的下级官长几乎是阵亡干净了的。

炸城的工事也遭了好几次的顿挫，有时是挖得太深，出了水；有时又挖得太浅，地面凹陷了下去；更有两次挖到了城濠，自己把地道穿破了。每遭一次顿挫，总要使前功尽弃，又来重起炉灶。因此工作便十分迁延，武昌城的攻破遥遥无期。京、沪等地及国外的报纸竟把守城的敌将刘玉春英雄化了，把他称赞得就和田单、张睢阳一样。

但是粮食的封锁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的。武昌城有二十万人口，围到了三四礼拜上来，城内的粮食估计早已用尽了。城内的人和汉阳、汉口的人大抵非亲即友，因此汉阳、汉口二地水面上的人物们便发起了

营救运动，想把城里人救出。这在本军方面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和城内费了种种的交涉，在十月初头，便有开城放出饥民的事。约定了每天上午在一定的时间内由汉口派船去迎接，船上插着白旗为号。

头一次开城似乎是十月三号，饥民为要拥挤出城，在文昌门的城门口竟挤死了两个人。那些出城的人的确是很狼狈的，据说一般没有积蓄的人在头一个礼拜便已经绝了粮。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只是还没有闹到吃人的地步。有人把那饥民吃的土馒头给我看过，外皮是一种黄垢色的粘土和着一些谷糠，内面包着些狗肉和猫肉的心子，然而这恐怕要算是上食了。有储蓄的人自然又不同，但笼城期间过久，他们又有他们的焦愁和恐怖，这在事实上是促进了开城的原动力。

在那开城的前后，敌人已经失掉了斗志。城内的敌兵闹到一天只能吃得一二碗稀饭，城上的人每每有向城下的人打话的时候，他们向城下的兵士要饮食和烟草吃。城下的兵士问他们为什么不开城，他们把手棱在颈子上，表示他们的官长要砍他们的脑袋子。

但他们的官长，刘玉春和陈嘉谟，也派过私人到第八军去通过款曲。他们要求保全他们的实力回河南去，要南军让他们出城，开出一条路来让他们退

走，南军不加以攻击。但这个要求是遭了拒绝。

就在这陈、刘二人想投降而尚存着观望的期中，他们的部下有一位旅长却着了他们的先鞭，首先派了人来投诚，约定了在十月九号的晚上里应外合，把宾阳门打开来迎接我们。这位旅长似乎姓刘，名字我忘记了。他的一旅人是编配在唐生智部下的。后来在武昌下游的铁路工程处成军的时候，唐、邓和我去监督，各人作过一般训话。

双十节到了，在武汉要算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的国庆纪念。

会场设在汉口北郊的华商跑马场，开会是在上午九时。参加的群众当得在十万人以上。团体旗、党旗、国旗的飞扬，国际歌、先锋歌、革命歌的合唱，口号的绝叫，万岁的绝叫，讲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说，各种音乐队的演奏，把那广大的跑马场化成了一片澎湃的大海。

正在开会中，武昌城攻破的消息传到了。这在我们本来是早已预知了的消息，但在一般的民众是出其不意的。消息当场传布了，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绝顶。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时轰动了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涛，就像要卷成海啸，把那十几万的群众都卷到天空里去。

怒涛一激动了起来，没有可以使它立地静止的

力量。庆祝会的预定本来是还有好些人的演说，但都停止了。——演说已经是没有人听了。——于是便照着预定的路线开始游行。这对于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和在帝国主义掩护下的反动势力真是绝大的示威。

湖北总工会也是在这一天成立的，在汉口公会堂开成立大会。我参加了跑马场的庆祝会后又到这儿来。这儿聚会着的是各种工会的代表以及来庆贺的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这儿是革命的盐，革命的火车头，虽然没有那群众大会那么热闹，但所给与人的是坚实的铁槌般的感觉。

武昌方面在我们的军队进城之后，到了下午，又由第四军把刘玉春活捉着了。这个消息传到汉口来时是快要黄昏的时候，我们顿时印出了传单来散发，利用种种的方法来公布这个消息。有一个方法大约是代杰想到的，他叫人买了白布来用红水写着“刘玉春活捉了”的几个大字，把来围在一驾汽车的周围。让那汽车在汉口全市驰骋，同时又从汽车上散布传单。这一个消息，和公开这个消息的奇妙的手段，把在热狂中还未镇静的民众和市民愈见煽扬了起来。汉口全市都轰动了。汽车走一路，民众便簇拥在它的后面跟随着，到汽车把汉口巡游了一遍折回到后城马路来的时候，群众拥集在政治部门前不肯散，愈集

愈多，把后城马路那条很宽阔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政治部前面的出入竟开出了一条火巷子来。

这仍然是那驾汽车所生出来的效果。

汽车本是从前吴佩孚坐过的一乘朱红色的轿车，用白布在三面围着，车窗恰被遮掩了，车的内部是看不出的。大家以为刘玉春便被囚在那驾汽车里面，因此都要等那车门打开，看着刘玉春出来。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种收获。在晚上邓主任和铁罗尼过江来的时候，他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到达了政治部。铁罗尼大为惊叹，他对我说：“这样的群众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够看见的。”

二十八

第二天清早八点钟，邓主任由歆生路的总司令部行营到了后城马路来，因为八点半要开一次部务会议。

部务会议列席的人是各科的科长、股长，以及秘书，主席便是主任。邓主任所主持的会议，名目虽叫会议，照例是一种军事独裁，他是先在自己钞本上写出几条大纲，接着使用命令式宣布。

他这回所宣布出的命令，是要政治部全部迁过武昌，驻扎在旧省议会里面，以后的工作是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

这个步骤本来是应该有的，但要全部迁徙却是出于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仍然以汉口为本部，而于武昌设立支部。因为汉口无形中已经成为了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武汉三镇的社会中心，对内对外的工作都以这儿为方便；而且政治部的工作在这儿已经有了一个月的基础，不应该完全抛弃，搬到那偏僻的在各种工作技术的运用上都不灵便的武昌。注重农民运动的工作在汉口也可以做，武昌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办事处也就可以呼应了。

我把这层意思表示了出来，择生反对着说：“目前的汉口虽然是政治中心，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武昌已经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党部，都要次第地移过去。还有是政治工作人员应该过艰苦的生活，久住在汉口是会堕落下去的。”

决议自然是照着了他的意思，等待那做着第四军军部的省议会空出之后便搬过江去，同时汉口的办事处留下几个庶务员看管，只当成一个购置物品的机关。

在会开完后择生过江去了，我在那天下午得到空闲也渡过了江去。城里的情形自然是十分萧索的，商家都闭着店门，居民都瘦削憔悴得像木乃伊。我的去向是往省议会。议会前面的广场中停集着好些北军的棺材，有些是南军进城后才收殓了的。天气还

热，棺材都是些菲薄的木匣子，尸臭异常地熏人。

走进省议会时已经是天快黑的时候了，四军军部正在搬家，我叩问了几位负责人，知道第二天上午便可以空出。政治部也就决定了在第二天搬来。

那时被活捉着的刘玉春是关在省议会的楼上的。一位副官把我引到那间房间里去。那是在楼上第一排右侧的第一间小房间，里面是黑洞洞的，只在一张桌上放着一盏马灯。进门在右侧的角上放着一张木板床，刘玉春面着壁蜷卧在上面，有一个跟随的人在服侍着他。引我进去的副官打了招呼。刘玉春起了床来，很客气地请我坐。

刘很白皙而肥胖，足见他在四十天的围城生活中是丝毫也没有受苦的。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虽然在缙绅之中，大约也是狃于素来的威势吧，态度很能镇静。

我在那时和他谈过一席话，在第二天的《革命军日报》上发表过。我开首恭维他，说他能忠于职守，能把一座孤城死守了四十天，是难得的事情。

他也谦逊着，说他只是一介武弁，只晓得服从上官命令，上官要叫他守城，他便守城罢了。

——“但是，”我说，“你所服从的上官，吴大帅，一从贺胜桥溃败了下来，便渡过江跑回河南去了；而你一个人偏偏要来顶着担子坚持，使武昌城内二十

万居民，为了你一个人受尽了四十天的水深火热的痛苦。你们又在武胜门外放火，烧毁了无数人家，使多数负郭居民无家可归，这无论怎样怕是该你负责的。”

——“在军事上是出于不得已，军人是只晓得服从命令，只晓得打胜仗的。”他回答着。

——“你这样的话，”我又说，“怕不见得是出于本心。军人的天职是在保卫人民的，所该服从的命令是保卫人民的命令，要打胜仗也是为人民；不是专为某一个人效奔走犬马之劳，不是为要保全一二人的身家性命而屠民以逞。我敢于替你本心话说出来，你是相信着吴大帅会卷土重来，吴大帅一时是决不会崩溃。所以你能够多支持一天，你的功劳更大，你会多得一重犒赏的。”

——“我决没有那样的心，我可以对天地神明发誓！”他抢着话头来辩驳。

——“你不用掩饰吧，”我说，“这种想头是谁也应该有的。你、我也并不是圣人。不过就是为了你这一念，武昌城内外的居民，你想，是怎样地受了灾难？”

他沉默了下来，隔了一会又再说时，声音愈见和软了。

——“我们军人的脑筋很简单，”他说，“我们没

有深刻的心思。”

照那语气上看来，似乎有悔恨的意思在他的脑中盘旋。我最后又问到他的家族。他说，他最挂念的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万一“国民军”的长官肯鉴谅他，使他能够保全生命，回家奉养，他以后决不再做军人，他要做一名驯良的老百姓。

和他谈了一席话，觉得他很真率，似乎并没有什么狡诈的地方，在旧军人中的确要算是难得的一个人物。他在我的谈话中似乎也感受了好些慰藉。当我把话说完了，和他拉手告别的时候，他很和蔼地对我说，他希望能够和我再见。他说他自从失掉了自由以来，来和他谈话的人都好像法官拷问囚犯一样，没有人像我这样的和气。

和刘玉春一别之后，在第二年的夏天他终竟恢复了自由。那时张发奎在做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我在做党代表，我们在旧督军署的总指挥部中还见过一次面。他还记得我，同时也还记得我们那一次的谈话。但他后来的情形是怎样，是不是做了“一名驯良的老百姓”，我不知道。

二十九

政治部移到了武昌，驻扎在省议会的右半部，左侧的半部是要让给省党部的。幽囚过刘玉春的那间

小房间开放了出来成为了会客室，在那东侧的一间大房间便是主任办公厅，其余的各科各股都分设在各个小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清早，便是开城后的第三天，因为闲着，我自己便带着了一名对于战地的情形比较熟悉的副官和一名勤务兵，向宾阳门走去。那道城门离省议会最近，在那崎岖不平的一条街道上走不上四五分钟便可以看见城楼了。城墙内面的脚部，挖出很多地坑，是北军躲避飞机的工事。

出了城，先走到左手的一段高丘上去，那高丘上的一段城墙比较低，那儿便是九月初旬两次夜袭所选来爬城的地方。阵亡了的人很不少，尸首在城下暴露了足足四十天才得以收殓。我去时，尸首已经是被收殓了，但在那儿压了一个月以上，被压着的草，腐化了，因此在那青草地上狼藉着的手榴弹的残骸中，还纵一个横一个地呈出一些人体的烙印。

在那高坡上立着怅望的时候，有一群日本的新闻记者也走了来，其中有几个是我在汉口认识的。他们见了我，便来和我客气了一下，拍了好些照片。日本人对于中国时事的关心，对于中国情形的侦察，真正的是无微不至。南军占领了武汉的时候，日本的各个报馆、各个通讯社，都派有专门的访员，勤勉地访查四面的消息；但是上海方面的本国的报馆和通讯

社的访员，我却不曾看见过。中国的访员和记者，似乎只消用一瓶浆糊、一把剪刀、几份外国文的报。

城濠对面也耸立着一个丘陵，丘陵顶上有一座庙宇，四围有红色的墙围着，那便是长春观，纪德甫的阵亡处了。我怅望了一会，徐徐地走下了高地，想踱过长春观去凭吊。从那城濠的石桥上踱过，在对岸的右侧现出了一个窟窿，副官指着对我说：“那便是最初一个地道，打穿进了城濠来的。”

地道工作的根据地是在长春观下负郭市街最前头的一家茶店里。那家人家几乎被挖出的泥土所堆满了。屋顶、屋壁、和堆积的泥土上的弹痕不计其数。

立在地道工作的洞口上看了好一会，我想上长春观的心事又改变了。我想缓几天等到择生或铁罗尼有了闲暇的时候，再约他们同去，好问明纪德甫阵亡时的地点和情况。因此我便离开了那儿，沿着城濠边，向通湘门方面走去。

走不好远，在城墙顶上呈现出一个缺口，副官指示着对我说：“九月下旬敌人出来夜袭的时候，便是从那儿缒城而出的。在那城濠里死了的敌人很不少，从昨天起一样地在收殓，但因为火材匣子不够，尸首还没有收完。”

收了尸的火材匣子有好多还堆积在城濠边上，没有收殓的尸也还东一个西一个地腐化得不成形

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奇臭。

走到通湘门，城门是闭着的。城门外也还横着好些尸首，有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浓烈的尸臭，在一些死尸间向那城门走去，在那城门洞下也横陈着好几个尸首，都是穿着革命军的军服的。尸首大都僵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动了的，是靠着城门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個，两手叉着，头部是折叠在胸上的。这些阵亡了的勇士不用说都是受了重伤，爬到了这城门洞口来暂时躲避敌人的弹雨的；但他们的伤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阴爬回自己的本营都不能够办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儿饿死了。想到他们的彻骨的疼痛，想到他们的焦灼的饥渴，想到他们的绞心的忧虑，忧虑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乡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热的眼泪在眼睛里汹涌。但我那时候的感触却没有流于感伤：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的血是有代价的，他们是死得其所，是死而无憾。……但在七八年后的现在我写到这儿，我对于当年的夸张的感想，只能够自己对着自己冷笑了。

离开通湘门又朝前走了一节，走到了铁路的路线上来，有几架敞车陈列着，车上近城的一侧树立着五六尺高的钢板。那钢板上大孔小洞的弹眼，很像是暴雨落过后的沙面。很想再朝前走，由中和门或者保

安门折进城去，但觉得路太走远了，费了已经不少的时间，怕部里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又只得从原路折回。

三十

自从移到武昌以后，很像是已经失掉了弹性的橡皮带子一样，比在汉口时清闲得不可比拟。

在这时又是我烦闷开始的时候，我很想辞掉那时的位置，索性回到上海或广东去做点更称意的工作；要是不能够，便索性再退回书斋。

在武昌究竟做过了些什么事，我现在已经很模糊了。但奇妙的却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得异常鲜明。

政治部驻扎在旧省议会，本是在围武昌城以前便预定了的步骤。武昌开城以后，不料湖北省党部也预计着要设在那儿，他们在择生处办了交涉，又只得由我们让出一半来彼此分住。

我们先进去，因为是政府机关，自然便把国旗挂在屋顶正中的旗竿上了。省党部隔了有一个礼拜的光景又才由汉口搬过来，部里的人也很替他们帮了一下忙。

省党部一来，自然是又要升挂党旗的。在要升旗的一天，他们要政治部把国旗下下来，让他们把党旗升上去。开首是在下级人员间有了一番争执，部里的

同志走来告诉我，叫我无论怎样不要退让。

接着很兴奋地来了两位省党部的人，他们来会我，说明要换旗。一个说：“‘一切权力属于党’啦，党部是在一切政治机关之上。”一个又说：“党部是革命力量的中心，我们应该‘拥护革命的中心力量’啦。”他们都在把我所编拟的口号来作为大前提，对着我大发议论。

我对他们说：“国旗已经挂上了，又要下下来，未免不成体统。省党部的党旗，能够在前庭正中另外立一根旗竿来挂上，是再好也没有的。”

两个人看见我没有退让的意思便退出去了，又搬了一员大将来。

来的是 T，T 是湖北省党部的委员，同时又是省政府委员，又是共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我对于他，平常是怀着敬意的。

他很幽默，没有初来的那两位年青人那样地剑拔弩张。他说：“党部办事的人总是很迂缓的，没有政治部的人办得敏捷。”他希望我们敏捷地另外树一根旗竿，把那屋顶中央的旗竿让给他们。

这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但因为要顾全部内同志的意气，我也不好由他的一幽默便软化下来。

我也带着幽默的意味说着：“国旗已经升上了，不好无故地扯下。要说省党部是党部，是在一切政治

机关之上，但是总政治部在出发时受了中央党部的委托，是有指导并解散地方党部的权限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T把他的态度改严重了。他说：“你要那样说时，那我还是中央委员啦！”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说：“你是路易十四的新翻译家，路易说‘朕即国家’，你现在把它改成‘我便是党’。”

T辞去了，结果仍然是在前庭中树了一根旗竿来，把国民党的党旗挂上去了。

这件事情想起来真是无聊，但那时的革命同志们大多数也每每爱闹着这样无聊的意气。三分来是革命，七分来是做官。

和这同样的闲气，初到汉口时也和市党部闹过一次。德谟办了一通公文给市党部，他因为政治部受过中央党部的委托，便把市党部当成了下级机关，公文送了去，由市党部的人附笺退了回来，说“本党部不便接受这样的公文”。结果是把中央的委托文件发表了出来，市党部虽然没有再说话，但是彼此之间的感情便弄得很有隔膜。他们对于德谟的批评特别严格，说他的“官僚气太重，不甘淡泊”。

到武昌来又由换旗这件事情闹得和省党部不和睦了，他们在外边对于我的批评，又是说“书生气太重，不甘寂寞”。

荏苒之间也就到了十一月初旬了。天气逐渐地寒冷了下来，江西的战事还迁延着没有解决。幸好武昌攻破后，把第四军的劲旅抽调了大部分人去应援，在马回岭的一战彻底地给与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九江在六号的清晨终被南军占领了。这个胜利的消息到达武汉时，是七号的晚上，那天正举办了纪念苏俄革命的庆祝大会，在那大会的兴奋还未平复的时候得到九江克复的消息，和在双十节的庆祝会上得到了武昌攻下的消息一样，把武汉三镇都欢动了。

就在那天晚上，择生由汉口打了电话来，叫我作出发准备的准备，到九江去。他说：“九江攻下了，南昌不日便会攻下，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异常吃紧，非我去主持不可。”

接到了命令，自然风急火速地准备了起来，挑选了六个我认为是能干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李德谟便是其中的一个。

但那时在九江和武汉之间，像黄石港一带，是还在敌人手里的。我们要往九江，便非改装不可。恰好在八号晚上有一只英国船要开往上海，我们便决定了搭乘那只船。八号清早过江去，在汉口置备了衣履，把装束改了，成了名实相符的便衣队。

因为要避开人的眼目，在晚上上船时只有两位便衣同志送行，都是汉口的负责同志。话头自然是每

易回顾到我们初到汉口的当时。那时也是在反动势力还在蠢动的局面下跳进去的，他们都承认我们多少是做了一些垦荒的工作。有一位是市党部的组织部长 P，为德谟用上行下的公文和我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略略争执过的，到这时把所有的怨嫌都化除了，他特别恳切地同我和德谟握手，祝我们健康，祝我们前途无恙。

把送我们上船的人送上了岸，立在甲板上看着灯火中的武汉在我们的眼前移动了起来。素来是很沉默的德谟，在这时候立在我的旁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回可惜没有德甫和我们同路。”

他这一句话正道破了我那同一瞬间的怅触。

——“德甫停丧的地方你晓得吗？”我问他。

——“S 同志是晓得的，我几次想约他去看看，还没有得到机会，S 便派到江西去了。”

——“我连要到长春观去看看，都没有去成。”

我们当时对于武昌城的留恋似乎就只有这一点。在半年以后我们虽然也回过一次武昌，但那长春观我至今没有去看过，德甫停丧的地方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有那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就像已经旧了的影片一样，时而在我的脑幕中浮动着。

后 记

这篇回忆录在《宇宙风》上分期登载了十五次，算登完了。我现在把全部重读了一遍，稍微添改了一些字句。在杂志上发表的本是三十一节，因原先的二十七、二十八两节太短，为保持全体的均衡，我把它合并成了一节，故今成三十节。就尽它们以这样的形式作为我的定稿吧。这儿有一件事应该附带着提一下。本篇在发表“中途”，上海有一家幽灵出版社，把前二十五节盗取了去，作为《北伐途次——第一集》而“出卖”了。那儿公然还标揭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所谓“侯门仁义存”，真正是有趣的一件事。有好些朋友说，中国人不懂幽默，但据这件事情看来，我却感觉着我们中国人是第一等幽默的民族。——

敬录该《第一集》的代序之头一节，以为本《后记》的尾声吧：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途虽然被人出卖了，但不论怎样，它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历史

上的烙印，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1937 年 2 月 15 日记

（本篇最初载于 1936 年 1 月至 1937 年 4 月
《宇宙风》半月刊第 2 集、第 3 集合订本）

郭沫若小传

郭沫若，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原名郭开贞，号尚武，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郭鼎堂、石沱、麦克昂、高汝鸿、杜衍、易坎人等。

郭沫若1914年赴日本留学，原学医，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他新诗创作的爆发期，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等名篇，192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闻一多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1921年6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在日本

东京成立创造社。作为“异军突起”的青年文学团体，创造社以独特的文学倾向吸引了大量读者。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出版了《星空》（诗歌散文集）、《塔》（小说戏剧集）、《文艺论集》等著作。

1926年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产生重大影响，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成为该学术领域具有开拓性的著作。1937年7月回国参加抗战。抗战时期他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6部历史剧使他的文学道路上出现了继《女神》之后的第二个高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郭沫若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科学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同时写作有诗集《新华颂》、《骆驼集》等；文艺论著《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史学论著《奴隶制时代》等。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另外一个人，象郭沫若那样亲身经历那么多关联着历史的重大事件，象他那样活跃在中国现代史的各个关键时刻。郭沫若

的漫长人生不仅与文学关联，而任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无法绕过郭沫若。

郭沫若主要著译书目

[创作书目]

三叶集（通信集） 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合著，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

女神（诗歌戏剧集） 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卷耳集（《诗经·国风》今译诗集） 1923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星空（诗歌散文集） 1923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聂婪（二幕剧） 1925年9月，上海，光华书局

文艺论集，1925年12月，上海，光华书局

塔（小说戏剧集） 1926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三个叛逆的女性（戏剧集） 1926年4月，上海，光华书局

落叶（中篇小说） 1926年4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橄榄（小说散文集） 1926 年 9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瓶（组诗） 1927 年 4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前茅（诗集） 1928 年 2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恢复（诗集） 1928 年 3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水平线下（散文集） 1928 年 5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沫若诗集，1928 年 6 月，创造社出版部
我的幼年（自传） 1929 年 4 月，上海，光华书局

反正前后（自传） 1929 年 8 月，上海，现代书局

山中杂记及其他（散文小说集） 1929 年 9 月，上海，新兴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1931 年 9 月，上海，光华书局
黑猫（自传） 1931 年 12 月，上海，现代书局
创造十年（自传） 1932 年 9 月，上海，现代书局

沫若书信集，1933 年 9 月，上海，泰东书局
离沪之前（自传） 1936 年 5 月，上海，今代书店

北伐（自传） 1937 年 6 月，上海，北雁出版社
抗战与觉悟（论文散文集） 1937 年 9 月，上海，
抗敌出版社

战声（诗集） 1938 年 1 月，广州，战时出版社
甘愿做炮灰（戏剧集） 1938 年 1 月，上海，北
新书局

文艺与宣传（论文集） 1938 年 7 月，武汉，生
活书店

羽书集（论文杂文集） 1941 年 11 月，香港，孟
夏书店

屈原（五幕史剧） 1942 年 3 月，重庆，文林出
版社

蒲剑集（论文集） 1942 年 4 月，重庆，文学书
店

棠棣之花（五幕史剧） 1942 年 7 月，重庆，作
家书屋

虎符（五幕史剧） 1942 年 10 月，重庆，群益
出版社

屈原研究，1943 年 7 月，重庆，群益出版社
今昔集（论文集） 1943 年 10 月，重庆，东方
书社

孔雀胆（四幕悲剧） 1943 年 12 月，重庆，群
益出版社

南冠草（五幕史剧） 1943 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波（小说散文集） 1945 年 9 月，重庆，群益出版社

苏联纪行，1946 年 3 月，上海，中外出版社

筑（五幕史剧） 1946 年 5 月，上海，群益出版社

历史人物（论文集） 1947 年 8 月，上海，海燕书店

地下的笑声（小说集） 1947 年 10 月，上海，海燕书店

沸羹集（论文杂文集） 1947 年 12 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

天地玄黄（论文杂文集） 1947 年 12 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

蝟螭集（诗集） 1948 年 9 月，上海，群益出版社

抗战回忆录，1949 年，上海，群益出版社

沫若文集（17 卷） 1957—196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郭沫若全集（38 卷） 1982—199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译著书目]

茵梦湖，(德) 史笃姆 (storm) 原著，郭沫若、钱君胥合译，1921 年 7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 歌德 (Goethe) 原著，1922 年 4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鲁拜集，(波斯) 莪默伽亚谟 (Omar Khayyam) 原著，1924 年 1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新时代，(俄) 屠格涅夫 (Turgeniegg) 原著，1925 年 6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约翰沁孤戏曲集，(爱尔兰) 约翰沁孤 (John Millington Synge) 原著，1926 年 2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雪莱诗选，(英) 雪莱 (P. B. Shelley) 原著，1926 年 3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异端，(德) 霍甫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原著，1926 年 5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争斗，(英) 戈斯华士 (John Galsworthy) 原著，1926 年 6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法网，(英) 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原著，1927 年 7 月，上海，联合书店

银匣，(英) 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原著，1927 年 7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德国诗选，(德) 歌德 (Goethe) 等原著，1927

年 10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浮士德，（德）歌德（Goethe）原著，1928 年 2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沫若译诗集，1928 年 5 月，上海，创造社出版部

石炭王，（美）辛克莱（U. Sinclair）原著，署易坎人译，1928 年 11 月，上海，乐群书店

屠场，（美）辛克莱（U. Sinclair）原著，署易坎人译，1929 年 8 月，上海，南强书局

煤油，（美）辛克莱（U. Sinclair）原著，署易坎人译，1930 年 6 月，上海，光华书局

战争与和平，（俄）托尔斯泰原著，1931—1933 年，上海，文艺书局

日本短篇小说集，署名高汝鸿选译，1935 年 3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华伦斯太，（德）席勒（F. Z. Schiller）原著，1936 年 9 月，上海，生活书店

赫曼与窦绿苔，（德）歌德（Goethe）原著，1942 年 4 月，重庆，文林出版社